

土陶之變黯肝色又其夾文
 後黃泥陶現豆碧色密口泥
 絡陶治變化何露種種
 陶則白砂星星宛若珠瑤

中国茶文化丛书

阮浩耕 主编

谈艺

于良子 著

数典

姜青青 著

鉴壶

寇丹 编著

纪茗

阮浩耕 胡建程 编著

习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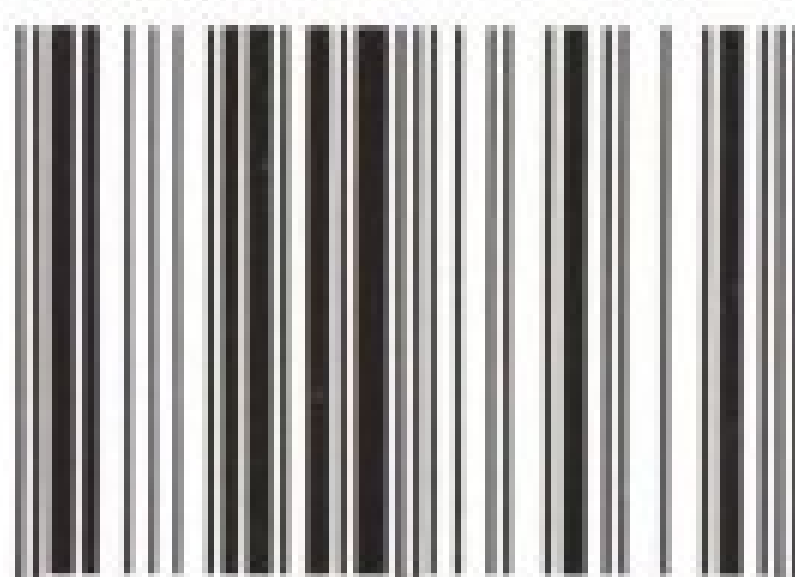
童启庆 寿英姿 编著

说泉

张科 著



ISBN 7-80686-463-6



9 787806 864630 >

ISBN 7-80686-463-6/T · 56 定价:16.00 元

中·国·茶·文·化·丛·书

数

姜青青
浙江摄影出版社 著

阮浩耕 主编

典



责任编辑 王文元
装帧设计 薛 蔚
责任校对 程翠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典/姜青青著. —修订本.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6.4

(中国茶文化丛书/阮浩耕主编)

ISBN 7-80686-463-6

I. 数... II. 姜... III. 茶—文化—中国
IV.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4785号

中国茶文化丛书

数 典

姜青青 著

出版发行 浙江摄影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5170300-61007、63902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富春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 彩 插 8

字 数 80 千

印 数 0001—3000

2006年4月修订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86-463-6/T·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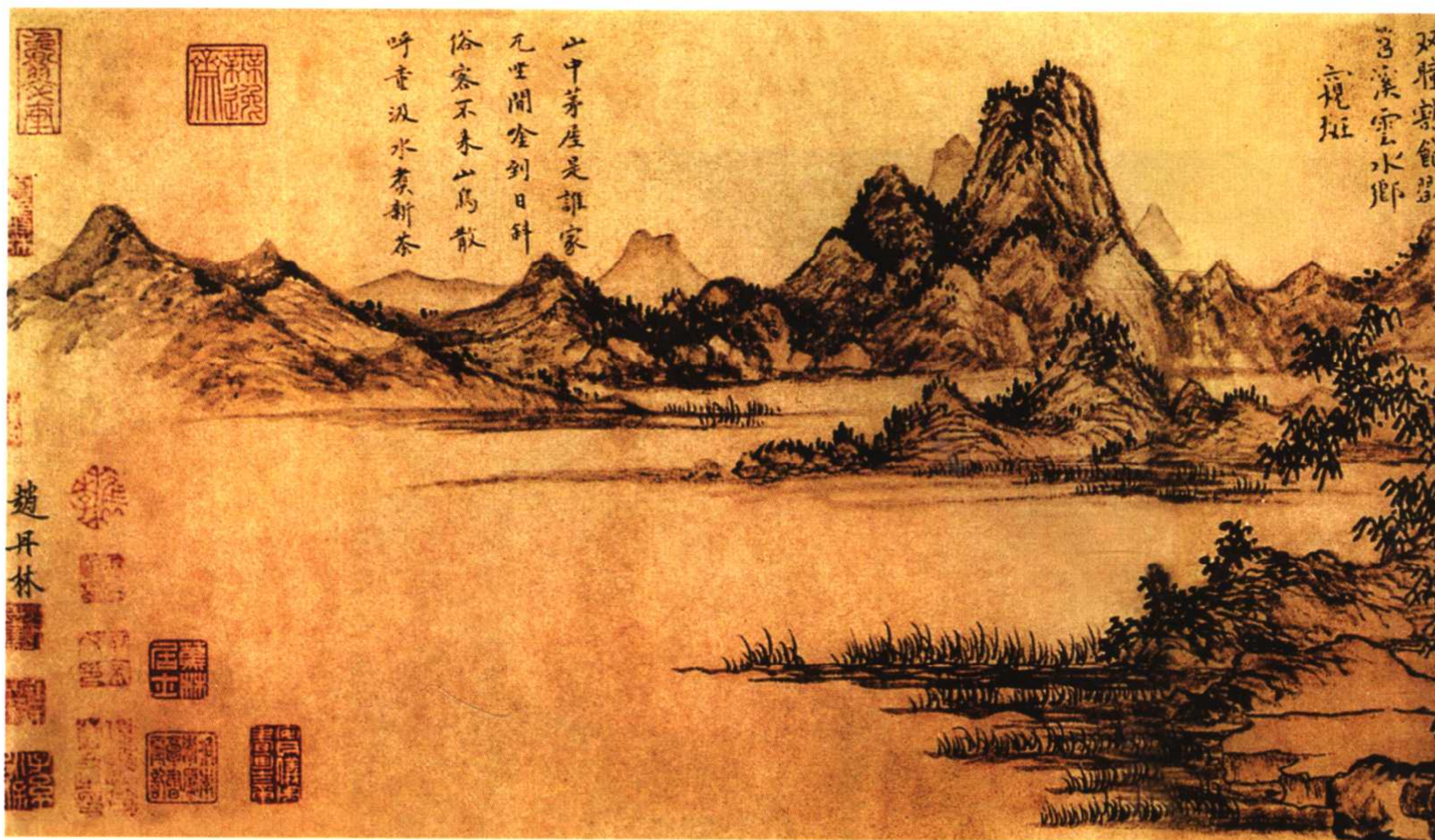
定 价 16.00 元



唐《官乐图》。这幅画作是唐室宫中仕女们娱乐饮茶场景的生动写照。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这幅画记载了古代僧人以茶待客的史实,再现了唐代烹茶、饮茶所用的茶器、茶具以及烹茶方法和过程。



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这幅著名的画作是顾闳中奉李煜之命所绘，画中几上茶壶、茶碗和茶点散放于宾客面前，再现了南唐贵族品茶听琴的生活场景。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图中远山起伏，水面平阔，草阁临溪，丛树掩映。阁内一童子拥炉烹茶，榻上一人，当为陆羽。





宋赵佶《文会图》。宋徽宗嗜茶成癖，常在宫廷以茶宴请群臣。此画描绘了宋代文人雅集的盛大场面。



宋刘松年《斗茶图》。此图真实地反映了盛行于宋代民间之“茗战”。画中四人，两人捧茶在手，一人正提壶倒茶，另一人扇炉烹茶，似是茶童。



《汲古阁图》。明代常熟人毛晋的藏书楼称为“汲古阁”，架列八万四千多册珍贵图书。



明丁云鹏《煮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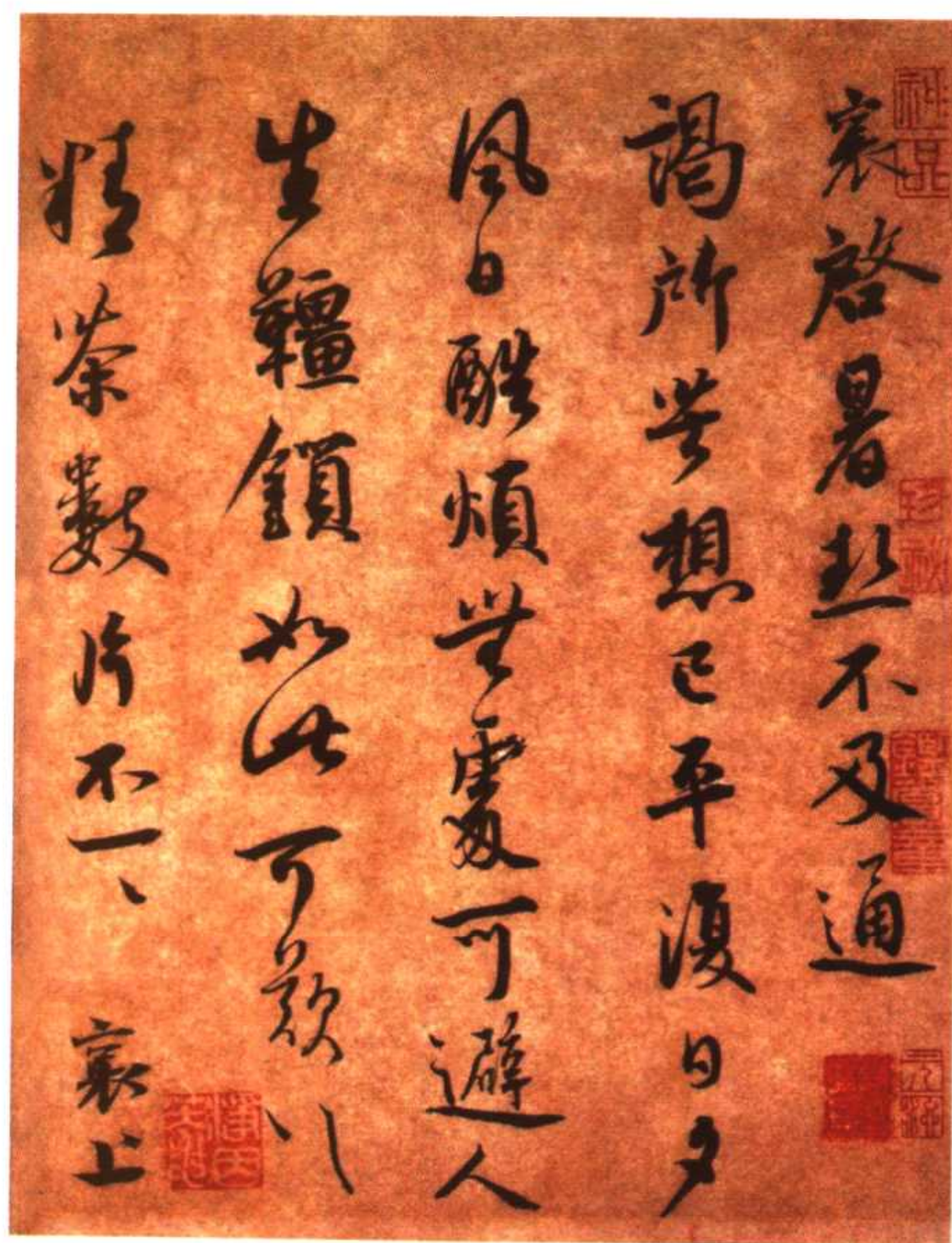
明丁云鹏《玉川煮茶图》。画中卢仝坐于蕉林修篁下，手执团扇，目视茶炉，正聚精会神候火煮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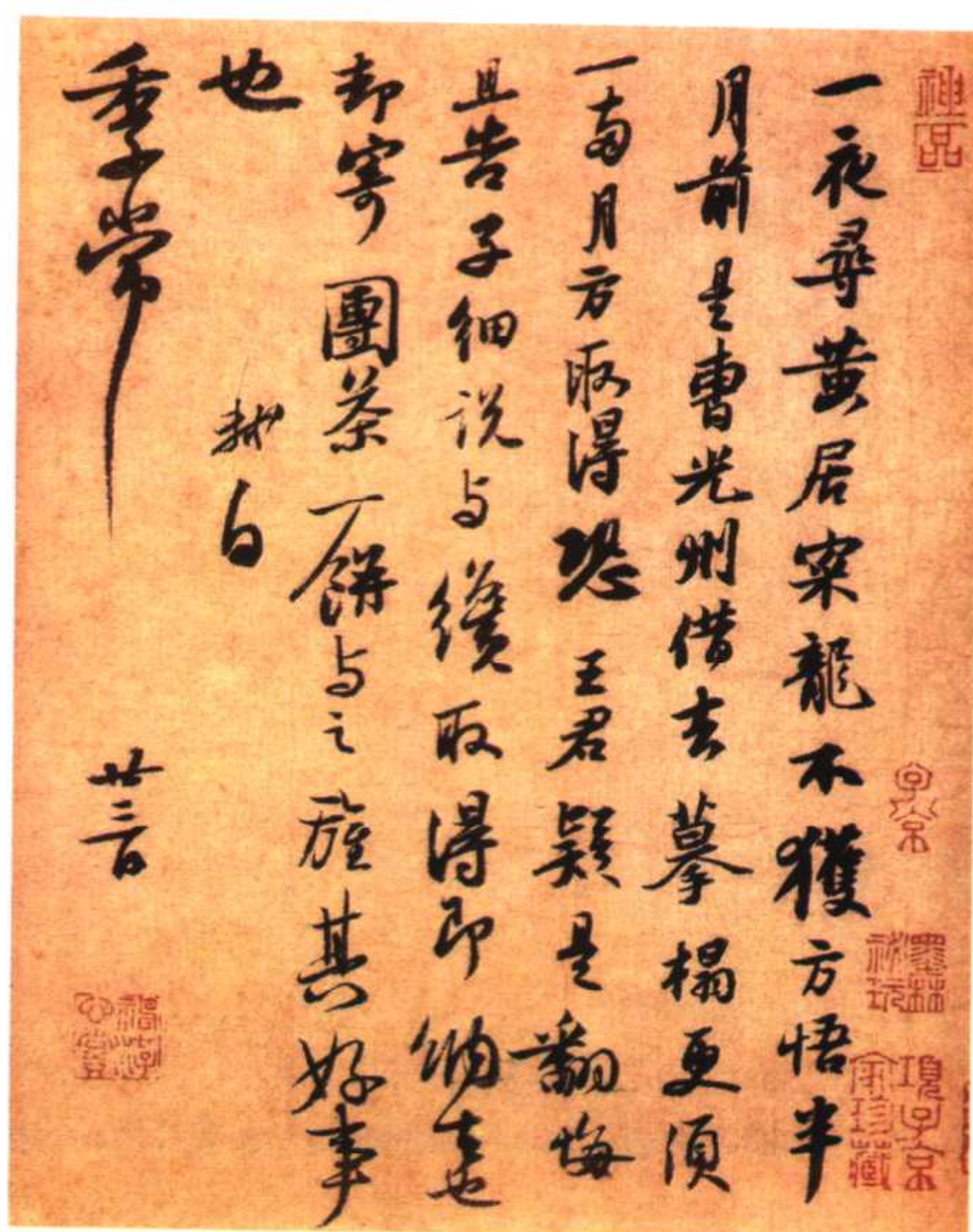


明文徵明《品茶图》(局部)。此画作于明嘉靖十年谷雨之后。茅轩中，主人与来访的得意门生陆子传相对而坐，桌上一把茶壶，两只茶碗，右侧小茅舍中，一童子正跪在风炉前煎水。画面充满文人逸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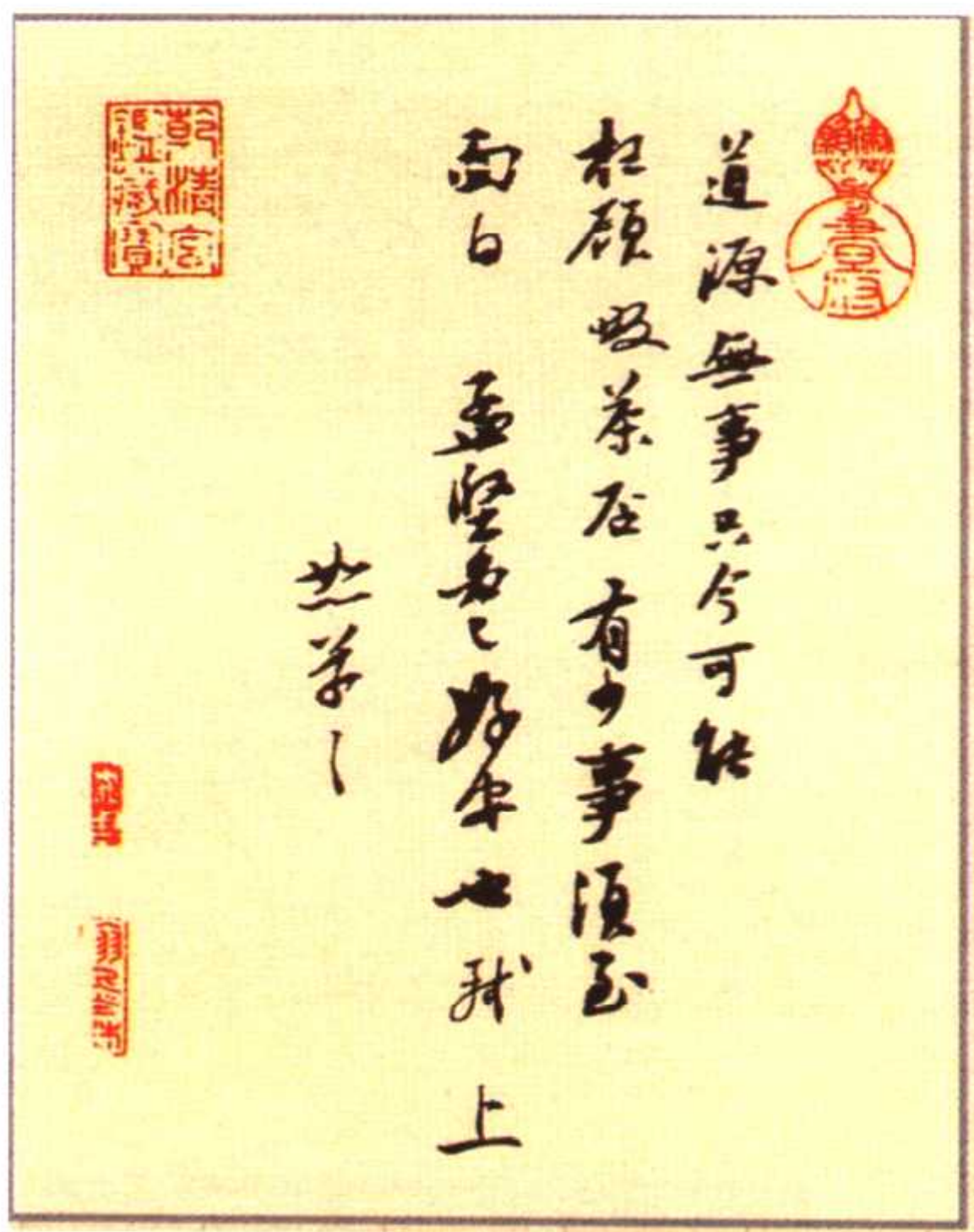
宋蔡襄《精茶帖》。此帖也称《暑热帖》，蔡襄在其中叙述了暑热之苦，却不忘给收信人送上『精茶数片』，想必这精茶定是解暑佳品。



数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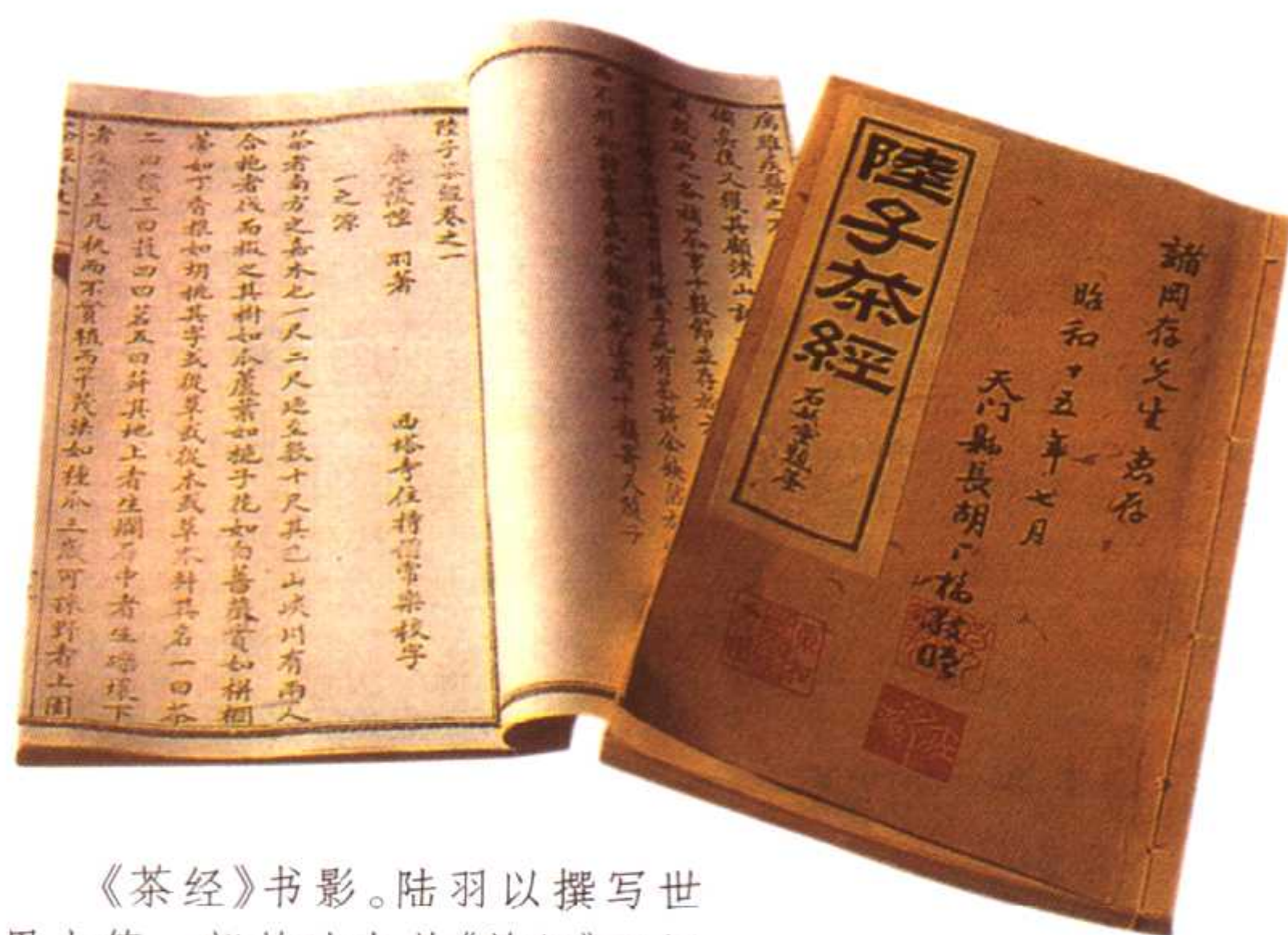
宋苏轼《一夜帖》。苏东坡在信中提及的『团茶』，虽与欧阳修宝爱的茶饼有大小之别、轻重之分，但都是当时人们交往中的馈赠佳品。



宋苏轼《啜茶帖》。苏轼既爱饮茶，又擅书法。在他的眼里，茶与书法有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内涵。



宋辛弃疾《去国帖》。这件书札为辛弃疾传世的仅见墨迹，又恰恰为淳熙二年在镇压赖文政茶商军后所作，弥足珍贵。信中所述，应该是他戎马倥偬、无暇旁骛、全力以赴扑灭茶商军暴动的生活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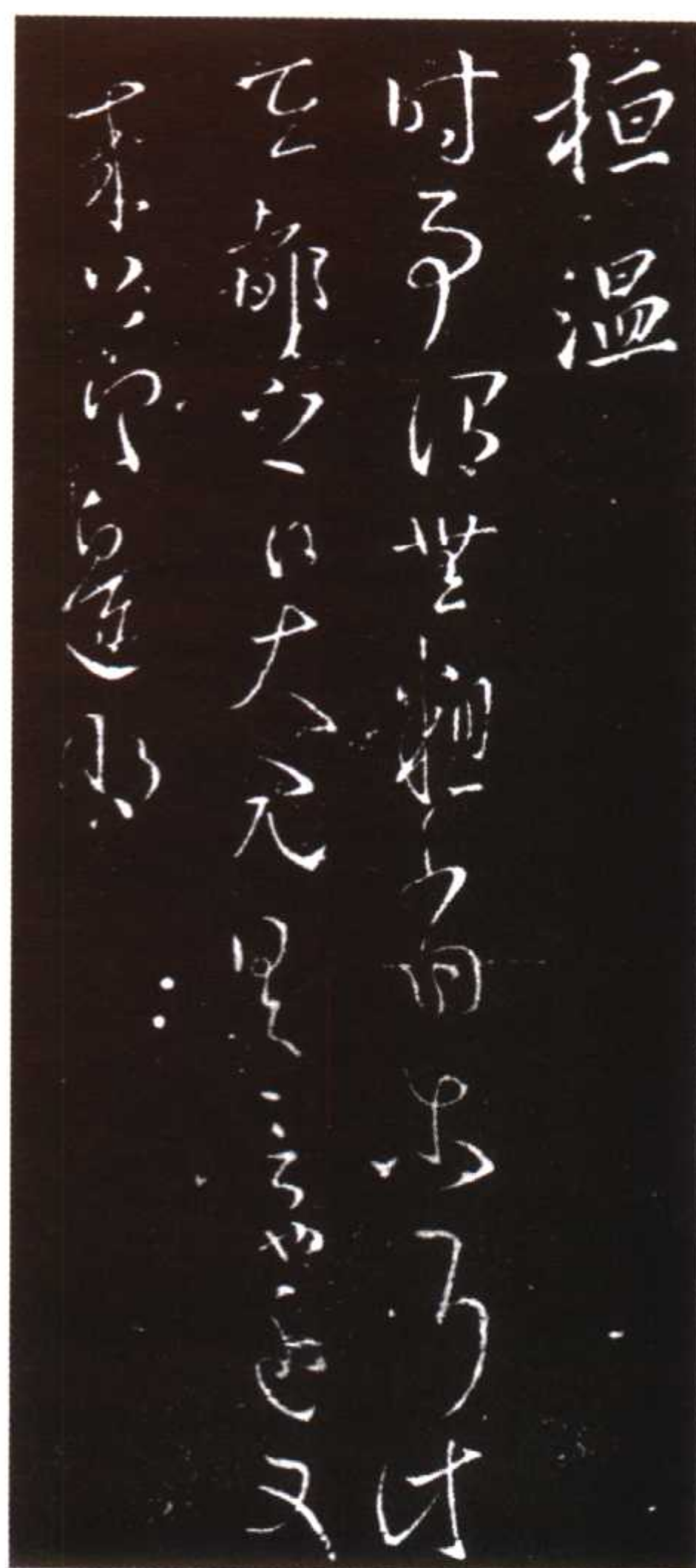


《茶经》书影。陆羽以撰写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后世，被誉为“茶圣”。



著名的“茶陵”石印可说是第一方明确与茶叶产地有关的印章。

「性俭」。桓温手迹。《茶经》引述了桓温为扬州牧时宴以茶果的一件小事，说明桓温





西汉木牍“茶筍”



卢仝像。唐诗人卢仝嗜茶，所作“七碗茶歌”脍炙人口，流芳百世。



南宋建窑鹧鸪斑盏。北宋陶谷《清异录》记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南宋银兔毫盏。盏釉色青黑，从内到外布满银兔毫，这是建盏的一大特点。建盏在宋代主流饮茶方式点茶法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受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雅士的青睐。



谢安

陸東岡



陆羽



宋太祖赵匡胤

数典

歐陽文忠公

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忍小有所畏而不敢
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東坡祭公
文中語也坡又序公集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
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



欧阳修



苏轼



宋神宗赵顼



宋徽宗赵佶



李清照



岳飞

中国文学史

数典



明太祖朱元璋



清高宗乾隆



清圣祖康熙

文化,直白地说就是生活的方式,文化渗透于生活之中。茶文化简单些说,即是人们喝茶品茗的方式、习俗和个中的情趣与感悟。

茶文化是一种大众生活文化,雅俗共赏,少长咸宜,香播九州。社会各个阶层、不同职业人群都有各自的喝茶品茗方式,他们又各自以所擅长的文学艺术手段,记录或抒发自己的茶情、茶趣和茶中的感悟,于是就有了茶诗、茶联、茶谚、茶歌舞及茶事散文、小说、戏曲和影视等。喝茶本身所需的名茶、清泉、美器自不必说,更融进了诸多的文学艺术元素。

这些喝茶品茗的方式、习俗、情趣和感悟,却似散落的珠子或碎片,经意者见之,有心者觅之。茶文化就像一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散落的珠子串联起来,又像一只变幻又规范的拼盘,将看似无意义的碎片组成有意义的拼图。

1993年,我们几个经意与有心于茶文化者创意编写了一套“中国茶文化丛书”,分列《纪茗》、《习茶》、《说泉》、《鉴壶》、《数典》、《谈艺》、《问俗》、《研书》八种。1995年出版以来这十年间,丛书多次重印,印量逾万,有的为海外出版社相中,出了海外版。

“中国茶文化丛书”由畅销而成为长销,今年又修订再版。鉴于丛书毕竟是十多年前所编所印,仍按原版重印未免有欠缺,故本次选取前六种再版,在内容上请作者进行了修订补充,在版面装帧上重新创意设计。新版“中国茶文化丛书”也算是对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推进茶文化产业发展尽一份力,是对读者厚爱的一份回报。

2006年雨水时节

阮浩耕同志来访,要我为即将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茶文化丛书”写序。我虽喜茶,但一不是茶学的专家,二不是茶道的行家,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两位我认为更适合的人选。他说,这套丛书并非完全是严肃的专著,而是融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之中,其宗旨是介绍茶文化的有关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人们的生活情趣。接着,他把丛书的书目拿出来给我看,其中包括《纪茗》、《习茶》、《说泉》、《鉴壶》、《谈艺》、《问俗》、《数典》、《研书》等八本书。而作者大多为省内外这方面的专家、教授,也有文艺界、新闻界的同行,有的还是我所认识、所敬重的朋友。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便再行推辞。何况,我在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还挂一点职衔,对于弘扬祖国的茶文化也有一份责任。

茶之作为文化,加以倡导,加以弘扬,古已有之。最早的当推唐代之陆羽。他所著的洋洋七千余言的《茶经》,千余年来流布海内外,被奉为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其本人也被尊为“茶仙”、“茶神”。《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传》一文中说:《茶经》一出,“天下益知饮茶矣”。

这个“天下益知饮茶矣”中的“益知”二字,说的就是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普及和升华。陆羽的伟大贡献,就是总括了在他以前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品饮茶、研究茶、颂扬茶的历史,并且身体力行作了长期的、广泛的实际考察和实践,以十分精练优美的文笔,系统地介绍和论述了迄他的时代为止的有关茶的全部知识和学问。把中国人,或者说把人类的饮茶从只是作为一种生理需要、生理现象,提高到了一种文化需要、文化现象,成为光辉灿烂的大唐文化,也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陆羽以来的一千两百余年中,历代均有茶学专著问世。据查,存有书目者不下百余种。其中著名的有温庭筠的《采茶录》、蔡襄的《茶录》、赵佶的《大观茶论》、许次纾的《茶疏》等。至于以茶与品茶为主题的诗词更是以千百计,仅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茶诗选》,就收有自唐至清的诗词两百余首。据选注此书的钱时霖先生说,仅他一人所搜集到的历代茶诗就有一千余首。茶诗影响之大亦不下于茶书。像唐代诗人卢仝的“七碗茶歌”,在日本也广为人知,传颂至今。

在当代,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茶文化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不少。像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由袁鹰同志主编的《清风集》,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佳著之一。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茶文化丛书”,从名茶、名泉、赏壶、品茶到茶俗、茶趣、茶书,融专论与杂谈于一体,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知识,提高文化生活品位。这样的丛书,就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而言,迄今还不多见。

如前所述,《茶经》一出,“天下益知饮茶矣”。但愿这套丛书一出,也能对当今之人饮茶、品茶、知茶产生积极影响,使茶在人们紧张的生活节奏中起一点调节作用,尤其是在世风纷扰、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一点“可以清心”的功效。徐渭在《煎茶七类》一文中,第一讲的就是“人品”：“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何谓“茶品”,读了这套丛书中的有关文字,自当心领神会,获益匪浅,在此就无须赘述了。

1994年处暑日写于杭州
深巷小楼之中

目录

序一 阮浩耕	武则天茶喻祸福 / 35
序二 于冠西	唐德宗始创茶税 / 37
引言:茶话与史话 / 1	李希烈反唐破茶税 / 39
周武王茶称贡品 / 5	平叛乱唐军护茶园 / 42
晏婴以茶为廉 / 7	唐文宗恭俭罢“冬茶” / 45
蜀王封邑名“葭萌” / 9	“搨地钱”茶商受盘剥 / 49
王褒《僮约》武阳买茶 / 11	陆羽分辨南零水 / 52
孙皓以茶代酒 / 13	茶神明鉴谷帘泉 / 55
晋惠帝瓦盂饮茶 / 15	积公必啜渐儿茶 / 57
刘琨茶解烦闷 / 17	陆公怒焚焙茶奴 / 59
陆纳以茶待客 / 19	奚陟摆茶会 / 61
桓温宴客举清茶 / 22	藏王数家珍 / 63
王子喝茶不认茶 / 24	李德裕明辨建业水 / 65
王濛客称“水厄” / 25	李卫公“水递”惠山泉 / 67
王肃谬论“酪奴” / 27	马殷卖茶国称殷实 / 69
齐武帝设茶作祭品 / 30	钱俶贡茶得以善终 / 72
隋文帝饮茶治头痛 / 32	蔡襄龙团细分明 / 76
	君谔善别石岩白 / 78
	欧阳修珍藏小龙团 / 80

-
- | | |
|------------------|-------------------|
| 黄庭坚“分宁一茶客” / 82 | 王世懋夜茶风味 / 135 |
| 苏轼妙言墨茶美 / 84 | 朱汝圭嗜茶拒瞻养 / 137 |
| 东坡妙题茶联 / 86 | 张陶庵品茶鉴水 / 139 |
| 王安石明断三峡水 / 88 | 汲古阁书板煮茶 / 142 |
| 拗相公误将药作茶 / 91 | 康熙御题“碧螺春” / 145 |
| 宋神宗初行茶马法 / 93 | 乾隆荷露煮香茗 / 147 |
| 高太后禁造密云龙 / 98 | 蒲松龄路设大碗茶 / 150 |
| 宋徽宗以茶宴群臣 / 101 | 纪晓岚“茶谜”救亲家 / 152 |
| 郑可简贡茶得官 / 104 | 鲁迅内山共施茶 / 154 |
| 李清照戏说茶令 / 106 | 老舍品味重《茶馆》 / 156 |
| 岳飞巧制姜盐茶 / 108 | 梁实秋买茶遭棒喝 / 159 |
| 陆游茶诗续《茶经》 / 110 | 吴觉农重撰新茶经 / 161 |
| 杨万里嗜茶如命 / 113 | |
| 辛弃疾诱杀茶商军 / 115 | 降魔大师以茶坐禅 / 166 |
| 嗜茶者名号种种 / 120 | 惟俨“点茶与这僧” / 169 |
| | 智常不让南泉吃茶 / 171 |
| 重风雅倪云林绝交王孙 / 123 | 松山请茶“何必再招呼” / 173 |
| 倪瓒煎茶显洁癖 / 125 | 马祖“吸尽西江水” / 175 |
| 禁私茶朱元璋怒斩驸马 / 127 | “且吃了赵州茶去” / 177 |
| 朱权行茶破孤闷 / 130 | 慧寂“酤茶三两碗” / 180 |
| 文徵明竹符调水 / 133 | 本先洗手漱口吃茶 / 182 |

引言·茶话与史话

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多以一段段散篇构成，每篇可以洋洋数千言，也可以寥寥十几字；可以记人记事，也可以辑诗录文；可以评头论足，也可以抒情咏怀。这种散点式、随意性的特色及其自由、轻松、活泼的文风，在文艺理论范畴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诗话的特点，有记人记事，也有议论评述。这主要考虑到历代文献中有关茶人茶事的记载多为一鳞半爪，不成系统，逸闻轶事似乎要比酒人酒事要少得多，尽管世上喝茶的人远比喝酒的人要多得多。采用一事一文或一人一文的形式，在写作上显得自由、灵活，易于成章。从这个方面上讲，读者不妨将这本书看做是一种轻轻松松的“茶话”。

但是，饮茶何时从一种口腹之欲进化而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又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变异的，目前尚未有一本专著论及，而本书写作的一大企图就是想从茶人茶事这个角度来把握茶文化现象的脉息，勾勒茶文化发展的脉络，以求得中华茶文化发展的一个概貌。基于这一考虑，作者还希望本书是一部比较准



确可信的茶之“史话”。

从对有关文献史料的爬梳、整理和分析来看,中华茶文化的流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南北朝以前、唐宋时期和明清以后这三大阶段。

南北朝之前这段时期,是茶文化的滥觞时期。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茶史资料来分析,中国茶业最早兴起于巴蜀地区,即今四川省一带,巴蜀地区可以说是中国茶文化的摇篮。这一点,读者可以从本书的首篇《周武王茶称贡品》以及《蜀王封邑名“葭萌”》、《王褒〈僮约〉武阳买茶》等文章中得到证实。

到了三国两晋以后,茶文化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茶人茶事在这一地区多有所见,打个比方,就好像是“孔雀东南飞”,而巴蜀地区反而显得有些默默无闻。这说明随着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茶文化的发展趋向在地域上也发生了变化。

茶文化重心在东移的过程中,比较突出地表现了一种廉洁的内涵。春秋时期齐国晏婴以茶为廉已有开此茶道精神的先河之功,到了三国时期吴国的孙皓,以茶代酒,也不自觉地“发明”了一种廉洁的好办法,东晋陆纳的以茶待客、桓温的举茶宴客,以及南朝齐武帝的将茶奉为祭品,都表现了当时以茶为廉的风尚。

唐宋时期是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茶文化发展到这一时期,从地域上看,已不再局限于四川或江南一隅,原来对饮茶一知半解甚至诋毁、排斥的北方地区,此时饮茶殆成风俗;原来根本不产茶的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此时也是“不可一日无茶”,茶一下子成为举国之饮。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看,中唐时期“茶”字字形渐趋稳定,更

值得称道的是，这时出现了被誉为“茶圣”的陆羽及其《茶经》，使茶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茶人辈出，他们对水、对茶叶、对茶具、对煎茶方法的刻意追求，更是到了完美、精妙的地步，以至于到了唐代后期和宋代，茶文化中出现了一股奢靡之风。

明清以后，是茶文化的终极时期。

茶在这一时期似乎出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现象，刻意追求好水的人少了，一味讲究贡茶的事也少了，茶人更讲究的是茶的真味和内在意味，并藉以找寻心灵的抚慰，或寻求一种物我合一的化境。像朱权为“破孤闷”而对茶的研究，王世懋、文徵明的清茶洗心、淡泊厌仕之举，张岱以茶会友的佳话，蒲松龄用大碗茶换取奇闻轶事等，都让人感受到了这一时期茶文化的扑面清风。

晚清以后，中国茶业走向衰落，真正称得上是茶人和令人称道的茶事已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茶学泰斗吴觉农先生（1897—1989）以其毕生精力，矢志不渝，重振中国茶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此之外，还应说明的是，在中华茶文化史上，禅僧是一种特殊的茶人，他们对茶的研究、理解和追求，迥异于世俗之人。宗教色彩和禅宗思辨的介入，使中华茶文化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有的现象：“茶禅一味”，由此而引出的诸多佛门公案，至今仍耐人寻味。

茶文化是一个博雅之堂，笔者初涉未久，见闻未广，思虑未深。故对照所谓“著书立说”，“书”是著了，“说”则未必已立。谨以此书就教于各位“茶博士”。

茶之为饮，孕于巴蜀。
三国两晋，茶事东顾。
南人“水厄”，北人“酪奴”。
天下分崩，茶亦茹苦。

周武王茶称贡品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即炎帝）。”并且还引述了《神农食经》说，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但有关神农氏之事毕竟太遥远，仅仅是传说而已，而且《神农食经》为何人所作、何时所写也无可查考，所以，饮茶始于神农氏之说并非确凿。就现在已知的文献史料来看，第一个把茶当回事的要算是周武王姬发了。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军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上贡。《华阳国志·巴志》中为我们开具了这样一份贡单：五谷六畜、桑蚕纀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





鸡白雉、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华阳国志·巴志》在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作者是东晋时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西北）人，是一个既博学又重实地采访的司马迁式的学者，他根据宏富的资料，于公元355年前撰写了这本有十二卷规模的书。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周礼》这本书中似可探知这茶还有别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即古“茶”字。掌荼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不仅供满足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时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要有一班人专门掌管。

此外，《尚书·顾命》中说道：“王（指周成王）三宿、三祭、三饔（即茶）。”这说明周成王时茶已代酒作为祭祀之用。

由此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即已有了相当高的地位。

晏婴以茶为廉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字平仲，后人称之为“晏子”，曾在齐灵公、齐庄公时为官，在齐景公时任国相。

他在植物研究上看来是颇下了点功夫的，譬如“橘逾淮而北为枳”的故事和“两桃杀三士”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前者他以橘、枳之事回击了楚王对齐人的讥讽，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后者则仅仅以两枚桃子就为齐王除掉了三个飞扬跋扈的武士，取得了内政上的成功。这种智慧让后人钦佩不已。

晏婴任国相时，厉行节俭。采集了晏婴事迹



晏婴担任齐景公国相时，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荤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

及其诤谏言词的作品《晏子春秋》中说，晏婴担任齐景公国相时，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荤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唐代“茶圣”陆羽把《晏子春秋》这段文字引入了《茶经·七之事》中。

但是，已故“当代茶圣”吴觉农对此却不以为然。吴觉农在其《〈茶经〉



述评》中说：“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期，居住在山东的晏婴，是否能在吃饭时饮茶，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从我国茶区扩展的历史来看，在春秋时期，除了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早已有茶外，我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山东，是还不可能产茶的。即使由于他身居国相，可能有人把茶作为礼品馈赠给他，但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还是茶的药用时期，晏婴是不可能把作为药物的茶与饭菜同时进用的。除此以外，又没有发现关于晏婴饮茶的其他记载，自也无法肯定他曾饮过茶。因此，陆羽把《晏子春秋》条列入‘七之事’中，作为春秋时代茶的史料，是不适当的。另外，‘茗菜’二字，有的版本作‘苔菜’，认为晏婴所吃的不是茶而是苔菜，那就更不应该把这条列入‘七之事’了。”

古今两位“茶圣”对晏婴吃茶一事看法截然不同，煞是有趣。

但也有人认为，“茗菜”就是茗菜，而不是茶和菜，也就是说，晏婴不是饮茶，而是吃一种叫“茗菜”的菜。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至今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人仍爱吃凉拌茶。茶菜叶色黄绿鲜翠，有咸辣之味，又有茶香，用以佐食蕉叶糯米饭，味道非常爽口。另外，我国南方有“龙井虾仁”、“碧螺虾仁”、“樟茶鸭”等茶菜，山东的孔府名菜“茶烧肉”也是一例。

不过，茶在周武王时为贡品，在晏婴看来却为低廉之物，一珍一廉，真是天差地别。但今天的茶人既求珍，也讲廉，品质上求珍，茶礼、茶道中讲廉，一点不偏颇，这是今人胜古人之处。

蜀王封邑名『葭萌』

我国现在以茶和茗命名的山、村、集、镇等地名约有三十多处，在县名中唯一出现“茶”字的是湖南省茶陵县。

茶陵古称“荼陵”。陆羽《茶经》中引述《茶陵图经》(已佚)的记载说：“荼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荼陵”的命名始于西汉，当初此地是荼陵侯刘沂的封地，所以又称为“荼王城”。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长沙国有十三个属县，荼陵便是其中的一个。荼陵县在隋代被取消，其地并入湘潭，直到唐高祖时才得以复置，但随即在唐太宗时再度被取消，一直到武则天时又复置。

但荼陵并不是最早的和唯一的以茶命名的县，相比之下，位于四川省剑阁东北的葭萌更具悠久历史，只不过因为它用了茶的另外一个称呼来命名，所以易被人们所忽视。

成书于西汉的《方言》记载：“蜀人谓茶曰‘葭萌’。”而在公元前4世纪时，“葭萌”还曾为人名和城邑之名。

据《华阳国志》记载，战国中期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时，蜀王把他一个名叫葭



萌的弟弟分封于汉中地区，号“苴侯”，并把苴侯所在的那个城邑称做“葭萌”。

当时，蜀人的政治中心在成都，而东边的巴人则以重庆为中心，两个部族居相错，行相仿，但并不和睦相处，向为敌国。

葭萌封疆称侯后，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竟与世仇巴王修好，相与往来。这一下触犯了兄长蜀王的禁忌，蜀王一怒之下向葭萌兴师问罪。葭萌以区区一侯的实力，哪里打得过蜀王，只好逃往巴国避难。蜀王岂肯善罢甘休，一不作，二不休，挥师直捣巴国。对这次战争毫无防备的巴王这时犯了一个大错，为了抵抗蜀兵，他和葭萌向北方秦国求援。

秦国世称“虎狼之国”，此时的秦惠王在谋士张仪的辅佐下，正大肆扩张兼并邻国。见巴国求援，秦惠王乘机出兵，于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攻灭了蜀国。接着也是一不作，二不休，挥师东进，一举灭了巴国与葭萌。

在这场战争中，秦国渔翁得利，大大扩展了领土。另外，它还得到了一项好处，那就是从此以后秦人知道了茶的作用，正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事”。

从巴人早在周武王时即已以茶为贡，蜀人后来又以茶名地的史实来看，先秦时期在巴、蜀两国不但饮茶已成风俗，而且这时的茶已成为两国比较普遍的一项生产事业。

根据古蜀国的历史传说，蜀王的名号往往与其业绩有关。比如“蚕丝王”，相传是一位驯育野蚕为家蚕的君主；又如“鱼鳧王”，相传是驯养鱼鹰以助捕鱼的创始者。那么，以茶为名的葭萌，是否该是中国最早的一位茶叶学者呢？

王褒《僮约》武阳买茶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在西汉时才出现。

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



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帖帖，王褒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

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髡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便了跟了王褒，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向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要不



然我可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帖帖,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难以负荷。便了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来看,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𩚑𩚑,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

对照《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

就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在此还有必要赘述一点,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这篇《僮约》,恐怕不会说如此武断的话,因为《僮约》提到“武阳买茶”这件涉及商品茶之事发生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5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要提前五个多世纪。

孙皓以茶代酒

从前面几篇文章来看,我国最初的茶事多发生在今天的四川省一带。而作为现在茶叶的主要产区江南,茶事的出现则相对要晚些。西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王孙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有位叫韦曜的酒量不过两升,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洋相,便暗中赐予他茶来代替酒。

这件事出现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韦曜,字弘嗣,原名韦昭,陈寿为避晋武帝之父司马昭的讳,改称韦曜,吴郡云阳人,以博学多闻而为孙皓所器重。

孙皓是一个暴君,他是吴国的第四代国君,也是末代君主,性嗜酒,又残暴。当他对韦曜颇为欣赏时,可以在酒席之间暗中作弊,偷偷地用茶换下韦曜的酒,使之得过“酒关”。但是当韦曜一旦违



吴侍中高陵侯常公

当孙皓对韦曜颇为欣赏时,可以在酒席之间暗中作弊,偷偷地用茶换下韦曜的酒。



逆其意,便翻脸不认人,拔刀以对。

韦曜为人耿直磊落,他可以在酒宴上暗地里玩些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把戏,但一旦事关国事,则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于是当他在奉命记录关于孙皓之父南阳王孙和的事迹时,秉笔直书,写了一些孙和见不得人的事,触怒了孙皓,竟被杀头送了命。

但是,“以茶代酒”一事直到今天仍多为人们提及,并称得上是一件大方之举、文雅之事。

在此顺便提一下,孙皓早先被封为乌程侯。乌程(今浙江湖州南)也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南朝宋山谦之《吴兴记》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苻”。“苻”即茶也。一般学者认为,温山出产“御苻”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即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是年景帝死,孙皓立)前后,并且还推断当时已有御茶园。

晋惠帝瓦孟饮茶

发明了“以茶代酒”的孙皓，在晋太康元年（280年）率吴国臣民向晋朝大军投降。晋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一统南北，结束了鼎足而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三国历史。

但是好景不长，仅过了十年，愚笨无能的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即陷入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战乱，八个司马氏宗室以夺取朝政大权为目的，展开了殊死拼杀，史称“八王之乱”。

晋惠帝在这场战乱中自始至终扮演了一个傀儡的角色，先是朝政落在汝南王亮手中，接着大权又旁落于凶狠狡诈的贾后之手。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起兵杀贾后，惠帝即被赶下皇位，后因其他宗室起兵杀死赵王伦，他才得以复位，但权柄又相继落入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手上，其中在太安二年（303年），东海王越率军挟惠帝进攻邺城的成都王颖，结果在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中惠帝被俘入邺，接着，成都王颖在其他诸王的联合进攻下战败，挟惠帝逃至洛阳，后又逃到长安，直到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消灭起兵诸王，独揽大权，惠帝才结束了动荡流亡的生活，回到了洛



阳。

惠帝作为一个傀儡，被诸王玩弄于股掌之间，终日以泪洗面，并经常随乱军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他作为九五之尊，感到最愉快的一件事竟是喝到了一碗茶。

“八王之乱”结束后，惠帝回到了洛阳宫里。但他的非人生活却没有结束，大权握于东海王越之手，饮食起居，一切都身不由己。

有一天晚上，一位近臣偷偷给他送了一碗茶。盛茶的茶具不是什么金银之器，只是一只瓦盂。但是在黑夜之中，这位皇帝尝到了这碗味道甘美的茶，他不禁连连叫好。

这碗茶，远无被周武王作为贡品时的身价，近无孙皓“以茶代酒”的佳遇，仅是朝臣无以贡奉，于万般无奈之下，盛于瓦盂，聊为君王解渴之用，其景悲夫！一段残乱历史的写照，一个困苦帝王的缩影，这是我们今天从这碗茶中所看到的。而惠帝的愚蠢之处是他在这碗茶中感受到的只是“味道好极了”，全不见“八王之乱”的残酷和自身处境的险恶。

果然，这碗茶并没有令他苦尽甘来，就在他回洛阳这年，东海王越六亲不认，犯上作乱，将他毒死了。

刘琨茶解烦闷

茶之于无能之辈如晋惠帝，不过是解渴之物，但对于壮志未酬的英雄豪杰像晋朝大将刘琨，却成了解闷之物。

晋光熙元年(306年)，也就是“八王之乱”的末期，东海王越在与诸王的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滞留在长安的晋惠帝即被东海王越“请”回京都洛阳。当时奉命前往长安迎还惠帝的便是刘琨。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东北)人。青年时与祖逖为友，两人枕戈待旦，意气雄豪，“闻鸡起舞”一典即出自他和祖逖。

当时北方匈奴见西晋八王互相倾轧，战乱频繁，即乘虚而入，蹂躏北方并州、冀州一带。光熙元年(306年)，刘琨任并州刺史，他剪除荆棘，招徕流亡者，孤军坚守并州近十年。建兴三年(315年)，刘琨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与代



刘琨以茶解闷，而且不喝则已，喝必好茶。



王拓跋猗卢约定共讨匈奴，但次年猗卢被其子所杀，部落星散，刘琨功亏一篑。匈奴羯人大将石勒率军袭来，刘琨悉发其众反击，石勒据险设伏，结果晋军覆没，刘琨被迫放弃并州。

刘琨作为一位志士，眼见晋室内讧，天下大乱，北方匈奴等胡族又乘虚而下，攻城掠地，后来竟在建兴四年（316年）灭了晋朝（西晋）。他自己虽率军于最前线与匈奴抗争，终因势单力薄，丧师失地，因此内心时常郁闷不安。常言道“解闷以酒”，但刘琨却以茶解闷，而且不喝则已，喝必好茶。

当时在北方边地的刘琨曾在一封给他的侄子南兖州刺史刘演的信中说：“以前收到你寄来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这些都是我所需要的。但是当我感到烦乱气闷时，却常常要靠喝一些真正的好茶来解除，因此，你可以给我买一些好茶寄来。”

南兖州在今江苏江都县东北一带。刘琨喝茶要寄信让在南兖州当官的侄子捎带，说明那时南兖州产茶，而且是好茶。刘琨长期处于只见刀光剑影，不晓品饮茶事的北方边地，却知茶可涤虑，千里求茶，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但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浅浅一盏茶，又怎么能慰藉人心呢？建武元年（317年），与刘琨结为兄弟的幽州刺史段匹磾（鲜卑族）推举刘琨为大都督，歃血为盟，传檄各地共讨石勒。后来却不料祸起萧墙，段匹磾的堂弟被石勒收买，从中离间，刘琨竟遭毒手，被段匹磾缢杀。刘琨终究是壮志未酬，遗恨千古。

陆纳以茶待客

一生中就曾喝过一碗好茶的晋惠帝在光熙元年(306年)被东海王越毒死后,西晋王朝由于连年战乱,元气大伤,勉强维持到建兴四年(316年),终于被匈奴刘氏所灭。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即帝位,是为东晋。

随着晋王朝政权的南移,当时在北方的士族纷纷南迁。在南北方人杂处相交过程中,茶作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显示出在南北方发展



出身北方士族的谢安,只有在陆纳家中会碰到以茶待客这一特殊的礼遇,而在更多的地方,所遇必佳肴盛饌。



的差异性。

四川曾是饮茶之风盛行的地方,而从三国时孙皓“以茶代酒”一事来看,江南也风行饮茶。但北方饮茶之事却罕有所闻。到了东晋时期,茶在南方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北方人因对茶尚处于一知半解的阶段,甚至闹出了笑话。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说,东晋新安(今河南浉池)人任瞻年少时即颇负声名,后因新安被北魏所占,被迫渡江南迁。有一次,任瞻在与众人一起饮茶时,问人说:“这是茶还是茗?”当他看到对方露出奇怪的神色时,赶忙辩解说:“我刚才是问这茶是热的还是冷的。”茶是冷是热还需相问?任瞻露出的这只“马脚”一时被传为笑柄。

下面这个发生在东晋孝武帝时的故事则更能看出南方饮茶之风远甚于北方。

在淝水之战(383年)中卓有政绩的谢安与吏部尚书陆纳交好有年,谢安常去陆纳家拜访。对这位已位居卫将军之职的贵客的上门,陆纳并不大肆铺张,盛席相待,只是清茶一杯,辅以鲜果而已。对此,陆纳的侄子陆倕非常看不惯,背地里常埋怨叔父不会做人,但又不敢当面对相责,于是有一次知谢安来访,陆倕便自作聪明,暗地里准备了足够十多人吃的菜肴。谢安来了,陆纳照例是以茶果款待,而陆倕却为谢安一行摆出了丰盛的筵席,山珍海味,美酒佳饌,好不诱人。席间,陆纳没说什么,谢安走后,陆纳火冒三丈,叫人把陆倕狠狠打了四十棍,并且怒斥道:“你这小子不能给叔父增半点光,却为何来玷污我一向谨持的朴素之风!”

谢氏一族原是北方的世家大族,而陆氏在孙吴之后即为江南大族。陆纳认为客来敬茶是最好的礼节,而且颇能显示自己的清廉之风和高雅之举,在像谢安这样的权贵面前尤其

能展示一种不卑不亢的风范，所以陆纳在官场交际中视以茶相待为举足轻重之事，于是陆倕的弄巧成拙才招来一顿乱棒。但陆倕之举也足以证明，当时珍馐必具的盛筵风行于官场之中。出身北方士族的谢安，只有在陆纳家中会碰到以茶待客这一特殊的礼遇，而在更多的地方，所遇必佳肴盛饌。

从孙皓的“以茶代酒”到陆纳的“客来敬茶”，显示出饮茶在江南地区已有深厚的基础，而在北方、在已经南迁的北方人中，饮茶还是一件令人陌生的事。

桓温宴客举清茶

如果说陆纳的以茶待客真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朴素之风,那么,桓温宴客时所摆的清茶,就绝对不是秉性节俭的表现,而是借此提高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最终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茶在桓温手中完全成了沽名钓誉的幌子。

桓温(312—373),字元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出身士族,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他曾三次率大军北伐,借收复中原来收揽人心,提高个人的威望,觊觎帝位。由于带有极端个人利欲的目的,所以他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如永和十年(354年),他首次北伐率军进至与前秦之都长安仅一步之遥的灞上,便想坐待秦军自溃,以不战而胜来抬高自己的威望,结果被秦军抢收了春麦,坚壁清野,晋军因军粮不继而被迫南撤。第二次北伐,在攻下洛阳后,为了要挟朝廷,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并主张将东晋立国以来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全部迁回河南,从而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猜忌和南下士族的反对,力量内耗,洛阳终于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曾一路所向无敌,至邺城两百余里时,桓温又一次企图坐取全胜,以赢得朝野之口碑,结果敌援大至,惨败而

退。

兴宁二年(364年),已位至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又被加官为扬州牧。此时的桓温,一举一动都顾及自身形象,为了表示在生活上一贯清廉节俭,每逢请客宴会,用以招待的只有茶和果。陆纳出任吴兴太守之前,去向桓温辞行,谈话间问及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的这种虚伪的简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记载了“宴客以茶”一事的《晋书》的作者是受了他的蒙骗,以为桓温是“性俭”而有此举。

其实,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茶来玩弄政治权术的人。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自己专擅朝政。次年简文帝死,野心勃勃的桓温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称帝的最后图谋。此时,一代名臣谢安出山,他得知桓温已染重病,便与他巧妙周旋,拖延时间,桓温终于未能加九锡而“抱憾”病死。

桓温的“尚茶”之风在当时的影响从一位督将的故事中可见一斑。桓温部下有位督将因身体虚热,喝上了茶,后来越喝越厉害,经常非得喝上一斛二斗(即十二斗,一斛为十斗)才感到舒服,略减个几升便觉得不满足,以致后来家境贫困。有人问:“这是什么病?”一位“有识”之士说:“这个病叫做‘斛二瘦’。”

这则故事出自《续搜神记》,实属怪诞、夸张,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地区,虽然早已有栽种茶树的历史,但喜欢茶者少。这倒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茶,实在是对茶的苦涩难以忍受。现在尚无法考证那时茶的采制工艺和煎泡手艺如何,但大致可以肯定尚未达到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茶在山林寺观中却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美感来。

记述南朝刘宋史实的《宋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孝武帝时,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一起前往八公山(今安徽寿县北)访昙济道人。昙济以茶相待,两位王子饮后啧啧称奇,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茶,刘子尚说:“这真是甘露啊,岂能说是茶!”

这两位王子也曾饮过茶,但其茶苦口不堪。现在八公山上昙济之茶美如甘露,反而不相信也是茶。可见当时好茶难见,佳茗难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茶事不见繁荣的原因。

王濛客称『水厄』

东晋之初，北方士族如任瞻之流因对茶事一知半解而出洋相，不过让人一笑而已。更有甚者，因不惯饮茶而对茶大加贬斥，尤其无知而可笑。

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是位饮茶成癖者。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却是己所癖好，必施于人，于是凡有客来，无论是谁，王濛必敬之以茶。客人中有很多人不知茶事，不惯茶饮，难忍其涩，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饮，真是深受其苦。久而久之，不得不去拜见这位司徒长史时，这些人便在背后苦笑说：“今天又有水厄了！”即今天又要遭遇那强饮苦涩茶水的厄运了！

“水厄”，这是茶在中国历史上得到的第一个贬称。

值得回味的是，西晋人张载去四川成都游览了名胜白菟楼后，作《登成都楼》赋，其中赞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说在水、浆、米酒等六种饮料中，茶最为芳香，且蜀地茶香早已散布各地了。

在张载称赞茶为“芳茶”，誉其“溢味播九区”的几十年之后，东晋之都建康的许多官吏



居然对饮茶还深以为苦,这充分反映了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由于从三国到两晋这两个世纪中,天下你割我据,兵戎不断,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相融,所以各地区之间茶文化发展水平差异非常显著。

从“水厄”之事以后,经半个多世纪,到了南朝刘宋之初,女文学家鲍令暉(鲍超之妹)写出了《香茗赋》,极言茶之香,茶苦之说在江南这才少有市场了。

茶在南方名声不振,被人称之为“水厄”,在北方就更是为人所耻,打个比方,与那些北方人喜好的食品如奶酪摆在一起,茶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个奴婢。这就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在中国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南朝齐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肃,字恭懿,是雍州刺史王奂之子,瞻学多通,才辞美茂,任秘书丞之职。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王肃因父兄被齐武帝所杀而投奔北魏。

王肃原先便极好喝茶,投奔北魏后,饮食上初时仍习惯于喝茶,吃菜偏爱鲫鱼羹,对羊肉和奶酪之类碰也不碰。他因善饮,据说一次能喝茶一斗,所以洛阳(北魏之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漏卮”,意谓这张嘴好像破漏的杯子,喝了还要喝,老添不满,永无厌足。

几年以后,王肃对羊肉、奶酪之类已能接受。有一次,他在宫里用餐,居然吃了很多的羊肉和酪粥。北魏孝文帝元宏见状甚感奇怪,于是问他说:“以你汉人的口味比较,羊肉和鲫鱼羹,茶和奶酪,究竟哪个味道好?”



王肃的回答很不一般,他说:“羊是陆产之物中味道最鲜美的,鱼则是水产中的第一美味,两者各有至味,都可称得上是佳肴珍馐。如一定要比一下,那只能说羊好比是齐鲁这样的大邦,鱼则是像邾莒之类的小国。这里只有茶是最不中用的东西,它最多只能给奶酪做奴仆(“唯茗不中,与酪作奴”)。”王肃这番“精彩”的奇谈怪论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

当时在一旁的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你不怎么看重齐鲁大邦而偏爱于邾莒小国,这是为什么?”

王肃仿佛乡情难忘似的说:“这是我们家乡最好的东西,我不得不偏好啊。”

元勰又对他说:“那么你明天到我府上来,我专门为你摆一邾莒之食,还有酪奴。”

“酪奴”作为茶的一个别称,因此而传开了。

王肃如此这般地贬茶,在当时曾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孝文帝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尤其心仪汉民族文化,如改原来的姓氏拓跋为汉姓元,请汉人做官,与汉人通婚等。当时朝廷大臣中已有不少汉人。为了照顾像王肃这种喜好饮茶的人的习惯,朝中宴会上都设有茶水。但是因为王肃有“酪奴”之比,居然所有的人都视茶为耻,决不再喝,只有一些新近从江南投奔来的人因不知此典才好饮茶。

当时有位叫刘縯的朝臣钦慕王肃的好饮之风,也专门研究起喝茶来。元勰知道后,对他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不屑去仰慕席设八珍的王侯之风,而去追求奴才下人的‘水厄’之事,太没出息了!古时候海上有逐臭的蠢夫,村里有学颦的丑妇,而现在你就是这种人。”把刘縯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极为尴尬。

“水厄”一典出自东晋王濛,北方人原是不知道的,但因

为元勰家中有来自江南的奴仆，所以他知晓这一典故。但奇怪的是，南朝一些皇亲贵族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闹出笑话来。如梁武帝之子西丰侯萧正德投奔北魏后，有一次宗室元乂打算以茶招待他，先问道：“卿于‘水厄’多少？”意思是“你的茶量怎么样”。却不料这萧正德肚中没一点学问，答非所问地说：“下官虽出生于水乡，但从来没有在水上碰到什么灾难。”元乂和满座宾客闻言皆捧腹。

王濛嗜茶而被人称为“水厄”，王肃嗜茶又自贬茶为“酪奴”，可见其时无论南方北方，茶之境地“苦”不堪言。

南朝宋刘敬叔撰有《异苑》十卷，这是一本记载了许多奇异故事的书，其中有这样一件事：

浙江剡县（今嵊州）陈务之妻年轻守寡，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陈务妻嗜茶，因为宅地有个古墓，她每次在喝茶之前总要先用茶祭祀一番。两个儿子对她的这种行为很是讨厌，要把古墓扒了，后经她苦苦劝阻方才作罢。一晚有人托梦感谢她，说在墓中已三百年，“赖相保护”，又享“佳茗”，故要报答她。天亮后，她果然在院子里发现十万铜钱。两个儿子知道后很是惭愧。从此以后，他们以茶祭奠更加虔诚了。



萧曠景安陵陵區內的麒麟

撇去这则故事的迷信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朝时茶在民间已用作祭祀。而南朝齐武帝萧赜也把茶作为祭品,则说明了茶也参与了宫廷祭祀活动。

据《南史·齐本纪·上》记载,齐武帝在遗诏里说:“我死之后,在我的灵前千万不要用牺牲来祭我,只要供上些糕饼、茶酒和果脯就可以了。”他还以己推人,广为推行,要求不但对他是如此,天下无论贵贱,都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做。

齐武帝萧赜是南朝齐第一代君主高帝萧道成的长子,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帝王,又是一个佛教徒,不喜冶游会宴。相传南朝宋时的僧人法瑶吃饭时少不了要饮茶,到齐武帝时法瑶已七十九岁了,齐武帝还传旨吴兴的地方官请法瑶到建康来一晤。齐武帝在位十年间无大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齐武帝以茶作为祭品,乃是受法瑶的影响和出于其佛教徒的身份表示对简朴的推崇。茶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它的两重性,既可登大雅之堂,被敬作祭品,又不失简朴无华之风。萧赜算是慧眼识茶,即使以今人的眼光去看,他也算是个好茶而知茶的茶人。据《周礼》记载,先秦时周王室也用茶作祭祀,但与萧赜之举相比,则显然少了简朴之意,而崇尚简朴正是萧赜的难能可贵之处。

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我们从现代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在中国把茶作为随葬物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一只竹箱上系有一块写着“𣎵笥”的木牌。“𣎵”是“茶”的别称,“𣎵笥”就是“茶箱”。以茶作祭的习俗,在我国一些地区沿用至今。



隋文帝做了个恶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在南北朝之前饮茶之事以四川和江南地区相对为多，这与我国茶叶生产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为主有关。而在黄河流域，尽管三千多年前巴人曾向周武王贡茶，还有春秋时齐国晏婴食茶

之说，但从《洛阳伽蓝记》中“酪奴”的故事以及其他许多文献来看，北方地区的茶事相对要落后些。

那么，黄河流域饮茶到何时才比较普遍呢？隋文帝杨坚在此是个关键人物。

杨坚（541—604），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武帝时袭爵隋国公，大定元年（581年）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攻占陈都建康，俘获陈后主陈叔宝，陈灭亡。至此，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隋书》中记有一个颇为怪诞的故事：某夜，隋文帝做了个恶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后果然见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时人们竞相采啜茶叶，民间有一“赞”云：“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意即苦心钻研孔子的《春秋》，殚精竭虑演绎讖书《河图》，想出人头地，还不如有许多茶喝来得快活。

隋文帝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局面，饮茶等民俗文化才得以迅速交融。而且隋文帝以其帝王之尊而嗜茶，于是普天之下（尤其是黄河流域）茶不再被卑视为“酪奴”。从茶文化角度来看，隋文帝同样立有一功。

茶之品鉴，唐始流布。
陆羽称神，《茶经》作书。
逮宋奢靡，君臣乐乎。
茶艺工绝，茶人辈出。

武则天茶喻祸福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

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行从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着出行的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

武则天(624—705),名曩,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改国号为“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记载。据明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十分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记载。

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损耗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知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



的帝王在政治上的鉴戒。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鯖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但“作者”却不是武则天。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鯖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作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符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

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固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唯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唯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东都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现代科学证明，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之才。

唐德宗始创茶税

饮茶在盛唐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当时除了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茶风日盛外，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也盛行饮茶，大凡交通沿线，随处都有茶摊、茶铺，不分道俗，投钱可饮，十分方便。江南各地的茶则源源北上，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不只江南和江北产茶，中原地区以至黄河之北也出产名茶了。

这时，有一位皇帝在大臣们的议论中看到了茶已与盐、铁一样为百姓日常所需，有利可图，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茶税征收。这位皇帝就是唐德宗李适。



唐德宗茶税一征，财源滚滚，却不知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唐德宗李适（742—805）是唐朝第十代皇帝。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李豫死，李适即位。即位之初，唐德宗励精图治。当时“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天下依然纷乱，朝廷势弱。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必须强兵强政，加强中央集权。唐德宗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实



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年夏秋两征。这一新税制适应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具有进步意义。

唐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敏锐地看到,饮茶的风气已在百姓中普遍形成,便向德宗提议征收茶税,十税其一。德宗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于这年开始对茶叶征税,由负责对盐、铁征税的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当时除茶之外,还有漆、竹、木等也被列为征税对象。茶税之法从此被建立起来,以后历朝历代多有修订,逐渐完善。

唐德宗茶税一征,财源滚滚,却不知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的益昌(今四川昭化)令叫何易于,开征茶税的诏令下达后,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益昌是个穷困之地,不征茶税这里的百姓已不太活得下去,若要再强征什么茶税,百姓必定是死路一条。于是他便叫一小吏把诏令搁置于一边,不征茶税。但他们非常清楚,违拒诏令,这是要杀头的罪!

小吏思虑再三说:“如果我来顶罪被杀头后,你能否免除被流放之罪?”

何易于却说:“我既然不以保全自身一命来移害于百姓,也决不会让你们来替罪。”言罢,他做出了令人不可想象的举动:自焚。

何易于死后,其上司因平时对他颇为赏识,也就没有再上本参劾他。

这是由茶税之法引出的第一桩命案。

李希烈反唐破茶税

唐德宗于建中四年(783年)采纳赵赞之议征收茶漆竹木之税,何以第二年就又下诏将其取消了呢?原来,这期间发生了一场差不多可与“安史之乱”相提并论的战乱,使唐德宗和当年的唐玄宗一样,仓皇离京远逃,一时间,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不得不取消了茶漆竹木之税。

唐德宗即位之际,“安史之乱”带来的恶果“藩镇割据”已经形成。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指使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出兵消灭了割据在湖北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但是,李希烈将梁崇义的地盘占为己有,日见跋扈,引起了唐德宗的不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以十四州反叛唐朝政府,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经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一起抗拒中央,兵锋所向直指唐朝京师——长安。

唐德宗见势不妙,即调遣驻守淮西周边的军队讨伐李希烈。但是,诸路兵马皆观望不前。叛军势如破竹,攻陷中原重镇汝州(今河南临汝)、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唐德宗慌不择路,听信近臣之言,诏命三朝大臣、名重海内的



颜真卿赴许州宣慰李希烈,幻想通过颜真卿的游说,使李希烈革心悔过,从而不劳军事以平叛乱。但是,颜真卿一到许州,即被扣押成为叛军手中的人质。唐德宗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哪晓得泾原兵在路过京师时突然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近在咫尺的唐德宗措手不及,慌忙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不久,又有人援的节度使率兵叛乱,唐德宗又逃到了梁州(今陕西汉中)。

唐德宗逃离奉天后,对这次引起藩镇叛乱的原因作了深刻的检讨,对采纳赵赞之议征收茶漆竹木之税以为平常之开销这件事感到十分后悔,于是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下诏罢了茶漆竹木之税,以收买人心。

李希烈的叛乱经年累月,作恶日久,其危害远远不止对唐朝在茶漆竹木等方面税收的破坏。叛军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中原地区屡次大破唐军,攻城掠地,贻害无穷。兴元元年(784年),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遂在汴州(今河南开封)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以汴州为大梁府。李希烈的称帝对立志要振兴唐帝国的唐德宗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一代名臣颜真卿最后也于贞元元年(785年)惨死在叛军之手,朝野上下为之震惊、悲痛不已,且不知这股祸水将为害多久、多重。幸而唐将李晟、马燧等用兵有方,接连重创叛军,平定了朱泚等部叛军。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被其部将陈仙奇鸩杀,陈以李希烈所占的地盘归顺唐朝,这一灾难性的叛乱方才被平息。这以后,直到贞元九年(793年),唐朝政府才恢复对茶叶征税。

据《册府元龟》等文献的记载,贞元九年正月开始恢复的茶税,缘起于诸道盐铁使张滂的一道奏章。张滂向唐德宗建议,去年全国有不少地方遭受水灾,诏令减免了许多税收,但

是现在国家的财政开支所需还是要有一定的储备,所以能否在那些出产茶叶的州县,以及茶商必经之路设立征税点,仍然按照第一次征税的标准,十税其一。张滂还建议,如果那些上缴茶税的州县遭受水灾和旱灾,先前所征收的茶税即可用以赈灾。唐德宗准其奏,并委任张滂全权处置征税事宜,结果当年就征得茶税四十万缗,茶税从此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但是,后来茶税年年上缴,唐朝政府年年都有数十万的巨额税收人,却没有哪一个遭了天灾的州县得到过赈济。

唐贞元二年(786年)四月,叛唐的李希烈被其部将陈仙奇所杀,陈以李希烈所占的地盘归顺唐朝,淮西叛乱被平息。但是不久,陈仙奇又被李希烈另一部将吴少诚所杀。吴少诚拥兵自重,淮西复又出现和中央朝廷抗衡的局面。



唐宪宗下诏给寿州地方官,命令寿州调派三千军队专门来保护其境内的茶园。

吴少诚死后的继任者是吴少阳,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仍然割据称雄,此时已是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

在唐朝中央政府与淮西割据势力相互征战的过程中,地处淮西侧后的寿州(今安徽寿县)是双方必争之地。寿州与淮西吴氏的大本营蔡州(今河南汝南)相距不远,当初吴少诚就曾经出兵攻打过寿州,侵地杀官,抢夺当地的茶园,一度还占领过寿州的部分地区,引起朝野的震动。贞元十五年(799年)八月,唐德宗诏令诸道进兵讨伐吴少诚,寿州随即成为唐军的前沿“阵地”之一。到了吴元济时,唐军在寿州

又多次与淮西叛军发生激战。

当时的寿州除了其军事价值外，经济价值也为双方所重。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在讨伐吴少诚的诏书中，除了指责他“擅动甲兵，暴越封壤”之外，还特地指出叛军对寿州茶园“辄纵凌夺”。寿州地区多茶山茶园，是唐代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据《茶经》和《唐国史补》记载，唐朝时寿州地区有名的茶叶就有寿州黄芽（又名“霍山黄芽”，以产于寿州霍山出名）、天柱茶（也是霍山的名产）和小岷春（产于寿州盛唐，即今安徽六安）等名茶。清道光本《寿州志》也记载说，唐宋时期寿州六安和霍山一带就出产茶叶。时至今日，这一地区的霍山翠芽、天柱银毫和六安瓜片仍是誉满全国的名茶。

在唐军平定淮西叛乱的过程中，寿州茶叶也成了双方争夺的重要物资。吴少诚病死后，吴少阳在蔡州暗中招募亡命之徒，牧养战马健驴，并经常出兵劫掠寿州地区的茶山，其目的是以所夺茶叶作为军需。据《旧唐书》记载，吴少阳据蔡州凡五年，“时夺掠寿州茶山之利”。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同样垂涎于寿州的茶叶。但唐朝政府偏偏对寿州茶叶也极为重视，据《册府元龟》记载，元和十一年（816年）二月，正当唐军和淮西叛军相持不下的时候，唐宪宗下诏给寿州地方官，命令寿州调派三千军队专门来保护其境内的茶园。从双方对寿州茶园的重视可见茶叶经济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而另一方面，长期战争的巨大消耗使唐朝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中央府库的积蓄已几近枯竭。于是，在元和十二年（817年）五月，唐朝政府被迫拿出府库所存三十万斤茶叶作为财政支用。

由此可见，茶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其实已经可与金银玉帛相提并论，具备了货币的功能。而唐王朝调集军队保护寿



州的茶园生产,其实就是在竭力保护自己的财源。由皇帝下诏特派军队保护一个地区的茶叶生产,这乃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在对吴元济的处置上,唐宪宗力主用兵,他任用主战的裴度为相,调兵遣将,进攻淮西。这是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割据势力的又一次大决战。但是,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不力,战争一拖就是三四年。直到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在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后,唐朝名将李愬利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突然进兵袭取了吴元济的巢穴蔡州,擒获了毫无防备的吴元济,这才最终平定了淮西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袭蔡州”的故事,而隐藏在这个故事之后的“茶园之争”却鲜为人知。

唐文宗恭俭罢『冬茶』

唐宝历二年(826年),时年十八岁的唐敬宗被宦官谋杀,其弟十七岁的江王李昂被群臣拥立为帝,是为唐文宗。唐文宗即位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大行“俭约”之举:释放三千宫女,停废执掌宫廷事务的冗员一千两百多人,地方所进的歌女全部放还,连同原来供皇帝打猎游乐之用的鹰鹞也都全部解放。除此之外,宫内停造工艺复杂、镶嵌珍宝的家具,住处不得有花蜡结彩的华丽装饰,宫廷外的御马坊和毬场退还给军队,原来的大殿和亭子一并拆除,余下的房子全部留给士兵居住,等等。

唐文宗这番举措并非装装门面的,确实是出自他的真心本意。在即帝位之前,他就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并且十分留意唐太宗的为政之道,对父兄两朝(唐穆宗、唐敬宗)的奢华之弊也深有体会,所以即位之后,他就想革除弊端而有所作为。在他做皇帝的十四年中,崇尚节约、克己奉俭的事确实做了不少。

据《旧唐书》记载,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正月,江南和四川两地向朝廷进贡了一批新茶。与往年所贡不同的是,这次的新茶两地都是在冬天时用了新的办法生产出来的,所以



在进贡的时间上要比其他地区早得多。但是,偏偏唐文宗为人恭俭,不喜奢靡,也不喜欢这种违背自然常理的东西,所以马上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两地所贡新茶宜于立春以后造。

如今在杭州西湖出产龙井茶的地区,茶农多以大棚生产新茶,以至于每年在立春之前就有大量的新茶上市,使西湖龙井茶中原本极为珍贵的“明前茶”(清明节前数日所产之茶)竟成平常之物,堪称难得的“雨前茶”(谷雨之前所产之茶)也多如牛毛矣!古人大拍皇帝的马屁,今人追逐自己的利益,都想到了“违理”的做法,只不过古人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违理”之举,史籍中没有明言,仅仅以“作法”两字含含糊糊一笔带过,让我们不明就里。从中国茶业史的角度而言,这种“违理”之举属于茶叶生产技术的范畴,但当时造“冬茶”的技艺至少在公开场合被封杀,以及史官在文字上对这一技艺的忽视(很有可能也是轻视),明显地给茶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遗憾。

唐文宗虽然就其品德而言称得上是好皇帝,但是,喜读《贞观政要》的他在政治上缺乏像唐太宗那样的才智勇略,有经邦济世之心,而无经邦济世之才,为君一世,乏善可陈,给当时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以及他自身都留下了极大的遗憾。

唐德宗于建中四年(783年)始征茶税,次年因李希烈叛乱而取消,后又在贞元九年(793年)复征茶税,十税其一。唐穆宗即位后,横征暴敛,竟然又增天下茶税百分之五十。到了唐文宗时,又出新鲜花样,开创了“榷茶”之法。

何谓“榷茶”?榷茶就是除了国家对茶叶经营实行征税之外,采取强制性的管制措施,对茶叶实行专卖,以使国家取得茶叶经营的专利。大和九年(835年)十月,宰相王涯指出榷茶

之法的种种好处，得到了唐文宗的支持，并干脆设立了一个“榷茶使”的官职叫王涯担任。史称：“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

王涯推行榷茶法后，令茶农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采摘茶叶后即在官场中焙制，旧有私人贮积，一律焚毁，全部官种官制官卖。结果可想而知，榷茶法遭到了天下百姓的极大怨恨，诟骂之声不绝于道。当年十二月，新任榷茶使令狐楚抨击榷茶法实为“蠹政”之举，有同儿戏，不近人情，并以“不便于民”为由，奏请停止榷茶法。唐文宗的答复是“从之”二字。就这样，推行不过两个月的榷茶法成了一场闹剧，匆匆开场，草草收场，并给世人留下了很臭的名声。

但是，与发自内心的崇尚节俭完全不同的是，唐文宗的“从之”却不是他心之所愿，而且也不体现他从谏如流的品德。推翻榷茶法，他是不得不从，不得不低头。导致榷茶法夭折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历史上的著名事件——“甘露之变”。

宦官擅权专政，是唐朝末年的一大政治特色。宦官因为执掌禁军，握有兵权，所以为所欲为，干预政事，进退官吏，乃至弑杀、拥立皇帝。唐宪宗和唐敬宗均被宦官所杀，而唐穆宗和唐文宗则均为宦官所立。唐文宗即位后，就图谋诛除擅权宦官，夺回帝权。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臣李训等人经和唐文宗密谋后，谎称在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请掌管禁军的宦官仇士良等前往察看，企图一举诱杀之。但由于行事不密，仇士良等人发现了埋伏的武士。宦官慌忙挟持唐文宗退入内宫，随即派遣禁军围捕与谋者。朝臣一时都作鸟兽散，而不明真相的宰相王涯等人却待在中书省等着唐文宗召见，结果，王涯和李训等人均被捕杀，并遭灭族。王涯因“甘露之变”被牵连而遭到诛杀，他所推行的榷茶



法理所当然也被牵连了进去,遭到废除。而王涯的害民祸民的做法,也使得榷茶法大失民心,从而在根本上失去了继续推行的可能。

“甘露之变”后,宦官更加专横,凌逼皇帝,藐视朝臣,唐文宗最后在开成五年(840年)郁郁而死。他留给历史的有罢“冬茶”这样的善举,更多的则是遗憾,像榷茶法的开创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历史对他也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

『塌地钱』茶商受盘剥

唐宋时期，在商贾行经之地，曾出现过很多供客商堆放货物、买卖交易和下榻寓居的客栈，叫“邸店”，也称“邸阁”、“邸舍”、“邸铺”、“邸肆”、“塌坊”和“塌房”等（“塌”通“榻”、“撮”等字）。在东晋、南朝和唐代初年，“邸”原指堆放货物的



裴休看看实在不像话了，就向唐宣宗上奏，要求取消像“塌地钱”之类的“横税”。

的货栈，“店”指货物交易的场所。之后“邸”、“店”逐渐连称，邸店除了堆放货物外，也兼住客商。客商带着货物住进邸店后，邸店主人和买卖介绍人为客商做中间人，将货物卖出，或者再将货物买入。这样一来，邸店又发展成为客商交易的场所，具有仓库、旅店和商店等多种功能。

为什么说“塌坊”的“塌”与“榻”和“撮”等字相通？这里姑且作一个歪解，也供看官一笑：“塌”从“土”，可理解是货物堆放的场地；“榻”从“木”，是客商睡觉的木床；而“撮”从“扌”，则应该是买卖双方为在邸店做货品交易了。



邸店主人以收取“邸值”(房租)牟利。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很多邸店经常人满为患,所以赢利丰厚。于是,许多权贵和寺观也纷纷开设邸店,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的市场周边涌现了数以百计的邸店,甚至郊外乡村也出现了邸店。拥有邸店的数量,在唐代后期一度成为拥有财富的一大标志,例如,唐代末年有个以买官出名的人叫袁象先,他平生所积财产数千万,拥有邸店竟达四千间。在唐朝后期茶税已成为国家大宗收入之一的背景下,邸店还曾被一些也想染指茶税之利的藩镇节度使利用来盘剥、勒索过往茶商。

唐文宗临死前,其弟李炎即被宦官仇士良等人拥立,是为唐武宗。唐武宗即位后,又恢复了榷茶法,规定民间所产茶叶全部由官府收买,然后转卖给商人。如果有人敢于私藏茶叶,或者私下转卖给商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而与此同时,割据一方的藩镇官员又对茶商征收重税,百般敲剥。凡是茶商必经之关隘要道,各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等官员都像剪径的绿林好汉似的候着,以重税“招待”茶商们。这还不够,更绝的是,这些贪官居然在要津左近将交通工具舟车等抢夺一空,却开设了不少邸店,以让茶商们滞留此地,不得前进。而一旦刮风下雨,茶商就不得不将茶叶搬进邸店躲雨了,这时候,茶商住店就不仅仅是按人头计算收费了,还要按照茶叶的斤两来收钱,叫做“搨地钱”。这样一来,谁还敢正儿八经做茶商,任人宰割?于是,民间走私茶叶的人越来越多。

到了唐宣宗时,有人又巧立名目,变着法子征收茶税,每斤茶叶增税五钱,叫做“剩茶钱”。

大中六年(852年)正月,盐铁转运使裴休看看实在不像话了,就向唐宣宗上奏,要求取消像“搨地钱”之类的“横税”,

邸店一方正当的“邸值”可以收取，但不许再向茶商另征税费，而且当地必须安排舟车，疏通交通。裴休明确指出，茶商如果不受侵扰，一路安定，官府所得茶税自然也就丰厚了。他还建议派遣强干的官吏，前往庐州、寿州和淮南等茶叶产区，设置征税点，晓喻私贩者归正纳税，合法贩茶。

裴休的建议能使私贩者有“改邪归正”的机会，解除他们触犯法律的忧虑，纳税茶商也不会因为苛捐杂税而利益受损，最关键处是此举能保证政府正常而可观的茶税收入，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唐宣宗的赞同。

随后，裴休在唐宣宗的支持下制定了十二条“茶法”，对私贩茶叶者严加禁止，比如，私贩三次、每次达到三百斤茶叶的，论死；结伙长途旅行者，如携带茶叶，数量虽少也要论死；雇用别人私贩茶叶三次，累计达到五百斤者，或者充当私茶买卖的中介人四次，私茶交易量累计达到千斤者，均论死。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私贩茶叶者处以极刑的法律规定。

裴休既疏又堵、宽严相济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解决私茶之弊的一个好办法。但为此而利益受到损害的藩镇理所当然要加以抵制。大中六年（852年）四月，淮南和天平军（治所在今山东鄆城东）节度使以及浙西观察使连连上奏唐宣宗，以“军用困竭”为借口，要求仍旧按照他们原来的税茶方法来征税。尽管唐宣宗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当时藩镇的势力已不可动摇，节度使为所欲为，中央政令几同废纸，所以地方的茶税收入依旧多被割据势力截留，唐朝中央政府所得寥寥无几，而茶叶私贩现象如同私盐一样，禁而不绝。

茶税之法在唐德宗时的出现,标志着饮茶之风已真正广为播扬。而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人一书,也同样成为饮茶盛行天下的一个标志。这“一人一书”就是陆羽及其《茶经》。

陆羽(733—804),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敬为“茶神”。

有关陆羽的身世,据《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等文献记载,陆羽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当地的一个湖边拾得。积公以《周易》自筮为这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这一卦辞给他定姓为“陆”,名“羽”字“鸿渐”。

唐天宝十一年(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为竟陵司马。这年,陆羽和他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两年后,陆羽出游巴山峡川,考察茶事,一路上逢山采茶,遇泉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

满获。乾元元年(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上元元年(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浙江苕溪,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其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藤鞋,独行山野,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广德二年(764年),陆羽完成了《茶经》初稿,世人竞相传抄。大历十年(775年),陆羽根据参与湖州刺史颜真卿编纂的规模宏大的《韵海镜源》一书时掌握的新资料,对《茶经》作了修订,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付梓出版。三年后,唐德宗李适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茶税之法。

晚唐曾任衢州刺史的赵璘,其外祖父与陆羽交契至深,他在《因话录》中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

陆羽嗜茶,更讲究煎茶之水,这可以从元和九年(814年)考取进士第一的张又新之作《煎茶水记》中得知。

《煎茶水记》引述了一位“楚僧”的《煮茶记》记载的故事说,唐代宗时,湖州刺史李季卿在赴任路过扬州时,偶尔与陆羽相逢。李季卿因倾慕陆羽已久,一朝相逢,备感欣喜,便邀陆羽一起到扬子驿吃饭。

席间,李季卿说:“陆君善茶,已是天下闻名,这扬子江的南零水也为天下第一名水,今天‘二妙’相聚,可谓千载难逢,岂能虚度!”于是,命随军中一位可信之士带瓶坐船去取南零之水,陆羽则备好煎茶器具等候水至。

过了一阵子,那人取水来后,陆羽马上用勺取水,但看了一下后用勺扬了扬水说:“江水倒是江水,却不是南零之水,应该是临岸的江水。”

那人答道:“这是我划船取来的水,有一百多人看见我取水了,怎敢说谎?”

陆羽没接话,默默地将瓶水倒出,至一半时忽然停住,又



用勺取水扬了扬说：“这才是南零的水呢！”

那人闻声大为惊骇，低下头说：“其实我的确是取了南零的水，可船回岸边时摇晃得厉害，瓶里的水洒了一半，我怕您嫌水少，于是就在江岸边将水盛满。处士您的鉴别力真神了！”

李季卿和宾从数十人听罢都大为骇愕。

这则故事也让今人吃惊，这种鉴别力确实到了神奇的境地。我们姑且不论其真假，哪怕是非科学性的，但此事却充分说明在茶的品饮中择水、鉴水是很重要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把陆羽敬为“茶神”的事实。

「茶神」明鉴谷帘泉

李季卿在亲眼目睹陆羽辨别南零水后问道：“由此看来，您所历经过的水可以判定出其优劣来了？”

陆羽回答说：“可以这么说，天下以楚水（长江以南流域）第一，晋水（山西黄河流域）最下。”陆羽当即排出水的二十等级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无锡惠山寺石泉水第二……”

庐山康王谷又名“庐山垄”。《星子县志》记载说：“昔始皇并六国，楚康王昭为秦将王翦所窘，逃于此，故名。”康王谷深山有泉，发源于汉阳峰，中道因被岩山所阻，水流呈数百缕细水纷纷散落而下，远望似亮丽晶莹的珠帘悬挂谷中，因名“谷帘泉”。

陆羽曾应洪州（今江西南昌）御史萧瑜之邀前往做客。两人闲谈中，萧瑜对陆羽判定谷帘泉为天下第一名泉不以为然，他说：“天下名泉甚多，何以要评谷帘泉为第一呢？”陆羽为了让其信服，请萧瑜命士兵去康王谷汲取谷帘泉来亲自品评。

过了两天，士兵汲水而归，陆羽便亲自以此水煎茶。在场众宾客品茶后频频举盏，连连



赞叹,都认为品尝到了佳泉美味,还有人说:“鸿渐兄真不愧为评泉高手,谷帘泉果然名不虚传!”

陆羽听后甚为欣喜,可当他自己举盏啜了一口,便皱眉惊问:“咦!这水——恐怕不是谷帘泉吧?”

众人闻言全愣住了。萧瑜急忙把汲水的士兵唤来询问,可那人一口咬定水取自谷帘泉。

正在这难以定夺的尴尬时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张又新赶到,他早就得知陆羽最爱谷帘泉,自己对煮茶也颇感兴趣,特地扛了一坛谷帘泉前来助兴。

陆羽便用张又新之水煎茶请众人重新品评。席上很快传来阵阵笑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这水才无愧于谷帘泉之名。”

一旁的士兵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原来,他当时确实取到了谷帘泉,但在返回途中经过鄱阳湖时,因风浪甚大,一不小心把满坛的谷帘泉给打翻了。为了不因误时受责,他便汲了一坛鄱阳湖的湖水来交差,不料却被陆羽一“口”识破。

就真实性而言,此事与分辨南零水一事相比,似较可信,因为两种水分贮于两个容器中而能够鉴别出优劣来,比较令人信服。两种水贮于同一个容器中却要鉴别出不同来,这就有点玄了。

据历史记载,陆羽卒于804年,而张又新814年才考取进士,其后才被迁还为江州刺史,张又新焉能以江州刺史的身份与陆羽在一起品评谷帘泉呢?所以这则故事与分辨南零水之事一样,应该看做是当时人们敬陆羽为“茶神”的一种“说法”。

积公必啜渐儿茶

陆羽辨水如神，而其师积公也辨茶如神。

积公即当时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陆羽三岁时被遗弃，是他在湖边拾得后抱回养育，并为这孩子取名陆羽。

清代陆廷灿在《续茶经》中引用北宋画家董彦远《陆羽点茶图跋》，讲述了陆羽与他的恩人积公之间的一段故事：

积公一向嗜茶，但是非渐儿（陆羽字鸿渐）煎奉不喝。陆羽后来离开积公远游江湖多年，这期间，因陆羽不再可能奉茶给他，于是积公就绝茶不喝了。

唐代宗此时闻积公之名，把他召进宫来，还命宫中烹茶好手为其煮茶，但积公只小啜一口就不喝了。

代宗初时还怀疑可能积公自居行家，故作姿态，及命人暗访知悉个中原委后，便设法找到陆羽，把他秘密召入宫中。

第二天，代宗在赐斋饭与积公时，密令陆羽煎茶。当陆羽煎好的茶端上时，积公顿时喜形于色，双手捧着茶瓯一边细细品赏茶之香之色，一边慢慢啜饮回味，一瓯茶汤竟不知不觉地喝干了。



代宗大为惊异，问其原因，积公答道：“这茶真像是渐儿所煎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将它都喝了。”代宗由是叹服积公的知茶，命人唤出陆羽和积公相会。

仔细品味这则故事，你会发现，积公品茶已不是只品茶味，陆羽煎茶分明付与茶一种追求和寄托，两人虽未谋面，茶却使他俩心心相印。这种境界，可谓茶道的最高境界。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积公和陆羽无论谁离开了，剩下的一位便无论如何难入茶的境界了。

陆公怒焚焙茶奴

陆羽被后人尊为“茶神”大约肇始于晚唐。据晚唐时人赵璘《因话录》记载说，那时的卖茶店家，常常将陶制的陆羽塑像放在炉灶和烟囱之间，祀为“茶神”。遇人相问，则说摆了这像，对茶的买卖颇有益处。此外，在河南巩县还生产一种瓷制的偶人，名字就叫陆鸿渐，当时顾客如果买十件瓷茶具，便可额外奉送一个“陆鸿渐”，这往往成为茶商供奉的神像。

在当时，人们对陆羽可谓尊崇之极了。但另有一则记载截然相反，对陆羽贬斥有加。

明屠隆在其《考槃余事》中引用了一部叫《蛮瓿志》的书的记载，其中说：有一天，陆羽采来越江的茶，用微火烘烤，使一个小奴子看着，结果这小奴子看着看着竟睡着了。等一梦惊觉，那茶早已烘过头，焦黑而不能吃了。陆羽见状，恶从胆边生，竟以铁丝缚住那小奴，将他投进火中。

小奴子被扔进火中有没有死，这一记载没有说，但即使不死，也够惨了。陆羽以一茶之失，痛下毒手，可谓残忍之极。故屠隆对此评说道：“陆羽残忍如此，其余脍炙古今的清风雅趣都不值得欣赏了。”



《新唐书》说陆羽为人是“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触犯”之义）人”。陆羽这种见人为善若己有之，见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无所回避的美德，在当时即为人们所称道。所以，所谓怒焚焙茶奴，实在是毫无根据之说，而屠隆也太信之了。

茶道讲平常心，崇尚自然。而对陆羽或敬奉为“茶神”，或百般责难，是世人还远不知茶之三昧。

奚陟摆茶会

茶道兴起于唐代。

与陆羽同时代的封演在他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说：“因鸿渐之论（即陆羽《茶经》）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最早提到茶道一词的记载。按封演的说法，最先总结和阐述茶道的是陆羽。

但是，当时茶道在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展现的，却很难找到详尽的文献记载。只有北宋之初宋太宗敕撰的《太平广记》记载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尚可见唐代茶道之一二。

奚陟为唐代宗大历末年进士，唐德宗时累进为中书舍人，为陆羽同时代人。

《太平广记》所说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即发生于陆羽宣扬茶道之时。这则故事说：奚陟成为吏部侍郎的时候，饮茶已为世人所推崇。奚陟这人本性奢侈，



奚陟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渐烦躁起来。



他备置了一整套在当时即使是公卿之家也不见得会有的稀奇而精制的茶具,如风炉、越瓯瓷盏、碗托等。有一天天气正热,他邀请了官署里的一批同僚来家中大厅里举办茶会。当时来的客人有二十多人,奚陟坐在东侧首位,奉茶劝进的人从西侧的客人处开始敬茶。二十多个人喝茶却只有两个茶碗,茶量又很少,客人喝茶时还不时嬉笑、闲谈,茶碗的传递越发慢了。由于天热口渴,奚陟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渐烦躁起来。正在这时,一位不知趣的下属抱着一大堆账本和笔砚进来,摆在奚陟前面的案桌上,要他签押。奚陟打量这人,只见他满脸油汗,长得又胖又黑,极度焦躁的奚陟厌恶之意油然而生,猛地一把将他推开,怒喝道:“拿到那边去!”这位倒霉的下属冷不防被猛推了一把,人与案桌一起翻倒在地,砚墨四溅,他的脸上以及那些账本都被染得乌黑一片。众人大笑。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茶会非同一般,是有些讲究的。比如要有一套很精致的茶具,二十多个人分坐在东西两侧,由专门的奉茶人按一定秩序为客人敬茶,客人只用两只碗悠闲地喝着,而且茶量不多。两只碗喝茶到底是像浓茶那样传递着喝呢,还是用两只碗替换着点一碗喝一碗呢,这虽然交待得不太清楚,但熟知现代日本茶道的人一定会看出,这茶会的礼仪和日本茶道中的一些做法是有相似之处的,如对茶具的重视、主客座位的安排、专门的奉茶人和敬茶的秩序,等等。从这一记载中似能看出日本茶道的渊源。

当然,奚陟所摆设的这次茶会,离真正意义上的茶道还相距甚远,仅具茶道之形式,而无茶道之境界,更无茶道之精神,这场茶会的主人奚陟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唐代饮茶之风的盛行，还表现在茶从中原向外的广泛传输。如《新唐书·陆羽传》记载说：“回纥（当时建立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汗国）使者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之往北。《旧唐书·懿宗纪》记载说：“安南（今越南）如阆、溪峒之间，悉岭北茶药”——这是茶之往南。《藏史》记载说：“藏王松冈布之孙（即松赞干布）时，始自中国输入茶叶，为茶叶输入西藏之始”——这是茶之往西南。

在今天的西藏藏族中，还流传着一句谚语：“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不喝茶。”这与西藏高原气候干燥，高寒缺氧，而藏人多以牛羊肉为主食有关，因为茶能解渴去腻，帮助消化，所以藏族同胞比汉族人更离不开茶。

茶叶从初唐传入西藏，到中唐时饮茶之风即已十分盛行。据唐李肇撰写的《国史补》记载说：常鲁公（即常伯熊，当时的煮茶名士）奉旨出使吐蕃（吐蕃为唐时藏族所建政权），有一天他在营帐中烹茶自饮，恰好被藏王看到了，便问他在烹些什么东西。常鲁公回答说：“这东西可以去人烦恼，解人干渴，我们称之为‘茶’。”藏王听罢忽然明白了，说道：“噢，这东西我这



里也有。”即命人去取了好多茶来,指点道:“这是寿州的,这是舒州的,这是顾渚的,这是蕲门的,这是从昌明过来的,这是瀘湖的特产……”

如今见诸记载的唐代名茶不过二十多种,而藏王即刻能拿出六种,并能如数家珍似的一一道明“身份”,这足以反映当时至少在吐蕃王宫中饮茶已十分盛行。

瀘湖(今湖南岳阳南)所产之茶即瀘湖含膏,为唐代名茶,北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瀘湖诸山旧出茶,谓之‘瀘湖茶’,唐人极重之,见于篇什。”据记载,唐初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即为这一名茶。

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藏王松赞干布派人携带贵重礼品到长安向唐太宗请婚。经过几次周折,唐太宗同意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并派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完婚。文成公主入藏时随带了大量嫁妆,如各色精美的工艺品、日用品和酒、茶叶等土特产,并教会了藏族妇女如何碾茶和烹茶。据说,当时带去的作物有三千八百类,牲畜五千五百种,还有工匠五千五百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夸张的,但茶叶从此传入西藏却是可以肯定的。

据成书于1388年的《西藏王统记》中说,文成公主不仅为西藏带去了茶叶,还创制了奶酪和酥油,并以酥油茶待客。由此可见藏族同胞的主要饮料酥油茶的历史,到今天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西藏山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公主带来龙纹杯》的民歌,歌词大意是:“龙纹茶杯啊,是公主带来西藏,看见杯子啊,就想起公主慈祥的模样……”这说明当时文成公主除了带去茶叶之外,还带去了茶杯、茶具等饮茶用具。

李德裕明辨建业水

陆羽鉴别南零水和谷帘泉的神奇故事在当时即被传为佳话，而且影响甚大，以至于在他之后又出现一位辨水高手，这便是唐代宰相中较著名的李德裕。



看来在李德裕跟前
卖不得谎秤。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唐宪宗时任宰相之职，封卫国公。他在政治上竭力强化朝廷权威，在抑制不服朝命的藩镇割据势力，抵御北方回纥的扰掠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并于唐武宗时支持了著名的“会昌废佛”行动，遏制了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此外，他还削弱了一度专横跋扈、凶焰日盛的宦官势力。

史载李德裕少好学，精通《汉书》及《左氏春秋》，是一个颇有才学的人。而在饮茶一事上，他鉴水的精明程度似更为突出。五代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述了李德裕精辨长江水的故事：

李德裕饮茶对水特别讲究，身在长安京都，却嗜好江南之水。有一天，他的一位好友要



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公干,李德裕知道后喜形于色,便对他说:“你哪天回来的时候,请为我取一壶金山(当时的金山尚在江心)附近的南零水。”

那人答应而去。至京口数日以后办完事便欲浮江而上,赶回长安。没想到那人兴许事情办得顺当,上船后便开怀畅饮,贪杯而醉,早把宰相所托之事抛于脑后。及至船抵建业(今南京),他才如梦方醒,猛然想起为宰相取水的事还没办呢!咋办?那人向舱外望去,但见一江春水向东流,自忖反正都是一江水,在此灌上一壶得了,何苦再返舟取水!只要没人看见,李大人不会知道。于是,他赶忙汲了一壶建业石头城下的江水,返京送给李德裕交差。

李德裕见水取到,即刻烹茶品茗。谁知他呷了一口,顿露惊讶之色,叹道:“唉!江南的水怎么大不同于往年,其味差多了。”俄顷又说:“这水太像是建业石头城下的江水!”

那人闻言吃了一惊,看来在李德裕跟前卖不得谎秤,便吐露真相,一再谢罪。

与陆羽鉴水相似,这则故事也把李德裕给神化了。

李卫公「水递」惠山泉

李德裕是个颇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大。在有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领袖，他与“牛党”领袖牛僧孺等人相互排斥、倾轧长达二十多年，最终败落，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郁郁而卒。而他在生活上的过度奢侈，也遭来了非议和抨击。

宋唐庚在《斗茶记》中讲述了一则李德裕嗜惠山之泉成癖而不惜代价以求的故事：

无锡惠山寺石泉水曾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仅次于庐山康王谷谷帘泉。这李德裕除了雅好南零水外，还特别垂青于惠山泉。但无锡与京师长安远隔数千里，惠山之泉如何能得？像南零水那样请人顺便捎带则机会不常有，还得防人偷懒，弄些假冒伪劣货搪塞。也许他想起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时，宫廷里为了能喝到上等的长兴顾渚紫笋，曾传旨湖州地方官，每年贡茶必须赶在清明节前到京，是为“急程茶”。后来，李郢有诗道：“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他看到了自己身为宰相的权势，便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泉的特快专递线，从惠山汲泉后，即由驿骑站站传递，停息不得，时人称之为“水



递”。这也真有点像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千里快骑送荔枝的穷奢极欲。

后来有位僧人对李德裕说：“我已为相公通了一条水脉，现在京师长安城里有一眼井，其水与惠山泉脉相通，汲之以烹茗，那味道没一点差异。”

李德裕听罢十分惊异，问：“这井在城里什么地方？”

那僧人说：“昊天观常住库后面的那口井就是。”

李德裕将信将疑，为了一辨僧人之言的真伪，他派人取来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让僧人辨认。这僧人颇有些本事，他只取装有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的两只瓶子，使李德裕大为叹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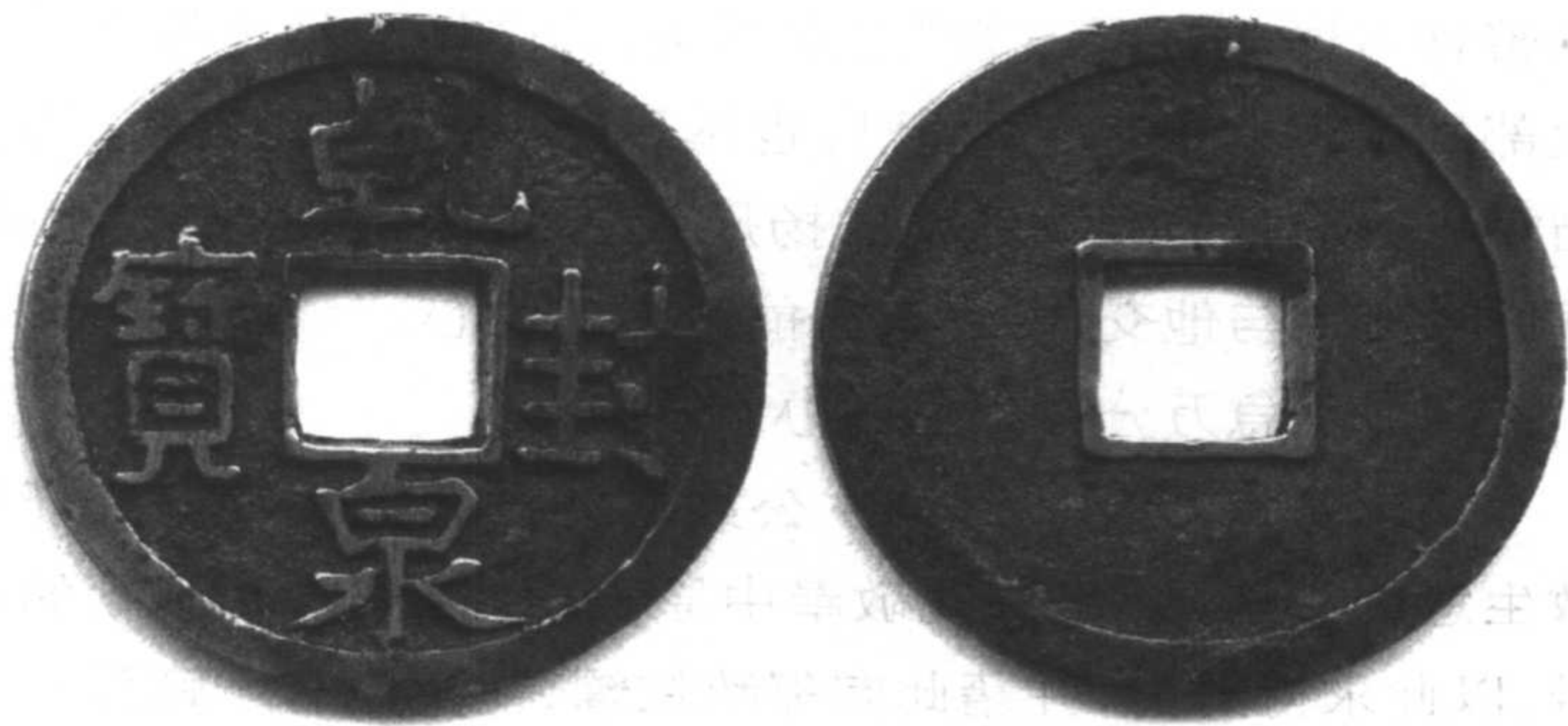
唐庚对李德裕“水递”一事评论道：“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罪戾之余，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以取一时之适，此非吾君之力欤！”

明屠隆在《考槃余事》中对此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致可嘉，有损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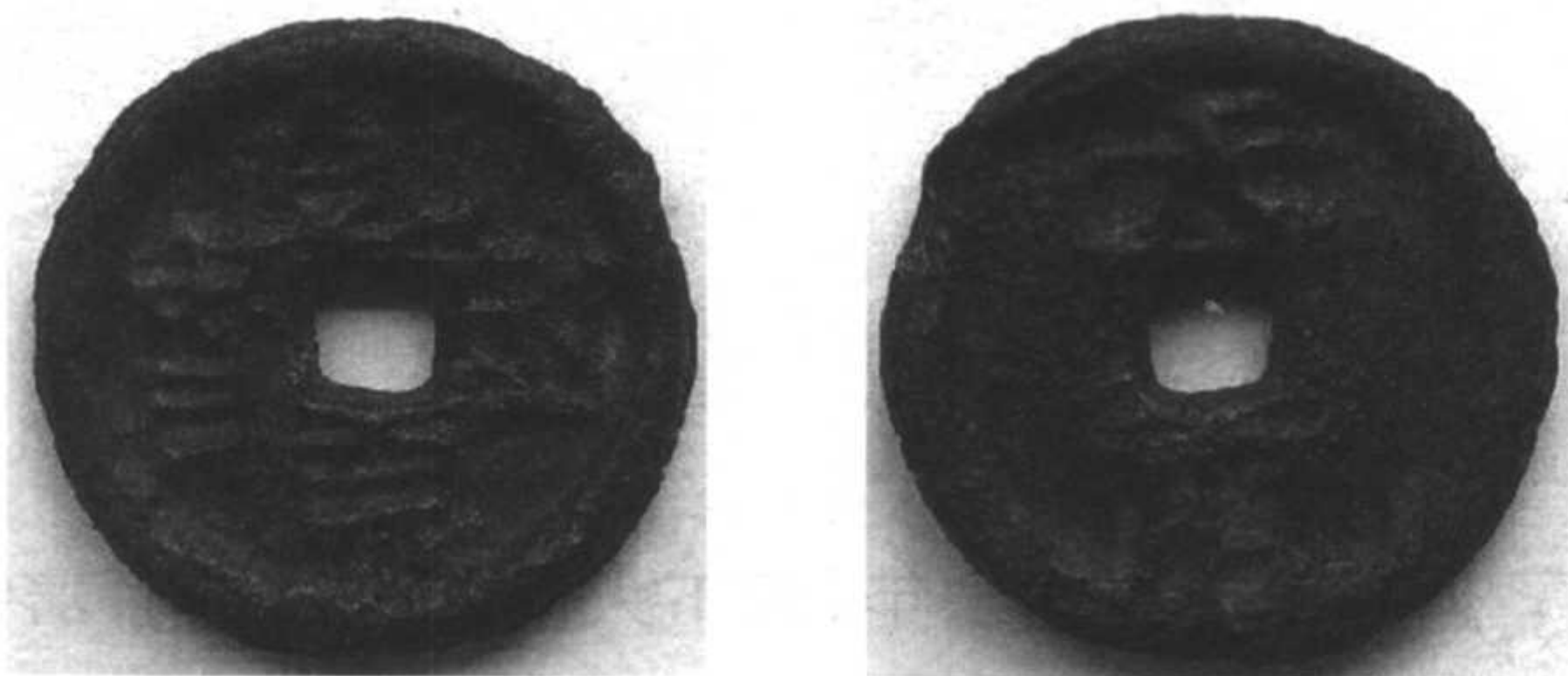
马殷卖茶国称殷实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海内分割，藩镇豪强各据一方。中原地区王朝不断更替，南方则有十个割据的王国，史称“五代十国”。各国之中，楚国在富足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是当时唯一以茶叶贸易增强国力的国家。

楚国的立国者马殷（852—930），字霸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他出身贫寒，年少时做过木匠。唐末，他应募加入了以残暴著称的蔡州秦宗权的军队，后来跟随秦的部将孙儒、刘建峰一起进攻淮南，几次攻打扬州杨行密。孙儒战败身亡后，马殷又随刘建峰攻取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刘建峰被部下所杀，众部将推举已任马部军都指挥



唐高宗所铸“乾封泉宝”



马殷铸造的“乾封泉宝”与唐初厚重精致的“乾封泉宝”相比，显得粗糙多了，也让人想见马殷在茶叶经营中不知牟取了多少暴利。

使之职的马殷为主，唐朝政府随后任其为潭州刺史，两年后又进为武安军节度使。

马殷初为节度使时，兵力还十分单薄，但所辖之地东面紧邻世仇杨行密、北有戍守荊州以凶暴著称的成汭，南边还有劲敌刘岩，马殷引为大患，寝食不安。有一天，马殷问计于部将高郁：“我想用重金厚赂四边邻国，以巩固我的地盘，这个办法行不行？”

高郁说：“成汭地狭兵寡，人也愚笨，不足以成为我之心腹大患；而刘岩的野心仅仅在五管（初唐时岭南道分为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和交州等五都督府，总称“岭南五管”，其后都督称号屡变，而“五管”之名不废，其范围大约为今之两广大部和越南北部地区）而已，也不足为虑；再说杨行密，因为当年主公与孙儒曾攻破他的扬州，逼他仓皇而逃，此仇此恨，即使用万金与他交好，也未必能讨得其欢心。”

马殷焦急万分：“那怎么办？”

高郁胸有成竹地说：“主公如果能一面在京师广为开设做生意的邸店，一面尊礼敬奉中原王朝，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以此求得封爵，并藉此向邻敌炫耀，使他们有所顾忌而不

敢妄动,然后我们加紧养兵休农,积蓄力量,这样才能成就霸业。”

马殷大喜,立马派人以湖南特产向中原王朝进贡。马殷每年都朝贡些什么?史称不过是其境内所产的茶叶而已。但这一招还十分管用,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马殷被梁帝朱温封为楚王。不久,后唐灭了后梁,马殷立即与后唐修好,岁贡不断,于是又被封为楚国王。

马殷以茶叶之贡换得封爵,而其富国强兵之计也用上了茶叶。根据高郁的建议,马殷以很低的价钱收购民间所产茶叶,然后在汴梁及襄、唐、郢、复等州大举开设邸店用以卖茶,一举而获得了十倍的利润。当时马殷所在的湖南,茶叶甚至贩卖到了河北,与北方契丹人交易。据《旧五代史》记载,马殷每年朝贡中原王朝的茶叶大约有数万斤,但是,他在中原卖茶所得之利远远超过所贡之数,每年居然以百万计!五代十国时期,马殷及其臣下大概是最有经济意识并以此获得巨大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人物了。

除了“官商”经营茶叶,马殷还要求老百姓也自造茶叶,卖给走南闯北的商贾,而马殷则从中抽取税收;又招募大户开设邸店囤聚茶叶以作交易。如此这般,马殷居然“岁入万计”。与此同时,高郁又使出一计,让马殷铸造“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只要有路过楚地的南北商人,就用“铅铁钱”将其捎带的货物“买”个精光。如此这般发展商业的结果是,楚国国力大增,一方富盛,竟然如同马殷的名字一般,有“殷实”之称。在五代十国时期,以茶立国,以商富国,马殷可谓绝无仅有的一人。

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宋朝名将曹彬和王全斌率军平定了后蜀。国土既失,蜀主孟昶连同他的家眷、财产以及宰辅人等,当然也难以自保,均被押解至宋朝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孟昶上缴的财物中发现了一个镶满珠宝的奇怪器物,问左右才知竟是一只尿壶。据《宋史》记载说,当时赵匡胤大为惊怒,随手操起一根棍子将这华贵的尿壶摔碎,还骂道:“你用七宝之物装饰尿壶,当用什么来装饰饭碗?这样奢靡浮华,国家不亡更待何时!”这段记载当然是为了宣扬赵匡胤崇尚节俭的“美德”,而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就很难说了,因为孟昶妃花蕊夫人后来成为赵匡胤的宠妃,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一些史料和笔记所记载的另一个故事也颇值得回味。后蜀平定之际,宋将王全斌杀性犹重,在成都竟然将已经缴械投降的两万七千蜀兵全部杀死。曹彬没有参与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但他的心眼更毒,他给赵匡胤上了一道密奏,说孟昶在蜀地称王长达三十年之久,而且蜀道千里,异常艰险,请陛下囚禁孟昶,并将其大臣斩尽杀绝,以防变乱。虽然赵匡胤断

然否决了曹彬这一损招，并且讥笑他是“雀儿肚肠”，但当时后蜀君臣子民所面临的凶险由此可见一斑。

孟昶投降后，随同他一起入宋的大臣毋守素是一位颇有心计的人。毋守素的父亲曾在后蜀任宰相之位，他自己从弱冠起就出官任职，后来官拜工部尚书，一度还掌管过后蜀的财政大权。他的次子还是孟昶的女婿。以这样显赫的地位，他知道一人汴京难说是凶是吉。但是，他要比孟昶之流显得成竹在胸。一到宋廷，他就把自己在蜀中的庄园悉数献给了赵匡胤。登记在册的庄园中，还特别注明有不少茶园。这些庄园价值几何，毋守素没有说，但赵匡胤随后下了一道诏书，赐予毋守素钱三百万，说是“以充其值”。赵匡胤这番“礼尚往来”，实在出乎毋守素的意外。而且，赵匡胤除了用其所长，命他任工部侍郎之外，后来还赐予他一套位于汴京城里的宅第。毋守素这次投宋，不但一点亏都没有吃，而且人财两得。这在当时宋朝大军席卷天下、南北归一的时候，实在是一个并不多见的例外。

北宋开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975年1月1日）这天，再次领兵出征的宋将曹彬和另一大将潘美一起，攻陷了南唐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后主李煜穿戴白衫纱帽向宋军投降。见到这位国破家亡之主，曹彬这次没有像平定后蜀时对孟昶君臣那样暗藏杀机，而是显得温文尔雅，居然和李煜客套了一番，而且还邀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喝茶。不过，这盏茶并非是礼貌待客之物，虽无杀机暗藏，却深藏着一种用意。曹彬、潘美作为胜利者，当然是前呼后拥先自上了停泊在江边的大船，等到李煜来到岸边，只见一条窄窄的木板搁在大船与江岸之间，作为登舟之用。看着这一长条独木桥似的木板，李煜上也不是，退也不是。曹彬见他徘徊了好一阵子，这才命



李 煜 主 像



过着囚徒一般生活的李煜整天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

他哪里敢再出逃自取死路？”

左右扶李煜登上了船。然而，李煜端起茶盏才啜了一口茶，惊魂未定，冷汗未收，曹彬就彬彬有礼地请他回去收拾衣装，明天一早在这里会面，一起登舟去宋朝京师汴梁。次日天还未亮，李煜如期而至。这使潘美大惑不解，问曹彬道：“你当初怎么敢放李煜回去，就不怕他跑了？”曹彬回答说：“我们那时请他上船喝茶，一条木板就吓得他不敢上船，实在是太怕死了！如今我既然允许他活着去汴京，

据《十国春秋》记载，李煜投降宋朝以后，身边所留财物极少。曾经做他宰相的张洎这时成了宋朝的大官，反过来对李煜颐指气使，经常索要钱财。有一次，张洎又来勒索，李煜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送的，只好将自己洗脸的一只镀金脸盆给了他，而贪婪的张洎却还不满足。宋太祖赵匡胤死后，过着囚徒一般生活的李煜整天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为贫困而实在过不下去的李煜，不得不向宋太宗赵光义开口要钱。赵光义表面上给了他三百万钱，暗中却在算计他。次年，李煜终究在劫难逃，被赵光义毒死，年仅四十二岁。

以强凌弱，压榨勒索，这是强国对弱国的外交惯例。而弱国对强国则有恰恰相反的外交惯例：卑躬屈膝，极尽无耻。举一个例子，南唐亡国之前，北宋使者都把出访南唐看成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美差，因为南唐君臣对他们热情款待，不仅在物质需求上，而且在精神享受上也让他们得到充分的满足，

南唐大臣韩熙载甚至以家妓侍奉他们。在五代十国末期,就像后宫嫔妃为了“固宠”于皇帝,各小国君主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和土地,或者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挖空心思搜寻到各式各样的珍宝以讨好北宋朝廷的事,不胜枚举。

翻开《宋史》有关吴越王钱俶的传记就可以发现,钱俶经常以金银珠宝、象牙玉器、绫罗绸缎和江南特产上贡给宋朝皇帝,其中江南茶叶也被视为贡品,动辄数以万计,数量惊人。《新五代史》称钱俶是“倾其国以事贡献”。上贡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就像吴越国的臣民在杭州宝石山上建造保俶塔那样,一切为了钱俶的平安。而赵匡胤似乎对他的朝贡并不怎么当一回事,有一天半开玩笑地对押解贡品的吴越国使臣说:“这些都是我口袋里的钱,何用你们辛辛苦苦这么搬来搬去!”

南唐被宋军平定、李煜成了阶下囚后,钱俶为了向赵匡胤表示祝贺,再次大肆朝贡,其中仅茶叶一项就达八万五千斤。宋太宗赵光义即位时,钱俶上贡的珍宝“价值钜万”,其中茶叶达五万斤。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奉诏举族进汴京,尽献吴越国土于宋朝,并为赵光义捎去了价值连城的贡品,其中茶叶就多达十万斤,另有福建的建茶一万斤。钱俶倾一国之力,不惜代价地上贡宋廷,终于赢得了宋朝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代皇帝的礼遇,没有像穷困的李煜那样惨遭毒手。和毋守素一样,钱俶得以善终,那宋朝皇帝茶盏之中的碧色清香,功不可没。



钱俶得以善终,那宋朝皇帝茶盏之中的碧色清香,功不可没。

蔡襄龙团细分明

宋代在中国茶史上是一个大发展的重要时期，饮茶尚好技巧，追求精致，故而茶人辈出。在众多茶人中，蔡襄既懂得制茶，又精通品饮，更有茶事艺文和茶学论著留给后人。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擅长正楷、行书、草书，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和米芾并称“宋四家”。

苏轼有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相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诗中说的“前丁后蔡”指丁谓和蔡襄，意即两人为争宠皇上，各出绝招，研制大、小龙团作贡茶。清代《广群芳谱》引述几种记载说：“建州(今福建建瓯)有大小龙团，始于丁谓，成于蔡君谟。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始造龙凤团茶。



蔡襄善制茶，也精于品茶。

咸平初，丁为福建漕（即转运使）监造御茶，进龙凤团。庆历中，蔡襄为漕，始制小龙团。”

龙凤团茶因制成团饼状，饰有龙凤图案，故称“龙凤团茶”。据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说，丁谓所制的大龙团以八饼为一斤，而蔡襄所制的小龙团却以十饼为一斤，使小龙团的研造更为精致。

蔡襄善制茶，也精于品茶，具有高于常人的评茶经验。宋彭乘《墨客挥犀》记载说：一日，有位叫蔡叶丞的邀请蔡襄共品小龙团。两人坐了一会儿后，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侍童端上小龙团茶款待两位客人，哪晓得蔡襄啜了一口便声明道：“不对，这茶里非独只有小龙团，一定有大龙团掺杂在里面。”蔡叶丞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唤侍童来问。侍童也没想隐瞒，直通通地道明了原委。原来那侍童只准备了自家主人和蔡襄的两份小龙团茶，谁知突然又来了位客人，再准备就来不及了，这侍童见有现成的大龙团，便来了个“乾坤混一”。

蔡襄的这种精明使蔡叶丞佩服不已。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蔡襄对大、小龙团的特性早已吃透，唯其吃透，方能研造出更精于大龙团的小龙团来。

唐代陆羽善鉴水，如南零水、谷帘泉等，有籍可按，但如何品鉴名茶，却少有记载。与陆羽相比，蔡襄对茶的研究更注重茶本身，堪称古代中国第一位品茶师。

《茶事拾遗》中记载着蔡襄的另一件品鉴茶茗的轶事：

建安能仁院中有株茶树长在石缝中间，这是一株称得上优良品种的茶树，寺内和尚采叶制成八饼团茶，号称“石岩白”，他们以四饼送给蔡襄，另四饼密遣人赴京师汴梁送给一个叫王禹玉的朝臣。

过了一年多，蔡襄被召回京师任职，闲暇之际便去造访王禹玉。王禹玉见是蔡襄登门，便让人选最好的茶来款待蔡襄。

这回，蔡襄捧起茶瓯还未尝上一口，便对王禹玉说：“这茶极似能仁院的石岩白，您何以也有这茶？”

王禹玉听了还不相信，叫人拿来茶叶上的签帖，一对照，果然是石岩白。见此情形，王禹玉只有钦佩的份了。

蔡襄在当时称得上是茶学大师，在茶界具有极高的威望，精于论茶的人谁碰到蔡襄都缄

口不敢吭声了。

但有一位女子却不让蔡襄这位须眉。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任杭州知府。在杭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叫周韶的妓女的挑战。周韶颇能写诗,又嗜好收藏一些“奇茗”。听说这位蔡知府精于茶学,她便倾其所藏,竭其才智,与蔡襄题诗品茗,斗茶争胜,结果令人大为惊异:“君谟屈焉!”

又据宋人江休复《嘉祐杂志》记载,蔡襄与苏舜元斗茶,拿出上好之茶,选用天下第二泉惠山泉。苏舜元的茶劣于蔡襄,但他选用了竹沥水来煎茶,结果出奇兵胜了蔡襄。

不说强中自有强中手,却可见宋代茶人之多,茶人学问之深。

蔡襄所造的小龙团不仅是制作精细,品质优异,更难得的是这种茶产量极少,第一年只造出十斤,主要是进贡给皇上享用,朝野臣民罕得其茶。小龙团当时估价为每斤黄金二两,可是在朝的高官权贵却说,黄金易得,而其茶不可得。

当时的仁宗皇帝赵祯对小龙团也极为珍爱,每年南郊祭天地的大礼中,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中各四位大臣才共赐一饼。八个人一饼茶,只好一分为八,每人一份。蔡襄造小龙团以十饼为一斤(十六两),也即一饼只有一两六钱,而一两六钱的茶还要再分作八份,每份就仅有二钱重了。赏茶犹如称金,好是可怜!八个人将这一点点黄金般的茶带回家后,还舍不得品饮,都当做传家之宝珍藏着,偶尔有贵客佳宾临门,仅拿出来供观赏一阵子,便算是极大的礼遇了。

但在有幸得到小龙团赏赐的大臣中,欧阳修算是一个更幸运的人,因为他得到的赏赐是完完整整的一饼小龙团。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为北宋著名的

文学家和史学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欧阳修非常爱茶，与茶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和蔡襄督造建溪小龙团贡茶一样，他在出任扬州知府期间，曾负责督造扬州贡茶。他还有一首著名的《双井茶》诗，热情赞美产于分宁（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贡茶。而最让他欣喜的却是宋仁宗赐予他的一饼小龙团。

欧阳修在为蔡襄所撰《龙茶录》写的“后序”中叙说了当时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八位大臣才分赏到一饼小龙团之事。但在嘉祐七年（1062年），这种茶的产量已有所增加，所以两府中这年获得赏赐的八人才得以一人一饼，而欧阳修恰巧成为这八人中的一员。

欧阳修以谏官之职入朝供奉，到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凡历二十余年，方才获得一饼小龙团，企盼已久，一朝见赐，令他百感交集，在家中时常拿茶观赏，而每一次捧玩，都令他涕泣不已。

得到这次令人激动的赐茶是在嘉祐七年（1062年），而写这篇“后序”时已是治平元年（1064年），可见欧阳修珍藏这饼小龙团已有两年。

宋人唐庚后来对欧阳修珍藏小龙团茶之举不以为然，批评说：“无论什么茶，最重要的是讲究新。现在一藏就是几年，还有什么可值得品味的？”其实这种批评是有失公允的，欧阳修鞠躬尽瘁二十余年，方有贡茶一饼之赐，这茶对他而言，决非只是口腹之事，而是对其一生忠君爱国、任劳任怨的报偿，所以他见茶如见一生，唯有涕泣而已。

欧阳修曾在《归田录》中这样说：“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茶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在日注（即日铸茶）上，遂为草茶第一。”

双井茶产于修江北岸，此地“绿丛遍山野，户户有茶香”。双井茶细者有白毛，状如银须，色碧味隽，故又有“白茶”、“龙须”、“云腴”、“凤爪”、“雪芽”等佳誉，名噪天下，遂为贡茶。

但双井茶的扬名，还得力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代“江西诗派”的创始人，又擅行书和草书，与苏轼、米芾和蔡襄并称书坛上的“宋四家”。



黄庭坚嗜茶，早前就以“分宁一茶客”名闻乡里。

黄庭坚嗜茶，早前就以“分宁一茶客”名闻乡里。《宋稗类钞》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当时的宰相富弼听说黄庭坚多才多艺，诗文、书法样样出类拔萃，于是很想与他一会。终于有一天两人相见相识了。也许是黄庭坚其貌不扬，富弼见到他后并不喜欢，两人不欢而散。偏偏这富弼好对人评头品足，于是对人说：“我还以为这黄某如何了得，原来不过是分宁一茶客罢了！”

“分宁一茶客”是富弼对黄庭坚的诋毁之言，当时即名闻遐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黄庭坚这一“茶客”却是很值得为之大书一笔的。

比如黄庭坚以茶代酒二十年，堪称是茶人佳话。黄庭坚在四十岁时曾写过以戒酒戒肉为内容的《文愿文》，文章说：“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也，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头苦。”此后二十年，他基本上践言而行，做到以茶代酒，并曾多次规劝外甥洪驹父节制饮酒。

再者，在黄庭坚的竭力推荐下，双井茶终于受到朝野士大夫和文人们的青睐，最后还被列入朝廷的贡茶，奉为极品，盛极一时。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这件事说：“草茶极品唯双井、顾渚，亦不过数亩。双井在分宁县，其地即黄氏鲁直家也。元祐间，鲁直力推赏于京师，族人多致之。”

这位“分宁一茶客”还是一位痴于吟茶颂茶的诗人，在他的笔下，摘茶、碾茶、煎水、烹茶、品茶以及咏赞茶叶功效的诗词比比皆是，从他留传至今的数十首茶诗来看，除了引茶入诗，抒发情怀之外，字里行间分明渗透着一位品茶高手所追求的茶艺和茶道。

宋人饮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更讲究茶道，饮茶不仅仅为品味解渴，而是嬗变出诸如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无欲无争等意义来。而宋代的文人在这嬗变过程中，是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尤以苏轼功勋卓著。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在政治上，他一生不得志，最初跟从司马光反对宰相王安石变法，被贬官“流放”到许多地方任地方官。司马光执政后，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提出不可尽废之，又为“旧党”所恶而继续被贬谪“流放”，远至天涯海角。

苏轼一生嗜茶。他写诗作文要喝茶，睡前睡起要喝茶，夜晚做事要喝茶，还热心于采茶、制茶、烹茶、点茶的钻研，甚至对茶具、烹茶之水和烹茶之火也特有研究。

对茶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品其味，而是升华至品其理，这是苏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他对茶文化的贡献所在。

明屠隆《考槃余事》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苏轼因为既爱饮茶，又擅书法，所以有一天司马光便问他说：“茶越白越好，墨越黑越

好；茶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好；茶越新越好，墨则是越陈越好——人们对这两者的追求恰恰相反，而您为什么却会同时喜好这两件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司马光问得有道理，他敏锐地观察到了茶与墨的截然不同之处；同时也问得没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毫无必然联系。但苏轼并没有被这种有意的“刁难”所难住，只见他淡淡一笑说：“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令人陶醉的香气，这是它们所共有的一种品德；两者都很坚实，这可以说是它们的一种节操。打个比方，贤人和君子可能一个皮肤黝黑，一个皮肤白皙，一个漂亮，一个貌丑，但是他们的品德和节操却是一致的。”

短短一席语，让司马光钦佩不已。

在苏轼眼里，茶和墨（及书法）有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内涵，事茶与事书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就茶而言，这就是茶道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对此，屠隆曾这样评说：“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修德之人。兼以白石清泉，烹煮如法，不时废而或兴，能熟习而深味，神融心醉，觉与醍醐、甘露抗衡，斯善赏鉴者矣。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乳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

快论！

这是一则颇为著名的民间故事：

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在杭为官三年中，他经常微服以游。

一日，他到某寺游玩，方丈不知底细，把他当做一般的客人来招待，简慢地说道：“坐。”叫小沙弥：“茶。”小和尚端上一碗很一般的茶。



方丈和这位来客稍事寒暄后，感到这人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改口道：“请坐。”重叫小沙弥：“泡茶。”小和尚赶忙重新泡上一碗茶。

方丈不是不明苏轼之身份，而是不明这一茶道之理，所以为苏轼所讥。

终于明白来人就是本州的官长、大名鼎鼎的苏轼，便忙不迭地起座恭请道：“请上座。”转身高叫小沙弥：“泡好茶。”

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

临别时，方丈捧上文房四宝向苏轼乞字留念。苏轼心里一转，即爽快地答应了，提笔信手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坐，请坐，请上座。”下

联为：“茶，泡茶，泡好茶。”

方丈见此联，满脸羞愧、尴尬之色。

客来敬茶本是表达一种尊敬、友好、大方和平等的意思，而这位方丈不是不明苏轼之身份，而是不明这一茶道之理，所以为苏轼所讥。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宋代茶文化的繁荣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出类拔萃的龙团茶、双井茶的制成，奇妙有趣的斗茶、分茶等茶艺活动的普遍开展，文人墨客钟情于茶诗的创作，等等，相对于唐代而言，可以说是大大朝前迈进了一步。而就水的品鉴“神技”，宋人也更进了一步，比如王安石，称得上是继唐代陆羽和李德裕之后的又一位鉴水之“神”。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他是宋代著名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宋熙宁二年(1069年)，他在朝野上下大力推行了旨在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弱积贫局势的变法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对烹茶之水很有研

王安石对瞿塘三峡之水的明断，却是大有其“道”，让人口服心服。

究。明代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苏轼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官黄州时，王安石曾请他到府上饮酒谈心，为他饯行。临别时，王安石对他说：“老夫年少寒窗十年中，染成一疾，近年时常复发。太医院诊断是痰火之症，必得阳羨茶方能治愈。现已有阳羨茶，还须瞿塘峡中峡的水来煎泡，才能奏效。请您就回眉州搬家之便，替我汲一瓮瞿塘中峡的水。”

苏轼答应而去。在返回时，船经瞿塘之上、中、下三峡西陵峡、巫峡和归峡。其时重阳刚过，秋水奔涌，船行瞿塘，一泻千里。苏轼此时早为两岸峭壁千仞，江上沸波一线的壮丽景色所吸引，哪还记得王安石中峡取水之托！

江船瞬息即过中峡，直达下峡。此地江面开阔，水势稍缓，船不再急急而行。这时，苏轼方才想起还有一件汲水中峡的事未办，心里一阵发毛，旋即舒心展眉，心想这三峡相连，中间并无什么阻隔，上峡水直入中峡，再直泻下峡，都是一样的水，何必非得盯住中峡之水呢。当下汲满一瓮下峡水，混充中峡之水送给王安石。

王安石见水大喜，急忙命人生火烧水，取定窑白瓷碗一只，投阳羨茶一撮，候水如蟹眼，急倾其水。

哪知水入之后，半晌才出现茶色。“咦？这水——取于何处？”王安石问苏轼道。

苏轼慌忙答道：“是从巫峡取来的。”

王安石再看了看茶汤说：“你啊，你啊！你又来骗老夫了，这是下峡之水，岂能冒充中峡之水？！”

此言一出，苏轼大惊，只好如实相告。谢罪之余即请教王安石如何能这般明察秋毫。

王安石说：“这瞿塘峡的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则缓，唯有



中峡之水缓急相半。太医院以为老夫这病可用阳羨茶治愈，但用上峡水煎泡水味太浓，下峡水则太淡，中峡水浓淡适中，恰到好处。但如今见茶色半晌才出，所以知道这是下峡水了。”

陆羽鉴别南零水和谷帘泉，李德裕明辨建业水，都是凭感觉而已，并不闻其中有“道”。而王安石对瞿塘三峡之水的明断，却是大有其“道”，让人口服心服，这是宋人在鉴水一事上的进步之处。冯梦龙这则题为《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乃小说家言，很难判定其科学性，但它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茶文化的进步。

拗相公误将药作茶

王安石的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以司马光为代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他们把王安石为人的果敢、坚毅称之为“拗”，叫他“拗相公”，包含了视他为固执、愚顽之意。反映在茶事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宋彭乘《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还是一位学士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蔡襄。蔡襄久闻这位学士之名，今天听说要来，非常高兴，不但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绝品之茶，而且还亲自洗净茶具，烹茶、点茶也都亲自操作，希望能得到王安石的称赏。

王安石呷了口茶，果然称赏不已。随后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着聊着，王安石从口袋里取出一撮名唤“消风散”的药来，投之于茶碗中，端来就喝。

蔡襄见之大为惊异，好端端的一碗茶岂不被糟塌掉了！没等他劝阻，王安石茶已落肚，搁下茶碗，慢慢感叹道：“这茶味太好了！”

王安石说这句话时，言语神情绝对真率，使蔡襄感到他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地在赞美这绝品之茶。这种怪诞的行为和滑稽的神情令蔡



司马光于茶事并不通晓

襄哈哈大笑。

王安石其实是精于茶事的，写下了许多咏茶、饮茶的诗文，如《试茗泉》云：“此泉地何偏，陆羽曾未阅。坻沙光散射，窈乳甘潜泄。灵山不可见，嘉草何由啜。但有梦中人，相随掬明月。”此外还有《鲍公水》、《东岭茶饴》等茶诗。以王安石雅好茶事论之，所谓误以药作茶也太离谱，于常识常情不通，哪怕他当时是心不在焉。

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于茶事并不通晓。宋人笔记《曲洧旧闻》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司马光和同他一起编纂《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各自携茶去游嵩山。到了嵩山，他们取出茶来准备烹以解渴，司马光的茶就包在纸中，而范祖禹的茶却藏在一个自制的小木盒中。

这小木盒并无特别之处，只是用来贮茶颇为适宜。但司马光见此木盒居然有些诧异，问道：“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贮茶之具？”

范祖禹见问颇觉不好意思，便将这小木盒留给了寺院和尚。

后来，宋代士大夫们刻意追求精雅的茶具，虽已极尽世间之工巧，而心犹未厌。他们说：“假使温公（即司马光）看到今天这样的茶具，不知他又会说些什么话来。”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较之于当时茶文化的兴盛，司马光明显慢了半拍。

宋神宗初行茶马法

宋朝立国之初，就在北方碰上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辽国（契丹），宋太宗几次军事进攻均被辽军击溃，特别是高粱河之战惨败以后，宋太宗更是丧失了收复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出卖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的信心。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经过澶渊大战之后，双方订立和约，歇兵罢战。但是，一波甫平一波又起，西北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公然与宋朝叫板，自称皇帝，建国“大夏”（史称“西夏”），而且大军频频袭扰宋境，攻城掠地，连续三年在三次大战役中大败宋军，成为宋朝的又一心腹大患。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在军事局势已不堪收拾的情况下，不得不派使者前往西夏求和，许诺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并且每年还要“赐予”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

这种寄托在“精神胜利法”之上的“岁赐”，其实与给予辽国的“岁币”是一回事，但两者相比，“岁赐”的内容还是另有含义的。在与辽国签订的盟约上，宋朝每年要交付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但是没有茶叶这一项。宋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乘宋朝疲于应付对西夏的战



争之机,声称将出兵河北,进行军事恐吓。宋朝惊慌失措,为了媾和,又向辽国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但其中也没有茶叶这一项。而这次与西夏和约,却多出了茶叶这一项。应该说,这是投李元昊所好的一招。因为西夏地处西北高寒地区,气候干燥,并不出产茶叶,而对以牛羊肉为主食的西夏人来说,茶去腥除腻,帮助消化,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后来李元昊也没有过多地与宋朝讨价还价,在第二年就接受了宋朝的这个和约。

宋朝为了表示诚意,在最后签订和约之际,又额外“恩赐”给李元昊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但茶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还没有人将其提升为国家的一项战略物资来看待。

李元昊死后,宋朝与西夏的媾和局面并没有维系多长时间,双方不时兵戎相见,而宋军败多胜少。直到宋神宗时,宰相王安石为了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实行了富国强兵的变法,宋朝国力提升,大将王韶在熙宁五年(1072年)一举收复了西北重镇熙州(今甘肃临洮),宋朝在军事上才稍稍有点起色。

宋熙宁七年(1074年),王韶在驻守熙州、经略开边时发现,西部各少数民族部落经常赶着大批好马,来到边地寻求与宋人交易,所需只有茶叶一项。但是,王韶同时也发现,边地一带偏偏罕有可供交易的茶叶,于是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可作军事之需的良马又被失望而去的各部族商人带走。王韶立即将这一信息上报朝廷。

宋神宗接到王韶奏疏后,想起本朝初年曾在西北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和德顺军(今甘肃静宁东北)这三个地方设置榷场,以四川茶叶换取西部少数民族的

良马,但此后好像并没有人当回事。历朝历代良种马均产于西部地区(即今天的青海、甘肃、四川和西藏等地区),但这些地区地处高原,气候干燥,高寒缺氧,极难种植原为南方嘉木的茶树,而对以牛羊肉为主食的该地各民族来说,茶又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食品。唐朝时,就有西域回纥人借入贡之机驱马市茶,这应该是最早的茶马交易,只不过后来回纥人在帮助唐军平定“安史之乱”后,驱赶数以万计行将淘汰的羸弱马匹向唐朝强行换取数量巨大的丝织品,使得唐朝政府见马如见鬼,躲犹不及。而现在,宋神宗考虑到了这一点:本朝如果大力推行以茶易马,一方面可用茶叶这一生活必需品去控制西北各部族,另一方面,换来的马匹又可增强宋军的战斗力,在军事上可与西夏抗衡,何乐而不为。宋神宗当即下诏,派人就近往四川买茶,然后从水陆两路调运至熙州和秦凤路(今甘肃天水)等边地,以换取西北良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道“茶马之令”。随后,宋神宗正式在四川实行茶马之法,将川蜀民间所产的茶叶悉数作为“官茶”征购,同时在成都设立了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负责“官茶”的征集、调运和以茶市马等工作。



宋孝宗继高宗即位后,立志强兵,恢复中原,这在茶马交易中也可可见一斑。

唐德宗初创茶法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后来张洎恢复茶法有赈济水灾的目的,而宋神宗推行的茶马法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将茶叶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物资,在换取战马以满足国家军备需求的同时,也以茶马交易作为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策略。可是



北宋茶马法的实施,对当时四川的“园户”(列入“官茶”生产的农户)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们生产的所有茶叶除了自己消费以外,必须一斤不留全部上缴到指定的地方,并被严禁私下贩卖,而官府所给予的生产本钱却极为低廉。“园户”们想以增加种植面积多产茶叶来偿还“官茶”,但往往“官茶”之数也随着种植面积增加而增加;想以其他出产抵缴“官茶”,又被严令禁止。所以当时蜀人说:“非地产茶,实产祸也。”史称:“蜀茶尽榷,民始病焉。”但是,对于宋朝政府以及西北各部族来说,以茶易马却是一个双赢的买卖,而且市场需求极大。所以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又下诏要求成都的茶马司除“官茶”之外再辟其他茶源,仅“商茶”一项,每年就必须征购三百万斤。

宋室因金人崛起而南渡以后,西北良马的来源一度断绝,只好以南方两广地区的“广马”代为军事之需。在茶马交易的主要地区四川和甘肃一带,宋军与金军经过十多年的恶战,最后终于站稳了脚跟。随后,宋朝就在四川西北部和甘肃的几个州县设置了八个茶马交易点。当时,这些交易场所甚至吸引了远在西域伊吾卢(今新疆哈密西)的马匹来此交易,虽然因为路途遥远,且间隔着西夏,一年最多只能来交易一次。而比较近的洮州(今甘肃临潭)马匹一两个月就来交易一次,叠州(今甘肃迭部县)的马匹或半年或三个月也会来交易一次。上述这三个地区的马匹均堪称良马,很受宋人的欢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南宋又恢复了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北)和雅州(今四川雅安)的茶马交易场所。宋孝宗即位后,立志强兵,恢复中原,这在茶马交易中也可可见一斑:乾道初年,南宋在四川和甘肃的八个茶马交易点共换取了九千余匹西北马。而且,最初北宋实行茶马法时,均以粗茶作交

易，到了乾道末年，已经开始以细茶市马，这也算是茶马法在实施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淳熙以来，南宋又换取了一万两千九百九十四匹马，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而宋孝宗之后，南宋的茶马交易就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水平。

中国历史上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屈指可数，在宋代比较有影响的就数宋哲宗时的高太后。

宋元丰八年（1085年），正当王安石变法初有成效时，支持变法的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神宗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姓高氏，宋英宗皇后。她是宫廷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台，掌握朝政大权后，便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朝廷中，聚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接着，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新法大部被废除，旧法一一恢复。这一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史称“元祐更化”。

高太后在“元祐更化”时，还作出了一个与废除新法并无关系的决定：禁造密云龙。

密云龙是一种比贡茶如大龙团、小龙团和双井茶等更为精致的茶。熙宁末年，宋神宗传旨福建转运使贾清在建州制作密云龙，每斤有二十饼之多。密云龙造出以后，小龙团和大龙团的质量就开始下降了。宋神宗以后，密云龙每年作为首批贡物进贡宫内。

当时，密云龙主要用于宗庙的供奉之品以

及皇上享用，极少赐予臣下。但在元祐中宋哲宗对殿试成绩卓越者赐予密云龙后，皇亲国戚和权贵近臣便纷纷厚着脸皮求赐，于是密云龙走出宫廷，流入官绅之间。

据孙月峰《坡仙食饮录》记载，密云龙之味极为甘馨，苏轼奉为至宝。当时苏轼门下有四位得意门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号“苏门四学士”，苏轼待之极厚，每逢四学士来访，苏轼必令侍妾朝云取出密云龙来款待。有位叫宋廖正的年轻人入苏门较晚，但苏轼对他的才学十分欣赏，视为奇才。有一天，苏轼又叫朝云取出密云龙煎水烹茶，苏轼家人以为一定又是四学士来了，但偷眼窥之，来客却是宋廖正。

苏轼以一位贬谪之官，尚能常以密云龙招待嘉宾，可见当时密云龙流传朝野之广。

而流传越广，求赐也越繁，终于使高太后烦恼不堪，无法招架。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说，元祐初年，高太后痛下决心，下令建州不许再造密云龙，连团茶也不要再造了，她说：“这样免得经常受人‘煎炒’，不得清静。”又说：“拣这些好茶吃了，又生得出什么好主意？”

后人对高太后禁造密云龙的评价说：“宣仁改熙宁之政（即“元祐更化”），此（指禁造密云龙一事）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清陆廷灿《续茶经》引《分甘余话》）称禁造密云龙在整个推翻新法中不过是一桩极小的事，但却可为万代治世所借鉴。这样的评价有点高抬了高太后，但其中以俭修身治天下的含意却是很有道理的。

令高太后遗憾的是，密云龙并没有因为一道圣旨而果真不再制造了。禁令一传至朝野缙绅中间，密云龙更是炙手可热，人人都想居为奇货。而入贡朝廷之物中没了密云龙，却来



了个龙焙贡新。周辉《清波杂志》中说,南宋淳熙年间,每年入贡朝中之贡品有十二纲,第一纲就是龙焙贡新,只有五十余镑(方寸大小的小块),比密云龙更贵重。周辉说,这是不是以龙焙贡新之名易密云龙之名,或者是否确为质量比密云龙更优的新品种,不得而知。

高太后禁造密云龙,非但没使宋代制茶工艺水平停滞不前,反而使之更上了一个台阶,这真是高太后始料不及的。

宋徽宗以茶宴群臣

茶屡屡作为赏赐之物，这是宋代君臣关系中的特有现象。不但赐予近臣（如宋仁宗赐小龙团与欧阳修），而且恩泽有好感的地方官。《宋史·苏轼传》记载说，元祐初，苏轼第二次知杭州时，高太后因为对他有好感，遣内侍赐予龙茶和银盒，慰劳甚厚。

宋人笔记《随手杂录》中也记载，苏轼知杭州时，有一天朝中一位使者突然来杭，悄悄对苏轼说：“我离开京师前向官家（即皇上，此处指宋哲宗）辞行，官家说：‘你向娘娘（指高太后）辞行后再来我处。’我辞了太后再回到官家这里，官家带我到一个柜子旁，从柜里取出一包东西，悄悄对我说：‘把这个赐予苏轼，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说着，使者取出那包东西。苏轼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斤茶，封口题字都是御笔。

但到宋徽宗时，赐茶的形式一变而以茶宴飨臣，在内涵上显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奢靡。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他在政治上腐败无能，生活上荒淫腐朽，最后成了亡国之君。但他在艺术上却有多方面的成就，能书善画，书法上独



辟一体,称“瘦金体”,音乐、诗词俱通。

赵佶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以皇帝之尊,写了《茶论》二十篇,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写于大观年间)。御笔撰茶著,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制茶之艺日精,斗茶之风日盛,分茶之戏日巧。北宋陶谷《茗苑录》中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徽宗身为皇帝,居然也擅这种分茶之道。

徽宗权臣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说,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延臣赐宴,表演分茶之事。徽宗先令近侍取来釉色青黑、饰有银光细纹状如兔毫的建窑贡瓷兔毫盏,然后亲自注汤击拂。一会儿,汤花浮于盏面,呈疏星淡月之状,极富优雅清丽之韵。徽宗非常得意地分给诸臣,对他们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一一顿首谢恩。

皇帝设茶宴赐待群臣,后来在清乾隆年间还每年例行一次。到了上元节后三日,皇上便钦点王公大臣中能诗善舞者,曲宴于重华宫内,演戏赐茶,赋诗联句。有时还专设茶宴款待外国使节,以示国粹。

宋徽宗沉湎百艺,政治昏庸,最终导致灭国之灾。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金人攻破,徽宗与其子钦宗俱被俘,押解北上。八年后,徽宗死于金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华夷花木考》中记有一则宋徽宗被押送金国时的奇遇故事:

徽宗和钦宗在北上路途中经过一座寺庙,两人进庙一看,只有两尊巨大的金刚石像和石盂、香炉而已,别无供器。

忽有一位胡僧从内出来，揖拜，问：“你们从哪来？”两人说：“打南边过来。”胡僧便叫童子点茶给客人。那茶非常香美，两人喝了还想喝，再欲索饮时，胡僧与童子已往堂后去了。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胡僧他们出来，两人便入内寻找。但里面寂然空舍，只有竹林间有一小室，内有一尊胡僧石像，一旁侍立着二童子的石像。两人仔细辨认，俨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人。

北宋亡于金人，却以胡僧为二帝献茶，这则故事或许就是对宋徽宗在茶事上铺张奢靡、过于沉湎的一种讥讽。

贡茶一事在唐代就已有之。当时一些官吏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每年争相进贡新茶。如《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江淮茶橘，晏与本道（“当地”之义）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

到了宋徽宗时，不但贡茶者越来越多，而且竟然以贡茶作敲门砖，走谋官求职之途。

据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记载，宋徽宗嗜茶，宫廷斗茶之风盛行。为了满足其对茶的奢靡之需，各地的贡茶品目大增，数量日多，制作日精，而徽宗则对贡茶有功者重加任用。

宋宣和二年（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银丝冰芽贡茶，做成方寸大小，因为这种团茶色白如雪，所以取名“龙团胜雪”。郑可简因此而备受宠幸，官升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转运使。

郑可简有位侄子叫千里。受叔伯之命，千里不远万里到各地钻山窜谷，搜集名茶。终于有一天，千里访得一种叫“朱草”的名茶。

郑可简是个无情无义的流氓，听说侄子新获名茶“朱草”，便指使自己儿子郑待问骗得“朱草”，上贡宫中。果然，郑待问也因贡茶有功而赢得了乌纱帽。

当时有人讥讽他俩说：“父贵因茶白，儿荣

为草朱。”

而千里因被夺走了“朱草”心存嫉恨，常常喋喋不休，痛骂郑家父子心黑手辣，毫无亲友之情义。

有一天，郑待问得官荣归故里，大宴宾客以示庆贺，亲姻毕至，众皆赞喜。酒宴上，郑待问酒酣耳热，春风得意，洋洋自喜道：“一门侥幸。”

这时，宴席中遽然冒出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千里埋冤。”

众人闻声只好含含糊糊打圆场说：“这句话对得真是工稳，妙！”

贡茶可以得官，宋徽宗的荒唐在此毕露无遗。而郑氏父子为得一官半职，不顾亲情，夺人之茶据为己有，冒名进贡。宣和君臣可谓荒谬透顶！

书,其间,夫妇诗词唱和,悠闲自得。在“酒阑更喜团茶苦”的生活中,李清照独创了一种妙趣横生的茶令。

李清照在为丈夫所著《金石录》写的“后序”中,记叙了她与赵明诚品茶行令以助学问的趣事佳话:

为了撰写《金石录》,她与赵明诚回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故第居住。夫妻俩每得到一本好书,即共同校勘,重新整理。得到书画、鼎彝等,也一起把玩赏析。在治学著文过程中,李清照对自己的博闻强记颇为自负,于是忽发奇想,创制一种以考对方经史典故知识为主的茶令,赢者可以先饮茶一杯,输则后饮茶,与酒令之行大相径庭。

两人每次吃完饭,坐于归来堂中,烹好茶,然后一人指着成堆的书籍,要对方说出某一典故出自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甚至第几行,以是否说中来决胜负,并确定谁先饮茶。两人在行茶令中,常常是李清照获胜,有一次赢后她举杯大笑,结果得意忘形,乐极“翻杯”,满满一杯茶倾覆在怀里,非但“头口水”没得喝,还连累了一身衣裙。

饮茶行令,启智助学,使人兴奋,对著书立说大有裨益,赵明诚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考古学专著《金石录》,成为考古史上的著名人物。

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侵,李清照夫妇先后背井离乡,逃往江南。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不幸病故,李清照只身漂泊,晚景凄苦。但茶令却在江南地区广为盛行起来。

南宋王十朋有诗道:“搜我肺肠著茶令。”其自注云:“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

茶令之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说：“赵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该文说的岳州窑所产青瓷茶碗，是仅次于越瓷的饮茶精品。而岳州窑就位于今湖南省的湘阴县，因唐代湘阴隶属岳州，故称“岳州窑”。

湘阴县地处南洞庭湖之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楚国诗人屈原的自沉之地汨罗江，就离县城三十余公里，而此地更有趣的是出产之物与“岳”字特有缘，除有著名的岳州窑之外，还有一种特产叫“岳飞茶”，这是一种至今仍在此地盛行的姜盐豆子茶，当地又简称为“姜盐茶”。

当代曹进的《湘阴茶略考》中说：“湘阴的民俗学家及民众一致认为，姜盐豆子茶系岳飞所创，故又名‘岳飞茶’。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被朝廷授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带兵南下至汨罗营田镇，准备与杨么领导的农民军作战。岳家军多来自中原，驻军江南后，因水土不服，士兵中腹胀、溏泻、厌食和乏力的病人日见增多，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岳飞平日喜读医书，他见该地盛产茶叶、黄豆、芝麻、生姜，便嘱部下熬含盐的姜、黄豆、芝麻茶

饮。果然，军中疾病大为减少。军营周围的百姓依法炮制，从此在湘阴流行开来。”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是南宋抗金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掠)”，连金军也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姜盐茶健脾胃，祛风寒，去腻强身，至今仍盛行于湘阴的每个家庭。据曹进1986年的调查，湘阴县城七个居民聚居区的一百零一个家庭，其中常年饮用姜盐茶的有一百户，唯一不饮此茶的是一个外省移民家庭。

姜盐茶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人薛能《茶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可见唐人煎茶已用姜和盐了。苏轼《和寄茶》诗也说：“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则北宋时也有姜盐煮茶之风。相传苏轼还曾用姜盐茶治好了宰相文彦博的病。苏轼之弟苏辙在《煎茶》中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好，盐酪椒姜夸满口”。当时的北方人在茶中除了添放姜和盐外，还加入奶酪和辣椒等物，真难以想象其味如何。而岳飞所制的姜盐茶除了姜、盐之外，不过再添了些黄豆、芝麻而已。

煮茶和以姜、盐，其味不知会如何，但从中医而论，却不无道理，茶性寒，而姜性热，一寒一热，正好调平阴阳。杨士瀛《医说》中有姜茶治痢之方，其理正是本于此。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一生嗜茶,恰好又与陆羽同姓,故其同僚周必大赠诗云:“今有云孙持使节,好因贡焙祀茶人。”称他是陆羽的“云孙”(第九代孙)。尽管陆游未必是陆羽的后裔,但他却非常崇拜这位同姓“茶圣”,多次在诗中直抒胸臆,心仪神往,如“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水品》、《茶经》常在手,前生疑是竟陵翁”。所谓“桑苎”、“茶神”、“竟陵翁”均指陆羽。陆游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其《剑南诗稿》存诗九千三百多首,而其中涉及茶事的诗作有三百二十多首,茶诗之多为历代诗人之冠。

陆游多次在诗中提到续写《茶经》的意愿,比如“遥遥桑苎家风在,重补《茶经》又



尽管陆游未必是陆羽的后裔,但他却非常崇拜这位同姓“茶圣”。

一篇”，“汗青未绝《茶经》笔”等。陆游未有什么《茶经》续篇问世，但细读他的大量茶诗，那意韵分明就是《茶经》的续篇——叙述了天下各种名茶，记载了宋代特有的茶艺，论述了茶的功用，等等。

陆游曾出仕福州，调任镇江，后来又入川赴赣，辗转各地，使他得以有机会遍尝各地名茶，品香味甘之余，便裁剪熔铸入诗。“遥想解醒须底物，隆兴第一壑源春”——这是指福建隆兴的壑源春；“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春”——是说浙江长兴顾渚紫笋；“嫩白半瓯尝日铸，硬黄一卷学兰亭”——此言绍兴的贡茶日铸茶；“春残犹看小城茶，雪里来尝北苑茶”——说的是贡茶北苑茶；“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试小雪”——说的是另一种贡茶福建建溪茶。此外，还有许多乡间民俗的茶饮，如“峡人住多楚人少，土铛争响茱萸茶”——湖北的茱萸茶；“何时一饱与子同，更煎土茗浮甘菊”——四川的菊花土茗；“寒泉自换菖蒲水，活水闲煎橄榄茶”——浙江的橄榄茶。这些诗作大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名茶的记载，且多为《茶经》所不载。

陆游谙熟茶的烹饮之道，常常身体力行，以自己动手为乐事，因此，在他的诗里有许多饮茶之道。如“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又如“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言日铸茶务必烹以名泉，方能香久味永。“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讲当时的茶艺“分茶”（一种能使茶盏面上的汤纹水脉幻化出各种图案来的冲泡技艺）和“分茶”时须有的好天气、好心境。“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则更是进入了茶道的至深境界：甘茶一杯涤尽人生烦恼。

茶之功效在陆游的诗中也得到多方面的阐述：“手碾新茶破睡昏”，“毫盏雪涛驱滞思”——茶有驱滞破睡之功；“诗



情森欲动，茶鼎煎正熟”，“香浮鼻观煎茶熟，喜动眉间炼句成”——茶助文思；“遥想解醒须底物，隆兴第一壑源春”——茶解宿酒；“焚香细读《斜川集》，候火亲烹顾渚春”——茶宜伴书。

有鉴于此，后人有诗云：“放翁九泉应笑慰，茶诗三百续《茶经》。”

杨万里嗜茶如命

与陆游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他就是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他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者仅一部分。其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而其诗体则自成一家，称“诚斋体”。

杨万里有关茶的诗文和陆游的诗作有一明显差异，就是表现了一种嗜茶如命的心境。

杨万里有一首《武陵春》词，在词中小序中他说：“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词曰：“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平安。”由于嗜茶，“茗饮小过”，“频啜得中寒”，弄得人“瘦骨如柴”，但他仍不愿与茶一刀两断。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



杨万里嗜茶如命



夕。”虽病不绝，只是少喝点罢了。

此外，杨万里由于夜里也好饮茶，故常常失眠，但他决不责怪饮茶。他在《三月三日雨，作遣闷十绝句》中说：“迟日何缘似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枪。春风解恼诗人鼻，非叶非花只是香。”其《不睡》诗又说：“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杨万里嗜茶如命可见一斑。

但杨万里嗜茶如命绝非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茶的味外之味。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将读书与饮茶作比较，由饮茶而想到读书，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杨万里深得饮茶的味外之味，因此，即使他病得瘦骨如柴，仍不愿放下茶杯。

杨万里嗜茶如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清澈如碧的茶水中悟出了为人处世之正道。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杨万里从常州知府调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时，将万缗积钱弃于常州官库，两袖清风而去。他致仕回乡后，“清得门如水，贫唯带（皇帝所赐的玉带）有金。”故居老屋三代未加修葺，只能挡挡丝风片雨。

杨万里一生清廉，其子杨伯儒也以清廉著称，在广东任官时，曾以自己的七千俸钱代贫户纳税。而杨伯儒临终之际，却连入殓的衣衾也没有。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丰骨茶样明。”这是杨万里《谢木菴之舍人赐茶》中的诗句，他以茶的清雅、明澈来称道知心朋友的气质、风骨，把茶在精神方面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若以其诗还颂其人，杨万里当之无愧！

辛弃疾诱杀茶商军

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四月,以赖文政为首的数百名贩卖私茶的茶商在湖北揭竿而起,竖起了武装反抗宋王朝的旗帜。在当时官方的文字记载中,这类暴动的茶商被称做“茶寇”或“茶贼”,现在的历史学家则把这支以茶商为主组成的造反军队称做“茶商军”。

赖文政为什么要造反,史书上没有明确交待。《宋史·李焘传》中有这样一件事:常德府(今湖南常德)是一个产茶区,境内多茶园,茶叶买卖兴隆。但是,差不多也就在赖文政起兵造反的同时,官府严禁商贾贩卖茶叶,以致茶商走投无路,起而反抗,与官军以兵相见。宋淳熙四年(1177年),刚刚到任的知府李焘说:“官府只捕茶贼,岂能禁止茶商做生意?”于是李焘取消了禁令,茶商重操旧业,常德境内复又太平。也许,这段记载能帮助我们窥见赖文政们为什么会不惜灭族之代价,铤而走险起兵造反的原因。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赖文政的茶商军还在湖北之际,宋廷就命令鄂州都统李川调兵前往“捕捉”。但这显然小看了茶商军的战斗力,李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将初起的茶



商军消灭,仅仅将其“赶出”了湖北。茶商军从湖北转战湖南、江西,一路上屡屡击败官军。据《宋史·陆九龄传》记载,茶商军进攻江西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的时候,“声摇旁郡,人心震慑”。另据《宋史·王辉传》记载,青州人王辉,靖康初曾起义兵抗金,立下奇功,官至正使,寓居吉州。淳熙二年,茶商军进兵吉州,当地官员以王辉骁勇,命令他带兵抵御。王辉率军来到一个叫“胜乡”的地方,这里地势十分险要,王辉恃勇轻进,与部下拉开了距离,结果被茶商军擒个正着。王辉还算得上是条汉子,刀刃加颈也不投降,含血大骂而死。

对于一时无法解决的武装暴动,宋朝历来的做法就是招安。这次也不例外。宋廷使出这招,命江州都统皇甫侗前往招安。但茶商军苦大仇深,招安毫无成效。不得已,宋廷在这年的六月以仓部郎中辛弃疾为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商军。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今济南)人。南宋著名词人。他二十一岁时就聚集了两千多人参加抗金义军,曾率五十多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兵大营,生擒叛贼,渡江南归。“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辛弃疾这首有名的《鹧鸪天》记述了他当年与金兵浴血奋战的情景。

宋孝宗委任辛弃疾指挥各路兵马镇压茶商军,正是看中了他的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与此同时,宋廷还出资赈济湖南、江西那些遭受茶商军“蹂躏”过的州县,以争取民心。

当辛弃疾受命带兵行动时,茶商军已经进兵到了广东。辛弃疾率军一路尾追。直到八月份,他的军事行动仍然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江西总管贾和仲却被朝廷以“捕茶寇失律”除名,并被流放到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而且,宋孝宗再次采取政治和经济手段,免除了湖南和江西遭受过茶商军攻击的

州县的租税。

茶商军在进兵广东岭南时，由于要害之地为官军所占，几次进攻都被当地一个叫林光朝的官员率兵击败，吃了大亏。

这年闰八月，辛弃疾见一般的军事手段不足以彻底击败茶商军，便抓住茶商军战事失利之机，采取了“诱捕”的办法，一举擒杀了赖文政，茶商军的造反这才被彻底平定。

不过，也有人认为当时赖文政并未被擒杀，被杀的乃是他的一名部下。在辛弃疾故世四十多年后，南宋文人罗大经在其著名的笔记《鹤林玉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当年湖北茶商起兵时赖文政原是一名茶叶交易中介人，年已六十，足智多谋。茶商们共推赖文政为首领，但他不从，且认为当今天子并没有失德，天下太平，我们还能干成什么事情。起事的人不肯，以刀相逼，赖文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他心知举兵必将失败，于是暗中物色了一个与自己相貌相似的人作为左右，此人叫刘四，原是做炸糯米团子买卖的。后来茶商军被辛弃疾的大军困住时，赖文政便和几名首领一起来见辛弃疾请降，并约定了缴械的日子。赖文政回到自己营地后，便和手下的人商量说：“这辛弃疾看人的眼色不同寻常，我看他肯定会杀我的。”他想逃跑，部属以为不可；他提出“断我头投降，死不过是前后几天的事”，部属又不忍心。最后，还是刘四倒霉被斩首，一颗血淋淋的头颅冒充是赖文政的送到了官军大营中，而赖文政却乘机逃之夭夭。罗大经所记述的这个故事真假莫辨，但他自己认为绝对是真的，将赖文政和唐朝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以及本朝边疆侵扰劲敌依智高相提并论（他认为黄巢和依智高在失败之后均巧妙逃脱了官军的捕杀），且讥讽官军终究还是不知道那是一颗顶缸的首级，被赖文政骗



过了。

淳熙二年冬,宋廷对镇压茶商军的官兵论功行赏,湖南、江西和广东等地的官员有升迁的,也有遭贬黜的。辛弃疾理所当然是“首功”者,但是,枢密院有一个叫王淮的官员,对辛弃疾的“功劳”提出了质疑,认为辛弃疾上报的有功之人“太滥”。结果辛弃疾为王淮所说的“太滥”付出了代价,本来是第一大功臣的他,受封赏时不过在原来的官职之外加领了一个表示荣誉的虚衔“秘阁修撰”。这当然使辛弃疾感到不快。

辛弃疾的不如意还在于他已经看到了茶商军起事乃是一种官逼民反的抗暴行动。他后来在给宋孝宗的奏疏中写到:赖文政等人能够一呼百应,与官军拼死到底,实在是因为州县的官吏聚敛财富、残民害物之政所致,希望陛下能够深思“致盗”之由,寻求“弭盗”之术而不要仅仅依靠“平盗”之兵。宋孝宗对他的建议非常欣赏。但是,实际情况是,仍然还有茶商起兵造反。

像赖文政这样的茶商暴动,在宋朝并非空前绝后。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市)任教授之职的郑清之发觉,当地许多茶商聚集在一起,有再次暴动的迹象。这位进士出身的读书人急忙向当地总领何炳建议说:“这些茶商向来慁悍善斗,应该马上招募他们当兵,这样或许还能派上用场。”何炳想想也是,立即发出招募茶商为兵的告示。结果应募当兵的茶商云集,这支以茶商为主的新军,马上就被入顺口叫做“茶商军”。何炳后来碰到了很多困难,也多亏了身边有一支茶商军才不至于无法收拾。宋朝士兵的社会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一般士兵都必须黥面。而现在竟然有这么多个茶商放弃茶叶的买卖,一窝蜂地应募当兵,个中原因颇可深究。

虽然赖文政的茶商军失败了,但是,这次武装暴动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值得探究的一个事件。因为穷困破产的农民起来造反的事历朝历代累见不鲜,而由商人发动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武装反抗却十分罕见。

南北朝时，从南朝齐逃到北魏的王肃因茶量颇好，而被蔑笑为“漏卮”。当时因嗜茶者罕有其闻，所以有关嗜茶者的绰号、名号也如凤毛麟角，除此之外，难找出第二个来。

但是茶事自唐代兴起之后，嗜茶者日众，而其绰号、名号也随之而来。

唐代诗人中嗜茶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了，他有一篇题为《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诗，写品饮七碗茶后飘飘欲仙的感受，很是生动传神。其中云：“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神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对这首诗是颇为得意的，对嗜茶也颇为自豪，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叫“癖王”。

有趣的是，这“癖王”当时还有一个“对子”，叫做“怪魁”。那是同样对自己沉湎于茶颇自负的诗人陆龟蒙为自己取的绰号。

唐代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也好饮茶。有一次，别人请他品尝新到的柑橘，并准备了盛宴。谁知他一到，也不对桌上的时鲜珍馐瞧上一眼，却一个劲地急呼要茶喝。急切之下茶盏

没有，主人只好以巨觥盛茶相进。喝完了之后，他诗兴勃发，信笔写道：“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人取笑说：“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苦口师”即指茶。

五代时江南有位叫文了的僧人，因擅长烹茶，称绝一时。后来他云游荆南，在当地表演烹茶技艺，为人欣赏，称他是“汤神”。但到后来他因茶艺卓绝而被封为“华亭水大师”时，人们又叫他“乳妖”。神、妖居然一身兼。

宋人陶谷在《茗荈录》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宣城何子华在剖金堂宴客，席间，他取出一幅严峻所绘的陆羽像说：“世人常把过于迷恋骏马的人叫做‘马癖’，把迷醉在钱里的人称做‘钱癖’，把耽于子息的人称为‘誉儿癖’，把热衷于读书的人叫做‘《左传》癖’，那么像这位老者（指陆羽）沉湎于茶事，该叫什么癖呢？”客人杨粹仲接过话题说：“茶是珍贵之物，但它还是草，可以说是草中之甘。像陆羽这样精于茶道的人，我们宜追称他为‘甘草癖’。”此言一出，满座称好。

宋人曾几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茶山”。明人许应元也给自己取别号叫“茗山”。都想取出宏大声势来。

明代之初有位宁波知府叫王璉。有一次，一位手下人来拜会他，他具茶相待。谁知这人来是为别人做说客，令他十分不快，大呼侍者：“撤茶！”于是人们就叫他“撤茶太守”。

明代还有一位包山（今属江苏）人张源，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因而世称“隐君子”。但他偏又是一个嗜茶如命者，不但耽于汲泉煮茗，而且竭精殚思几十年，将研茶心得著成《茶录》，于是人们又称他为“癯君子”。

明月清风，尽在杯中。
吾水既好，吾器既工。
盛极而衰，几近途终。
一代“茶圣”，吴氏觉农。

重风雅倪云林绝交王孙

宋人于茶之道讲究在制茶和烹茶上，所以有宋一代贡茶辈出，名茶广布，并且还出现了极具技巧和艺术特色的斗茶和分茶等茶艺。而明人则似乎更是讲求品饮上的境界，注重碗中盏里的意味。这一点从元明之际的倪瓚身上可以看到。

倪瓚（1301—1374），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原名珽，字元镇，号云林。元代著名画家，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他也是园林叠石高手，名噪海内外的苏州狮子林假山就是他的杰作，至今让人百看不厌。

倪瓚性情孤僻狷介，绘画上则讲求表现胸中逸气，其茶道之追求亦然。明顾元庆《云林遗事》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倪瓚素好饮茶，曾居于天下第二泉惠山泉之畔，经常研茶鉴水。有一天，他忽有心得，用核桃、松子肉和



倪瓚素好饮茶，曾居于天下第二泉惠山泉之畔，经常研茶鉴水。



以一些真粉，做成园林假山叠石形状，置于茶汤之中，雅号“清泉白石”。于是，倪瓒的清致之名噪于一时。

有位叫赵行恕的人乃是宋朝宗室后裔，因为仰慕倪瓒这种品位，有一天便亲自登门拜访。

因是王孙之辈临门，倪瓒便大礼相迎，延请上座后，叫童子供上清泉白石茶相待。

此茶之品，在于品泉之清，品“石”之白，体味倚石之茗，恍如蕉影之韵，感悟明泉之清，犹似静心之适，品出林泉之中的闲情逸气。

但是，赵行恕显然不是一个茶人，他像喝大碗茶似的大啖。这在倪瓒看来，无疑是“牛饮”。

一番盛情雅意迎来的是如此粗俗之举，令倪瓒拂然离案，变色道：“我以为你是王子王孙，所以取出这样的好茶来款待你，谁知你对茶之风致一丝不晓，真是个俗物！”说罢，挥手送客。

从此两人再也不相往来。

明代江南士人曾以家中有无倪瓒画来判雅俗和清浊。正如他的绘画格调和创作思想对明清两代文人画的影响一样，其茶道境界也为后人所推崇，明清文人茶深受其影响。

倪瓒煎茶显洁癖

元末至正年间，江南灾荒连年，元廷强征暴敛，义军揭竿而起，局势动荡不安。家产殷实的画家倪瓒为逃避官租和义军，遂散其资财，遁迹于五湖三泖之间，往来于宜兴、常州、湖州一带，栖居村舍和寺观达二十年之久，寄情山水诗画。直到朱元璋扫灭群雄、北逐元廷后，江南秩序恢复安定，倪瓒才于明洪武初年返回无锡故里。

当时世人称倪瓒为“倪迂”，这是因为他爱洁成癖又性情孤僻。倪瓒结束浪迹生涯返回故里后，生活安逸，其性格得到充分张扬。顾元庆《云林遗事》中还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朱元璋最赏识的一统天下的功臣徐达，在无锡邓尉山构筑了一座养贤楼，专以雅集天下的文人墨客，一时间，名士趋之若鹜，麋集于此。

在如许人中，倪瓒算是名声最响亮的人物，而且所作所为常常使人不解，人叹为怪癖。譬如，有一次倪瓒来了茶瘾，他不取近在眼前的湖水，而是派随从去挑远在山里的七宝泉泉水。那随从辛辛苦苦挑来两桶泉水，谁知他上去只取了前桶水来煎茶，却哗地一下倒了后桶



水来洗脚。这不是太浪费了吗？众人大惑不解，于是有人忍不住问他这是何意。

倪瓚的回答似乎很有道理，他说：“前桶水不会碰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我用来煎茶。但后桶水说不定就会被挑担人的屁所污秽，所以我只用来洗脚。”

这种洁癖最为无理！不说挑担人路途中换肩会使两桶水前后位置颠倒，就说用已秽之水来洗脚，又有何洁可言？一边在煎茶品茗，一边脑子里已秽之水还淅淅沥沥，其茶更有何洁何香可以称道？甚至还不如后来江南富贵之家的取水之道：前桶水贮用，后桶水干脆倒光。

禁私茶朱元璋怒斩驸马

茶法的推行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其初衷仅仅是通过对茶叶的征税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到北宋时,茶法日益完备,并建立了茶叶专卖制度。由于宋朝与北方契丹(辽)、西夏的战争不断,而且屡遭败绩,为改变这种积弱之势,宋朝开创了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茶马法。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开始推行茶马法,在四川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以“官茶”换取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马匹,满足国家的军事需求,同时,也以此作为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策略。

明代之初,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已退守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太祖朱元璋更加重视茶马法,竭力想从中获取更多的马匹用于战争。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马,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为了垄断茶马互市,以保证获得大量战马,明廷还严禁对这些地区走私茶叶,定期派遣官员巡查关隘,捕捉偷贩私茶者,防范极严。



但是,由于明廷在茶马贸易中对少数民族商人实行“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的政策,压低马价而抬高茶价,马贱而茶贵,使内地商人看到以茶易马的厚利,于是不顾禁令,纷纷偷贩私茶,就连一些边镇官吏和军民也私储良茶以易马。走私茶叶的日益猖獗,使茶马贸易受到很大冲击,官方互市而得到的马匹越来越少,马日贵而茶日贱。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对禁止私茶痛下决心,派遣官员每月巡查,调驻军队层层设防,严加把守,同时对偷运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都处以极刑,禁止私茶的声势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但就在如此“风紧”之时,居然还有顶风作案者,他就是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

欧阳伦是朱元璋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他自恃皇亲国戚,无视法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境贩卖,牟取暴利。这些家奴也倚势横暴,尤其是一个叫周保的家奴,更是骄横,他到哪里,哪里的官员就得小心侍候,并为其走私茶叶提供便利,否则即遭殴打或凌辱,虽封疆大臣也不敢有半点违拗。

是年四月,欧阳伦瞒着皇帝丈人,命令陕西布政司发文通告所属各府州县,派遣车辆和民工为他前往河州运送私茶。这回又是周保自告奋勇出马押阵,走到哪里,就要哪里的衙门派车,先后征调了几十辆车子,组成了一支车轮滚滚、浩浩荡荡的走私大军。

但这支大军来到兰县(今甘肃兰州)河桥巡检司的时候,遇上了一桩“小事”:一位巡检司的小吏对他们侍候不周,略有怠慢,于是手正痒痒的周保上前将他一顿狠揍。

明目张胆贩运私茶,还向地方官吏施暴,这位小吏实在

无法忍受，便向朝廷状告这一违旨不法行为。

小吏的状纸层层递送，很快就来到了远在南京的朱元璋的御案上。

朱元璋正在严禁私茶的兴头上，得悉此事，焉能不怒？欧阳伦虽是爱女的丈夫，但从维系法纲出发，他决定严厉裁决，决不宽恕。六月，朱元璋下旨对驸马欧阳伦赐死。同时，陕西布政司的官员对欧阳伦之事明知不报，也一并赐死。周保等几个家奴自然在劫难逃，都被处以死刑。所有茶叶全部没官。

末了，朱元璋觉得这位小吏虽然位卑职微，但却不避权贵，敢于告发，精神殊为可嘉，便特地写了一通敕谕对他加以褒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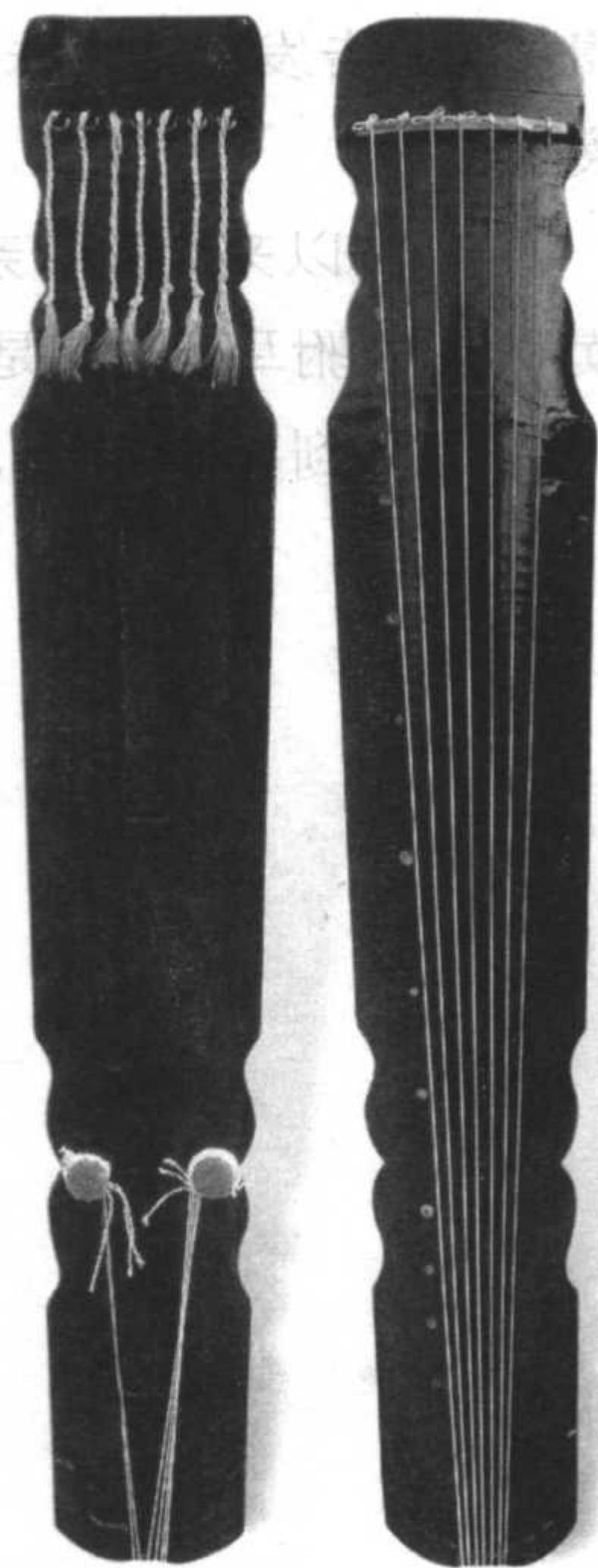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皇帝亲自赐死皇亲国戚本不多见，而处死贩卖私茶的驸马，这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后来到嘉靖年间，才减贩运私茶之罪，止于充军。

朱权行茶破孤闷

宋代大为兴盛的斗茶之风，到元代开始日渐衰落。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政的蒙古人对被征服者汉人的文化多加摒斥，世风已无意于那种繁琐的饮茶方式，另一方面也因为新兴起的饮茶方式叶茶瀹泡法的推行，令饼茶的制作迅速减少。到明代初年，朱元璋下诏取消贡奉饼茶，倡导叶茶，于是进一步促进了饮茶方式的转变，技趣性饮茶从此没落，同时也使自唐以来的以碾、煎为主体的烹饮法渐趋消失，饮茶之道主要集中在品饮的过程中。

在这次饮茶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倪瓚是“先驱”，朱元璋



朱权所制中和琴。朱权行茶仪式之中，当有此琴伴和。

是“后继”，真正确立新方式的则是朱权。

朱权(1378—1448)，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朱元璋为防御蒙古，将朱权分封于河北会州(今热河平泉县南)，称“宁王”，与燕王朱棣等王子节制沿边兵马。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死，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惠帝。次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进军南京，发动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起兵前，曾胁迫朱权出兵相助，并许以攻下南京后与他分天下而治。经过四年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朱棣即位后，非但只字不提分治天下，而且还将朱权从河北徙迁至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朱权遭此巨创深痛，即求清静和韬晦，于南昌郊外构筑精庐，寄情于戏曲、游娱、著述、释道，多与文人学士往来，自号臞仙，又号大明奇士、涵虚子、丹丘先生。

朱权晚年信奉道教，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的《茶谱》。

唐宋时期茶叶多以蒸青团茶为主，制法为：先将鲜叶蒸一下，然后捣碎拍制成中间留孔的团饼，再串起来焙干、封存。朱权却不欣赏团茶及其烹饮方法，独创了蒸青叶茶烹饮法。他在《茶谱》序文中说：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真味，顺其自然之性。的确，叶茶不但饮用方便，而且能让人享受到茶叶的色、香、味、形之美，更能品味到茶的本味。

清茶助清谈，清谈更品茶，所谓“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即刻画了饮谈相生的雅意。朱权还较为完整地构想了一



套清谈开始前的行茶仪式：

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汲清泉，碾茶末，煮沸汤，候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候茶味泡出时，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对他说：“为君以泻清臆。”意即“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一瓯，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话久情长，礼陈再三，琴棋相娱。

这一焚香弹琴、烹茶待客的礼仪，是明代追求品饮境界的文人茶的生动写照。

朱权崇奉道教，嗜好茶学，皆为自保之计。但是其后裔看来并未承袭这套家学，就在朱权死后七十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十万，争夺皇位。这次叛乱很快被扑灭，朱宸濠被处死，宁王之藩也被撤除。

但朱权对茶的诸多研究却是影响深远。他创制的蒸青叶茶促成了炒青的制成，使叶茶从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茶的饮法也改变为像今天这样开水冲饮的形式。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套待客的行茶仪式，对日本茶道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文徵明竹符调水

宁王朱权为了免遭明成祖朱棣的政治迫害，沉湎于茶学及戏曲、游娱、释道，以作韬光养晦之计。但是到了其后裔朱宸濠时，偏偏锋芒毕露，焰势直逼朝廷，分庭抗礼，图谋不轨。明正德七年（1512年），宁王朱宸濠为了招徕天下名士，以重金聘请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但却被他以重病推却，分文不受，令宁王尴尬不已。这位书画家就是文徵明。

文徵明（1470—1559），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初名璧（一作“壁”），字徵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他才艺双全，书画、诗文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

文徵明为人正直，性格倔犟，不阿权贵，不交官府，有人说他“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家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中人”。他自己也在一首诗中说：“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熏炉茗碗旁。”意思是



文徵明在《煎茶》诗中写道：“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燃松翠鬣香。”



说,即使门前聘邀的车马卷起尘土三千丈,他还是呆在茶炉、茶碗边,品茶自娱。对于宁王的重金强聘,他在《立春相城舟中》诗里说:“未裁帖子试芳草,且覆茶杯觅淡欢。”表明他不愿涉足豪门,只求清茶一杯的乐趣。

文徵明嗜茶,绘有名画《惠山茶会图》和《茶具十咏图》等,并写有一百五十多首茶诗。

为了躲避宁王之流的干扰,他常常沉湎于茶中,以至于有些人魔。譬如,他对水的要求非常高,常派人进山汲取宝云泉来烹茶,但又怕挑夫为图路途近便,随意汲取其他水来交差,于是他就以竹符(一种竹制的筹码)为信物交给泉边寺中的僧人,待挑夫来汲泉时,将竹符随水一起带回。这就是所谓的“竹符调水”,相传为宋代苏轼所创。

文徵明在《煎茶》诗中写道:“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燃松翠鬣香。”有一次,宜兴友人吴大本送来一种叫阳羨月的新茶,文徵明喜不自禁,即称要“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诗肠万斛泥”。他本来打算竹符调水,不料连日大雪,山路难通。正当他为好茶难觅好水而烦恼时,另一位好友郑太吉雪中送炭,为他送来号称“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文徵明兴奋不已,文思泉涌,写下了《雪夜郑太吉送惠山泉》一诗:“有客遥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惠山前。两年不挹松风面,百里初回雪夜船。青箬小壶冰共裹,寒灯新茗月同煎……”是夜,他即以名泉烹新茶。品味之余,他又写下了《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瓶夜自煎。白绢旋开阳羨月,竹符新调惠山泉……”文徵明嗜茶入魔可见一斑。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但很快即被平定,朱宸濠自己也被处死。而文徵明清茗为友,品娱永日,享年九十。

王世懋夜茶风味

王世懋(?—1588),字敬美,江苏太仓人,明嘉靖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是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之弟,好学,善诗文,著述颇富,而才气名声亚于其兄。

王世懋在其《二酉委谭》一书中记载了自己在江西做官时的一件事: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他在著名的滕王阁宴请宾客。这年暑热天气来得出奇的早,日出如火,热浪扑面。本来就惧怕天热的王世懋此时头上油汗涔涔,碍于礼节又不能脱下帽子,热燥难耐,不知所措。

宴罢回府后天色已晚,犹自烦闷不已。妻子见状,为他准备了热水洗澡。洗完澡后心境略好,他便小榻一张,坐于明月之下纳凉。



王世懋

这时,好友张右伯为他送来西山云雾新茶。细观其茶,又白又大,更有一种豆子香。王世懋急忙命侍儿汲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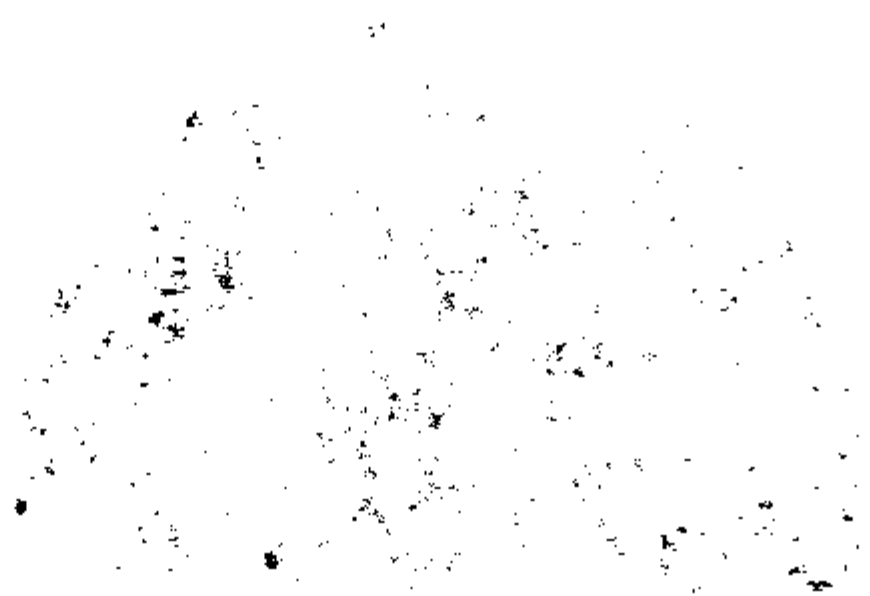
水烹茶以尝。

此时,风清月白,夜深人静。王世懋几盏入口,但觉一股清香甘饴之味慢慢浸润于肺腑,渗透至四肢,于是习习然如两腋生风,飘飘欲仙。就在似醉欲仙之际,他忽然悟到:此境此味,非仕途之人所有,繁文缛节,冗事虚礼决然不会让人心入此境,而仕途中的尔虞我诈,乃至腥风血雨,更是与此境此味风马牛不相及。

此境此味更使王世懋联想起父仇家恨来。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世懋的父亲王予因为滦河失事而被政敌严嵩所陷害,下狱论死。王世懋与兄世贞闻讯后奔赴京师告免,兄弟俩伏跪在严府大门前,央求严嵩为其父放一条生路。严嵩对王家两位后生看都不看一眼,王予最后还是被处斩。兄弟俩眼见父亲被置于死地而相救不能,悲愤之极,却又无奈之极,两人号恸不已,持丧而归。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服丹中毒而死,其子即位,是为穆宗。次年,王氏兄弟再次进京讼父冤,几经争辩,终于使朝廷为其父平反。

这一惨痛经历使王家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而这一杯夜茶,却勾起了王世懋对仕途的厌倦和对归隐的向往。但是,人在仕途,也是身不由己,王世懋对“此境此味”的追求,最后只是付诸笔端而已。



朱汝圭嗜茶拒赡养

清代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在《芥茶汇钞》一书中,记述了明代一位对茶有奇癖的老人。

这位老人叫朱汝圭,娄江(今江苏吴县东)人,是“吴门七十四老人”之一。他自幼嗜茶,十四岁即入芥山(即罗芥山,在江苏宜兴和浙江长兴交界处)采茶制茶,每年春、夏两次,冒巢民算了一下,他在六十年中进山一百二十次,从未中断过。当时有位对芥山茶极富研究的人叫于象明,号称“精鉴赏甲于江南”,住在芥山棋盘顶,每年其家人必采制芥山茶,制成“庙后”、“棋顶”、“涨沙”、“本山”等名品,冒巢民品尝后以为这些茶各有差等,但味道极真极妙,为二十年来不曾尝到的极品。有一年朱汝圭也携芥山茶来拜访冒巢民,让他大吃一惊。他发现,朱汝圭的茶与于氏之茶在味道上不相上下,但在种类上却要多出一种叫“花香”的茶。

朱汝圭嗜茶而轻家。他有位儿子在诸生中颇有点名气,对其父也颇尽孝心,悉心赡养,但就是有一点让其父极不高兴——不喜欢喝茶。终于有一天,朱汝圭因儿子不嗜茶,觉得他一



点也不像自己的后代,而宣布拒绝他的赡养。

朱汝圭以七旬之龄常常冒寒进山采茶,采回后即在街市上大声叫卖。他经常一天到晚洗茶涤器,掇弄不休,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后来他又采茶供佛,金芽素瓷,精心治办,以求往生“香国”。

张陶庵品茶鉴水

晚明时期,出现了一部意味隽永的小品文集《陶庵梦忆》,它的作者是自称“茶淫”的著名散文家张岱。

明初,由于朱元璋对团茶的生产采取禁止手段,所以团茶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散茶。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散茶的盛世,瀹茶之风大行,而张岱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记录了这个盛世的典型事例。

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精通历史,长于散文,著述颇多,堪称一代奇才。张岱出身富贵之家,癖好极多,而诸多癖好中,嗜茶尤甚,自称“茶淫”,甚至以为七件常事中,可以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是每日不可少的,视品茶为最大乐事。

在《陶庵梦忆》中,张岱叙述了他和善于瀹茶的名士闵汶水之间的一桩瀹茶故事。

闵汶水原籍安徽歙县,后居南京,擅瀹茶,因其年事已高,人称“闵老子”。当时的名流雅士如董其昌、郎瑛等人,凡经过其地,识与不识,皆去拜访,以能尝到闵老子所烹之茶为人生一大快事。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的一天,张岱根



据好友周墨农的介绍,乘船抵南京,前往桃叶渡拜访闵汶水。不巧闵汶水一大早就出门了。张岱一等就是一天,直到天很晚,这位闵老子才慢慢悠悠踱回家,好是散漫。

两人见过礼,张岱刚说了一句话,闵汶水忽然想起什么事,起身自语道:“啊呀!我的拐杖忘记带回来了。”也不与张岱说什么,径自出门去了。

空等了一天,现在又来而复走,不知啥时能回,让人焦躁不安。但张岱还是耐住了性子等待,并对自己说:“今日岂能空手而去!”

又等了好久好久,直到初更时分,闵汶水才回来。进门后,见张岱还在,他感到有些奇怪,仔细打量了张岱一番后说:“怎么您还在这里?您跑这里来干什么?”

张岱恭恭敬敬地说:“久闻闵老的大名,今天如不能畅饮您老的茶,我决不回去!”

闵汶水一听,乐了,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的“茶癖”。于是他亲自当炉煮茶,款待客人。

闵汶水将张岱请进一小室。张岱环视之,窗明几净,案上摆设古朴的荆溪壶和成化、宣德官窑瓷瓯十多种,都是片瓷千金的精绝之品。灯下再看闵汶水奉上之茶,但见茶汤之色与瓷瓯之色无别,而香气逼人。张岱禁不住叫了一声:“绝!”

张岱小呷一口,问闵汶水:“这茶产于何方?”

闵汶水随口回答说:“这是阆苑茶(产地在四川)。”

张岱再细啜了一口说:“你呀别骗我,这茶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却不像。”

闵汶水偷偷一笑说:“那么您知道它产于何地?”

张岱举杯品啜了一口后慢慢说道:“真像是罗芥山的名茶。”

闵汶水闻言吃了一惊，吐吐舌头说：“奇！奇！”

张岱又问道：“这水是哪里的水？”

闵汶水说：“是惠山泉。”

张岱道：“不要再骗我了！惠山泉从无锡运至南京路途遥远，却不见其水老，这是什么道理？”

闵汶水道：“我实在不敢再向您隐瞒什么，这真的是惠山泉，只是在汲水前必淘净泉井，待后半夜新泉涌至才汲取，并且非得江风满帆才行舟运水，所以这水新嫩不生杂物，即使寻常的惠山泉与它相比犹逊一筹，何况其他的水？”说罢，闵汶水又情不自禁地吐了吐舌头，自言自语道：“奇！奇！”

闵汶水言未毕即离席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持来一壶茶为张岱斟满，说：“您再品味一下这茶。”

张岱细细品鉴后说：“这茶香气浓烈扑鼻，味甚浑厚，一定是春茶！刚才煮的茶则是秋茶。”

闵汶水哈哈大笑说：“我已七十岁了，所见精于鉴赏茶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

两人遂成忘年交。

从张岱的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明代瀹茶之艺实为茶的一种鉴赏艺术，它讲究品茶环境的幽雅洁净，所用茶具古朴典雅，追求名茶名水，更重要的是茶人要有涵养，谙熟品饮之道，注重鉴赏功夫。如果说，宋代斗茶偏重游艺，其艺术性是外在的话，那么明代瀹茶的艺术性则偏重于内在。另外，瀹茶还有这样的规矩：如果客人品出了味道，主人则以更好的茶相待。

张岱后来把自己所撰的《茶史》手稿与闵汶水细细研讨。但就在书稿即将付梓时，清兵大举南下，明朝土崩瓦解，江南大乱，《茶史》稿本也不幸散佚，只有序文还存于其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憾事。

明代末年，在江苏常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毛晋。毛家是当地的巨富，躬耕宅田二顷余，家蓄奴婢二千指（即两百人）。但是毛晋却是一位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不但喜好藏书，而且致力于图书的镂板刊刻。当时宋版元刻的旧书已经非常罕见了，于是毛晋在自家门口张榜求书，悬赏：“有人若拿来宋版书，门内的主人以页定价，每页出钱两百；若有旧抄本，每页出钱四十；若有时下的善本书，别人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两百。”当时毛家住在城里的七星桥畔，如此“千金一书”的豪举吸引了远近的书商，一时间，“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以至于当地流传这样一句谚语：“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毛晋的藏书楼称做“汲古阁”，架列八万四千多册珍贵图书。当时同城还有一家藏书楼，是著名学者钱谦益为其爱妾柳如是所建的绛云楼。但是后来绛云楼不慎失火焚毁，于是汲古阁岿然独存，独领风骚。而毛晋与一般藏书家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喜欢刊刻书籍，善本精刻纸墨俱佳，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一生所刻图书至今也难以统计。毛晋自称节衣缩

食，惶惶然以刊书为急务，镂刻书板逾十万。故当时钱谦益不无感慨地说：“毛氏之书走天下。”汲古阁为世人所重，影响至为深远。

毛晋有五个儿子，都能继承父业藏书，但毛晋的孙子辈就没有那么争气了，居然拿先辈殚精竭虑、耗费巨资镂刻的书板当柴烧，使汲古阁差一点从另外一个途径步绛云楼的后尘。

叶德辉《书林清话》引清人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毛晋有一孙子，嗜好品茶，有一次购得洞庭山出产的名茶碧螺春，又汲取到常熟虞山的名水玉蟹泉。“碧螺”、“玉蟹”两美双色，天造地设，该是茗事中的绝佳之配，但是，他仍然意未满足，以为独独还缺了一项“美薪”。有一天，他在汲古阁中看到所藏堆积如山的书板，随手抽出一块，见是《四唐人集》的书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散发出一股书墨之香。他突然心念一动：“如果能把这个古色古香的唐人诗集书板劈作柴火，煮‘玉蟹’，烹‘碧螺’，那个味道啊……”他越想越美妙，终于，嗜茶如命的他一把抱出大捆的《四唐人集》书板，就在自己家里日复一日地当柴劈烧，享受茶、水、薪俱为极致的风味。至于那个味道究竟如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他这样形同偷盗的无赖行为，居然无人管束，就这样，一部珍贵的《四唐人集》书板化成青烟，一炬成灰。《四唐人集》中的《唐英歌诗》是汲古阁藏书中称得上“秘宝”的珍本。当时有人也曾刊刻过《唐英歌诗》，但其中残缺两三百字，让人无法卒读，而汲古阁本却是一部善本，缺字极少。怪癖无知的毛晋之孙仅为满足口腹之欲，毁了一部珍本，使中国书籍史更添了一段伤痛。



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有一首《汲古阁歌》，其中吟诵道：“当时海内多风尘，石经马矢高丘陵。已坏书囊缚作裤，复惊木册摧为薪。君家高阁偏无恙，主人留宿倾家酿……”吴伟业感叹明末清初时局动荡，文物凋敝，斯文扫地，却很惊讶汲古阁巍然而立，这也说明了吴伟业并不知道毛氏子孙劈板作薪煮佳茗这段“掌故”。但是，汲古阁恰恰就发生了如吴伟业所说的“复惊木册摧为薪”这样惊世骇俗之事，可谓不幸言中！

另外一件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是，劈板作薪者究竟是毛晋哪一个儿子的儿子，这个不肖孙子究竟又叫什么名字，史无所载。所以，这也是毛家一桩永远不解的悬案。

康熙御题『碧螺春』

明清时期是我国茶文化由鼎盛而走向终极的阶段。这期间,由于清代几位皇帝对茶文化的推崇,使得饼茶逐渐边缘化,而叶茶开始成为我国茶叶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方向。

清代康熙帝对碧螺春的题名,可以说是品味叶茶成为世风时尚的一个标志。

据清王应奎《柳南随笔》、陈康祺《郎潜纪闻》和《清朝野史大观》等书的有关记载,碧螺春原是一种野生茶,产于江苏吴县太湖洞庭东山的碧螺峰石壁缝隙间,此茶清香幽幽,飘忽不散,时浓时淡,若有若无,于是当地茶人用吴语惊呼道:“吓煞人香!”于是,“吓煞人香”成了这种茶的土名。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春,清圣祖康熙皇帝(1654—1722)南巡到洞庭东山,江苏巡抚宋荦派人购置了当地制茶名手朱正元精制的品质最好的“吓煞人香”进奉皇上。

康熙皇帝品尝后,顿觉清香甘醇直透肺腑,好茶!但一听说这茶名叫“吓煞人香”,又觉粗俗不雅,于是很想给它重新取个名。

取个什么名字呢?

在文化上早已被汉化了了的康熙皇帝非常



熟悉古代的一些咏茶诗词，如苏轼曾说：“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试焙新茶》），又如李清照说：“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晚梦，惊破一瓯春”（《小重山》）。“武林春”也好，“一瓯春”也好，都是指茶叶。

于是，康熙皇帝根据此茶色泽碧绿，外形蜷曲如螺，恰好又在春天采制于碧螺峰上，欣然将它题为“碧螺春”。

这一改，确实富有诗意，文雅得多，也贴切得多。“碧螺春”从此成为贡茶，当地官吏每年必采办朝贡进京。



康熙书法

乾隆荷露煮香茗

无论是同宋徽宗、康熙帝等帝王相比，还是同陆羽、蔡襄等茶人相比，乾隆皇帝嗜茶的轶闻趣事要多得多。

乾隆皇帝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十四岁的乾隆帝决定次年让位给十五子颙琰(即后来的嘉庆帝)。一位老臣不无惋惜地劝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帝却端起御案上的一杯茶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也！”清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卒时享年八十八岁，如此高寿与喝茶养性不无关系。

乾隆帝秉承乃祖康熙帝的爱好，经常巡游江南，既是为了威慑南方，加强统治，也是为了游山玩水。其间，他于茶事留下了许多佳话。在杭州



无论是同宋徽宗、康熙帝等帝王相比，还是同陆羽、蔡襄等茶人相比，乾隆皇帝嗜茶的轶闻趣事要多得多。



品尝了龙井茶后,他一时高兴,敕封当地老龙井胡公庙旁的十八棵茶树为“御茶”,要求年年贡奉。在湖南品尝到洞庭湖名茶君山银针后,即御封贡茶,令当地每年进贡十八斤。在福建崇安品尝大红袍,初嫌其名不雅,知其来由后欣然为之题匾。在福建安溪品尝乌龙茶后,又御题赐名为“铁观音”。这些名茶至今名声响亮,香播遐迩。

民间广泛流传的一种茶礼,即主人敬茶或给茶杯中续水时,客人以中指和食指在桌上轻轻点几下,以示谢意,相传这也源于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乾隆帝在苏州时,某日与几位侍从微服私访,行至一茶馆时,他茶瘾大发,也不等茶博士照料,拿起茶壶为自己、也为侍从斟起茶来。侍从见状不知所措,下跪接茶怕暴露了皇上身份,不跪吧又违反了宫中礼节。这时,一位侍从灵机一动,伸出手来弯曲中指和食指,朝皇上轻叩几下,形似双膝下跪,叩谢圣恩。乾隆一见龙颜大悦,轻轻点头以示嘉许。这一茶礼从此便流传开来,至今不废。

但乾隆帝在许多茶事中,以帝王之尊,至高无上的权力,穷奢极欲,备求精工,又流于宋徽宗式的奢靡铺张。

据徐珂《清稗类钞》等文献记载,乾隆帝曾特制了一银斗,专以用来衡量各地泉水的轻重,品较天下名水名泉的优劣。衡量的结果是:京师(即北京)玉泉山之水每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一带)也是每斗重一两,济南的珍珠泉重一两二厘,镇江金山泉重一两三厘,无锡惠山泉和杭州虎跑泉都是重一两四厘,等等。按照“水以轻为贵”的准则,乾隆帝遂定京师玉泉为第一,并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讲述了这次耗时耗力耗财的品泉过程。

从此,乾隆帝每次出宫巡游,必随载玉泉水以备需用,而且为了避免因经时稍久,舟车颠簸而使玉泉水色味有变,还

研究出一种以水洗水的办法。其法是这样的：先将玉泉水储于一个边上刻有分寸的大容器中，记住水的容量刻度，然后再注入其他水搅一下，待水定而污浊之物沉淀以后，再按玉泉水的容量倒出容器中的上层水，这时取得之水即清澈甘纯的玉泉水，其原理是玉泉水较轻，而其他水质重，轻浮重沉，故玉泉水必在上层。这种方法与陆羽分辨南零水其理如出一辙，似缺乏科学依据。

乾隆帝有一首《荷露煮茗》诗云：“平湖几里风香荷，荷花叶上露珠多。瓶罍收取供煮茗，山庄韵事真无过。”诗前还有一段小序道：“水以轻为贵，尝制银斗较之，玉泉水重一两，唯塞上伊逊水尚可相埒（“相等”之义）……轻于玉泉者唯雪水及荷露。”

雪水据说比玉泉水每斗还轻三厘，但雪水不常有，又非地下所出，所以不是“人品”之水。于是乾隆帝除了玉泉水之外，又常在夏秋之际选取荷露以作烹茶之水。

《荷露煮茗》写于承德避暑山庄。此地是清朝皇帝的行宫，群山环抱，风景秀丽，建筑精巧，规模宏大。乾隆帝每年五月至九十月间，都要来此避暑，处理政务。而此时正是山庄湖区莲荷茂盛的时候，乾隆帝嫔妃相从，坐于“烟波致爽”，行于“云山胜地”，赏荷风莲香，品荷露清茗，是何等韵事！只苦了仆役们，捧着瓶罍，为他一滴一滴汲取荷叶上的露珠。

清康熙初年的一个盛夏季节,在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的蒲家庄大路口的老树下,一位三十来岁的汉子摆了一个凉茶摊。他长得很瘦,开襟的粗布短衫显现出这人家道的清贫。而这个茶摊上除了一小缸粗茶、四五只粗瓷大碗外,让人纳闷的是竟搁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与卖茶怎么也不沾边。

这位瘦汉便是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清代文学家。蒲家号称“累代书香”,蒲松龄出生时正值明末清初大动乱之际,家道中落,度日维艰。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却屡试不第,不得不在家乡农村过着清贫的生活,做塾师以度日。在艰难的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



这位瘦汉便是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将满腔愤慨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这部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直到其暮年方才成此“孤愤之书”。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有出自蒲松龄的亲身见闻和自己的虚构,还有很多则出自民间传说,设置茶摊便是蒲松龄征集四方逸闻轶事的一个办法。他将这个茶摊设在村口大路旁,供行人歇脚和聊天,在边喝茶边海阔天空的乱聊中,蒲松龄常常捕捉到故事的素材。后来蒲松龄干脆立了一个“规矩”,哪位行人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茶钱他分文不收。于是有很多行人大谈异事怪闻,也有很多人实在没有什么故事,便乱造胡编一个。对此,蒲松龄一一笑纳,茶钱照例一个不收。也不知道耗去了多少茶钱,蒲松龄攒集到许多故事素材,最后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将许许多多牛鬼蛇神、妖魔狐仙的故事充实、完善成一篇篇小说。

蒲松龄以茶换故事一事又通过许许多多的行人传播而名闻遐迩,于是又有许多人虽不曾喝过蒲松龄一口茶,却纷纷将自己的珍闻捎寄给他。蒲松龄又几经修改和增补,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短篇小说集。



蒲松龄纪念馆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

清乾隆间辑修《四库全书》,他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辨文字得失。由于负责纂修《四库全书》,使他经常要与乾隆皇帝论谈,这也使他具备了机敏善辩的素质,有清一代学者中,长于应变者罕有出于其上者。以一个“茶谜”作暗示,救了亲家卢见曾的故事,便是纪晓岚机智敏捷的一个典型例子。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德州(今属山东)人,康熙进士。他和纪昀是亲家。纪昀在京做官,他则放外任职。其性爱才好客,喜聚四方名士,后来任两淮转运使这一“肥缺”时,更是广交名流,义结豪杰,家中常是宾客盈门,座无虚席,铺张挥霍,一掷千金,极一时之盛。后来渐渐财力不济,以致盐税发生亏空。

朝廷得悉这一消息后,决定对他抄家处罚,没收全部资财。纪昀知道这件事后,急忙派遣一位心腹漏夜赶往卢府送信。

卢见曾收到来信拆开一看,只见一空信封

内装着少许茶叶和盐，此外别无他物。卢见曾略作沉思，便了悟亲家所示，急忙发动全家人将家财转移他处。不数日，朝廷派来抄家的人赶到时，卢府资财已寥寥无几。

原来，纪昀这一“茶谜”的谜底是：以茶指“查”，意即“茶（查）盐（盐账）空（亏空）”。卢见曾知道已东窗事发，便赶忙转移财产，终未倾家荡产。



纪晓岚以一个“茶谜”作暗示，救了亲家卢见曾。



纪晓岚《楷书八言联》

施茶是至今仍在浙江等地民间流行的一种善举。施茶者往往在盛夏酷暑之际,选择凉亭、路边檐下庇荫处备置茶水,免费供路人解渴消暑。江山(今属浙江)万福寺有块《茶会碑》,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当地民间集资施茶而会盟的碑记。

鲁迅先生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也有一段合作施茶的佳话。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字豫才,绍兴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嗜烟,但也爱茶。他在《喝茶》这篇杂文中有一段妙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受这种清福,首先就必须练功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的感觉。”在《鲁迅日记》中,有多处茶事记载,譬如1933年5月24日记:“三弟及蕴如来,并为代买新茶三十斤,共泉四十元。”一次买这么多茶,虽然部分系赠人礼品,也已足见鲁迅对茶之好。第二天(5月25日)又记道:“以茶叶分赠内山、镰田及三弟。”

这里所讲到的内山,即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他在上海临近现在四川北路的山阴路开了一家内山书店,鲁迅是他的常客,两人结

交多年。1935年，暑热早临。内山与鲁迅一合计，即行施茶善举，由内山在书店门口放置一口茶缸，并负责烧水，鲁迅则负责供应茶叶。《鲁迅日记》1935年5月9日记载说：“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鲁迅逝世后，内山在一篇题为《便茶》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这次施茶之举，尤为使他体会深刻的是在施茶过程中所见到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品格。施茶原是无偿的，但内山经常发现在茶缸里有几枚铜钱。起初他还以为是顽皮小孩丢进去的，但后来他亲眼目睹人力车夫饮茶后将铜钱投进缸内，这才知道是人力车夫对他施茶的报答。

从鲁迅和内山合作施茶这一小事中，可以看出这两位不同国籍的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他们的高尚人品，这件事还折射出中国劳苦大众朴实、善良的精神品格。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1966)，字舍予，出身于北京满族贫民家庭，现代小说家、戏剧家。

老舍的代表作《茶馆》，写于1957年，通过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生动地展示了清末民初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的北京风貌，并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茶馆古代有“茶邸”、“茶坊”、“茶肆”、“茶舍”、“茶房”、“茶店”、“茶社”、“茶铺”、“茶亭”、“茶楼”、“茶寮”和“茶室”等名称。设馆饮茶始于8世纪初，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过最早的茶馆：“(开元中)，自邹、齐、沧、棣，渐



老舍在《茶馆》中充分解得茶中味

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有点像现代茶摊卖大碗茶，完全是平民化、大众化的。“茶馆”这个名词的出现，一直要到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说：“崇祯癸酉（1633年），有好事者开茶馆。”这是开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张岱还记述了扬州妓女在茶馆接客的情景。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各种文献记载，清代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三十多家；江南茶馆更是遍布城乡，上海有六十六家，太仓璜泾镇有近百家，嘉兴新塍镇有八十家，王店镇有六十三家，新篁镇有四十家。茶馆文化到清代已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但是对这一传统文化历史上罕有文学著述。老舍的伟大贡献在于以浓厚的北京味艺术地表现了北京一茶馆的兴衰，展示了一幅真实、生动、深刻的北京市民生活风情图。

老舍在《茶馆》的开场白里说道：“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起码都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溜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脚，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总之，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坐。”另外，老舍还描述了在茶馆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听到某京剧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听到煎熬鸦片的最好方法，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文物奇珍。老舍说：“这真是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老舍在《茶馆》中充分解得茶中味，但他在国外却碰到了一桩对茶不解其中味的事。老舍出访莫斯科时，当地人知道中国人好喝茶，非常周到地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壶。老舍每天一定得喝上一会儿茶，到莫斯科也不例外。他沏上一杯茶，



美滋滋地喝上了几口后,将杯子放在桌上,正当他开始渐入佳境时,忽见服务员二话不说,将茶收去倒掉了。

原来,外国人喝茶多是定时论“顿”的,除了俄国人外,英国人、荷兰人都是喝茶如吃饭,有专门时间,喝一定量。这位服务员只知道老舍要喝茶,却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全天候的,更不知道茶味妙在第二杯,茶之至味要慢慢品悟,以至于看到老舍喝剩半杯茶,将杯子放置于桌上,便以为先生已经喝完了。老舍对此哭笑不得,茶之佳境美味如烟消云散,只得懊丧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粗话在老舍作品中的粗人口中时有所闻,但出自现实生活中的老舍口中却是罕有的。这也可以看出老舍对茶的嗜好。

梁实秋买茶遭棒喝

梁实秋(1902—1987),原名治华,笔名秋郎,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区),现代作家、理论批评家和翻译家,新月社的主要成员。

梁实秋自称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腋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其实于品茶特讲究。

他在其小品文《喝茶》中说,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在北平时经常自己去买茶,在柜台前面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坐,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以媲美。茉莉花窨(同“熏”,将茉莉花等放入茶叶中,使茶叶染上花的香味)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再抓一把鲜茉莉放在表面上,叫做“双窨”。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菲菲。在这样的店里买茶,也是一种享受。

梁实秋还介绍了他的私家秘传,外人无由得知的一种特别饮法。他父辈朋友有位叫玉贵的旗人,精于饮饌,经常以一半香片和一半龙井茶混合沏之,既有香片的浓郁醇厚,兼有龙井茶的清苦甘美。于是梁家也仿效这种饮茶方法,饮者无不称善。后来梁家便将此茶叫做“玉



贵”，列入秘传之物。

梁实秋多次陪同其父亲游览杭州西湖，每次去从不忘记要品尝当地的龙井茶。在平湖秋月坐赏湖光山色，细啜龙井清茶，读亭前楹联：“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梁实秋以为风味绝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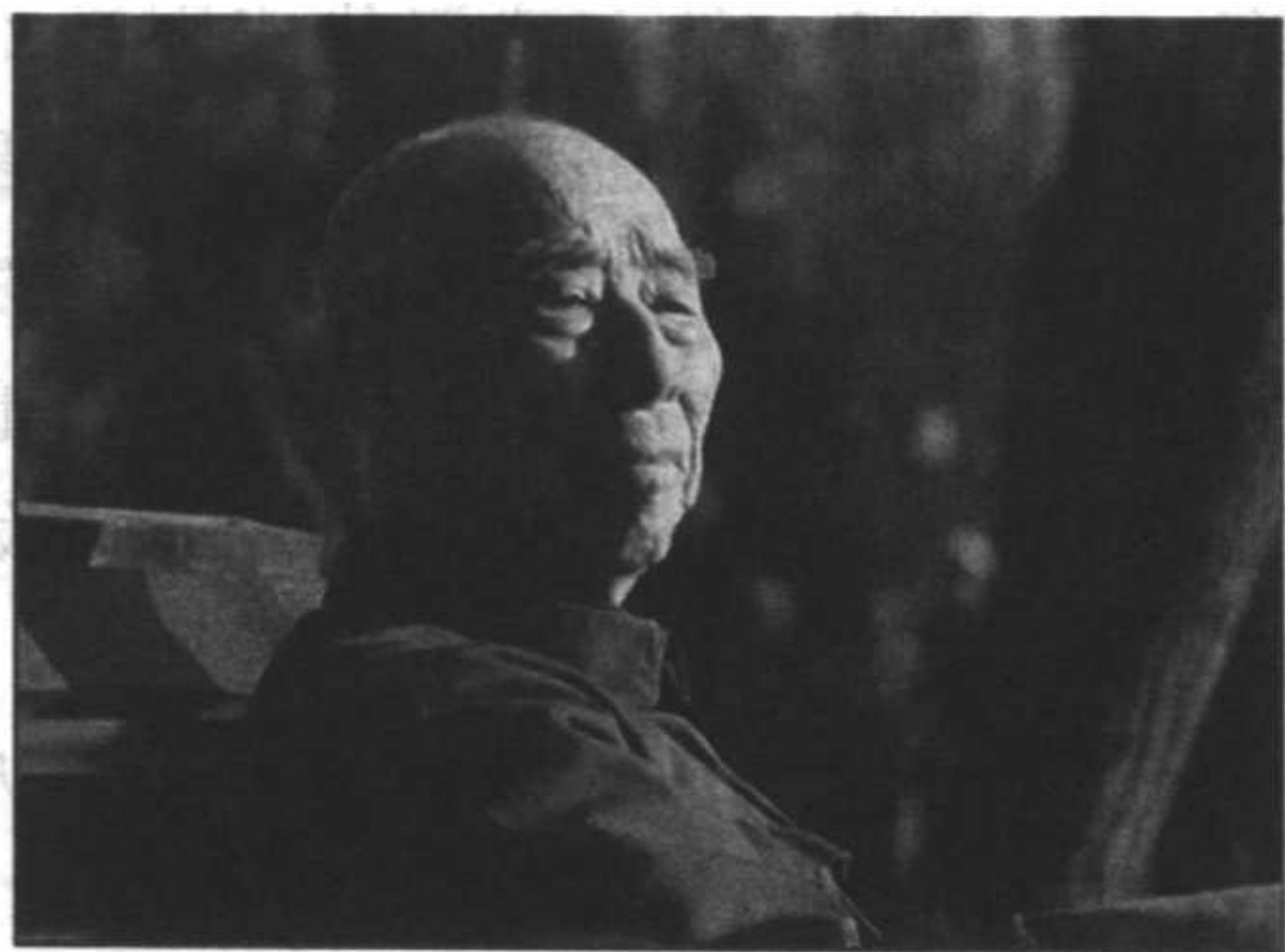
同样，他到洞庭湖，舟泊岳阳楼下，必购君山茶，以沸水沏之，先观赏杯中每片茶叶如针状直立漂浮，然后再品味其不俗之香。

粗粗数来，除了上述几种名茶之外，梁实秋还品饮过天津的大叶、六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茶、武夷山的岩茶等好茶。

但真正让他在饮茶上讲究起来的，却是他初到台湾时，在买茶中碰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实秋表示不满。店主便取出十二元一斤的龙井，梁实秋仍然不满。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

店主这番话犹如一记棒喝，让梁实秋顿然有悟。从此以后，他于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这种但求茶的本质和内蕴，追求茶的真善美的方式，即是一种更为讲究的饮茶，完全有别于并且更高于他在这之前于饮茶上的所有讲究。

吴觉农重撰新茶经



吴觉农是茶叶理论的巨匠

吴觉农(1897—1989),原名吴荣堂,浙江上虞人,为现代茶学泰斗,人称“当代茶圣”。

吴觉农早年就读于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时,就对茶叶研究发生了兴趣。192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时,在搜集、研究了古今中外各种茶叶资料后,以大量铁的事实撰写了论文《茶树原产地考》,第一个雄辩地论证了茶树原产于中国,驳斥了一百多年来许多外国权威认为印度是茶叶原产地的奇谈怪论。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撰著了《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与胡浩川合



著)、《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和《中国茶叶问题》(与范和钧合著),所著皆以振兴中国茶业为主旨。1938年,他主持翻译美国威廉·乌克斯编撰的六十万字巨著《茶叶全书》,在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烟战火后,终于在1949年告竣。

吴觉农是茶叶理论的巨匠,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38年初,他在武汉代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谈判,顺利地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40年,他通过活动,在重庆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系。1941年,他又在福建武夷山麓办起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觉农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他如鱼得水,大展宏图,立志重振中华茶业。吴觉农对我国茶业的贡献,只要看其主编《〈茶经〉述评》即可见一斑。

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农业出版社即有意把中国古代有关茶书加以整理、注释,汇印出版。由谁来主持这一继往开来的大事?出版社自然而然想到了吴觉农。他欣然接手这项浩繁的工作。但是,当他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后发现,这些书大都围绕陆羽《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无多大意义。后来又碰上“文革”,此事便耽搁下来。

可是吴觉农对此事并未简单处置,而是心牵神挂,耿耿于怀。他认为,《茶经》一书的内容以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来衡量,可资参考的并不多,但鉴于其内容比较全面,可以通过评述《茶经》的形式,兼及其他古代茶书,以回顾历史经验,古为今用。这一想法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农业

出版社知悉此设想后颇为赞同,并认为这种既述且评的方法较有新意,于是拍板由吴觉农主编这本书,书名定为《〈茶经〉述评》。

1979年,吴觉农以八十二岁的高龄主持了《〈茶经〉述评》的编写工作,在整个编撰过程中,吴老精益求精,三易其稿。最初用了较多时间来对照、校勘《茶经》的版本,研究它的文字,撰写中比较侧重于《茶经》的注释,后来添入一些评述内容,写成了第一稿。细加研讨后,吴老对第一稿很不满意,认为有的内容已超越了评述的范围。于是,又对第一稿加以精简,突出评述,写成了第二稿。后为了反映最新的学术发现和观点,吴老再次加以修改补充,这便是后来出版的第三稿。

值得敬佩的是,吴老编撰这本书时并非就关在书斋,足不出户,为了争取到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八十高龄,远行千里,跋山涉水,如为了对茶树原产地和我国生产红碎茶的问题进行研究,他曾先后前往四川、云南、广西和广东等省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论文,提出建议,最后融会在《〈茶经〉述评》之中。

经过五年紧张、艰苦的工作,在编撰成员的不懈努力下,《〈茶经〉述评》终于在1984年脱稿完成了。是年11月,陆定一在为《〈茶经〉述评》写的序言中说:“后人的著述,只重复陆羽的窠臼,少有新意。人们多么希望看见20世纪新茶经的出世。这个任务,现在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了。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这部书无疑是茶学的里程碑。”陆定一非常敬佩吴老的人品,因此他在这篇序中还评价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1989年10月28日，吴觉农因病逝世于北京。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多月，他还不顾年高体弱，兴致勃勃地前往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出。他看得很仔细，并与周围观众亲切地交谈，还为展示周题词留念，又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因为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

吴觉农的一生，是矢志不渝振兴我国茶业的一生。他是中国茶业界的骄傲。

茶禅一味，心领神会。
百般机锋，清清一杯。
弱水三千，只取茶水。
请吃茶去，普天同惠。

湖南省夹山国家森林公园系佛教禅宗圣地之一，宋代高僧圆悟克勤（1063—1135）在此所著的《碧岩录》被称为“禅宗第一书”，对汉文化圈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深远。

夹山还是“茶禅”的祖庭，圆悟克勤书赠予参学的日本弟子的四字真诀“茶禅一味”，现今仍珍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今人梁晓虹在所著《镰仓的禅宗与日本禅的胎动》中写道：“到了宋代，饮茶更成了禅寺的‘和尚家风’。从早晨到晚上，整天离不了茶，许多禅寺还种植茶树，采制茶叶。有些禅师一边采茶摘茶，一边即兴发挥，机锋相酬。茶与禅已紧密相联。宋代临济宗扬岐派著名禅僧圆悟克勤曾写有‘茶禅一味’四字，体现出了茶和禅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千百年来，饮茶之所以能与佛禅形成深厚联系，达到彼此相融一体的境界，在于僧侣认为茶有



四十八世圓悟克勤禪師

圆悟克勤曾写有“茶禅一味”四字，体现出了茶和禅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德”：一是用以坐禅，可以清心涤虑，彻夜不眠；二是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即能抑制淫欲。所以，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最宜参禅拜佛。



六祖慧能时，禅宗开始大行天下。

佛教自公历纪元前后传入中国（约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左右），由于教义和僧侣活动之需，茶很快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

缘。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在记载考据汉碑时即发现，那时有位甘露大师（法名理真，俗姓吴），就在蒙顶山（今四川雅安一带）栽种茶树。据说所栽茶树为七株，每年采摘不过数钱，后仅供天子郊祀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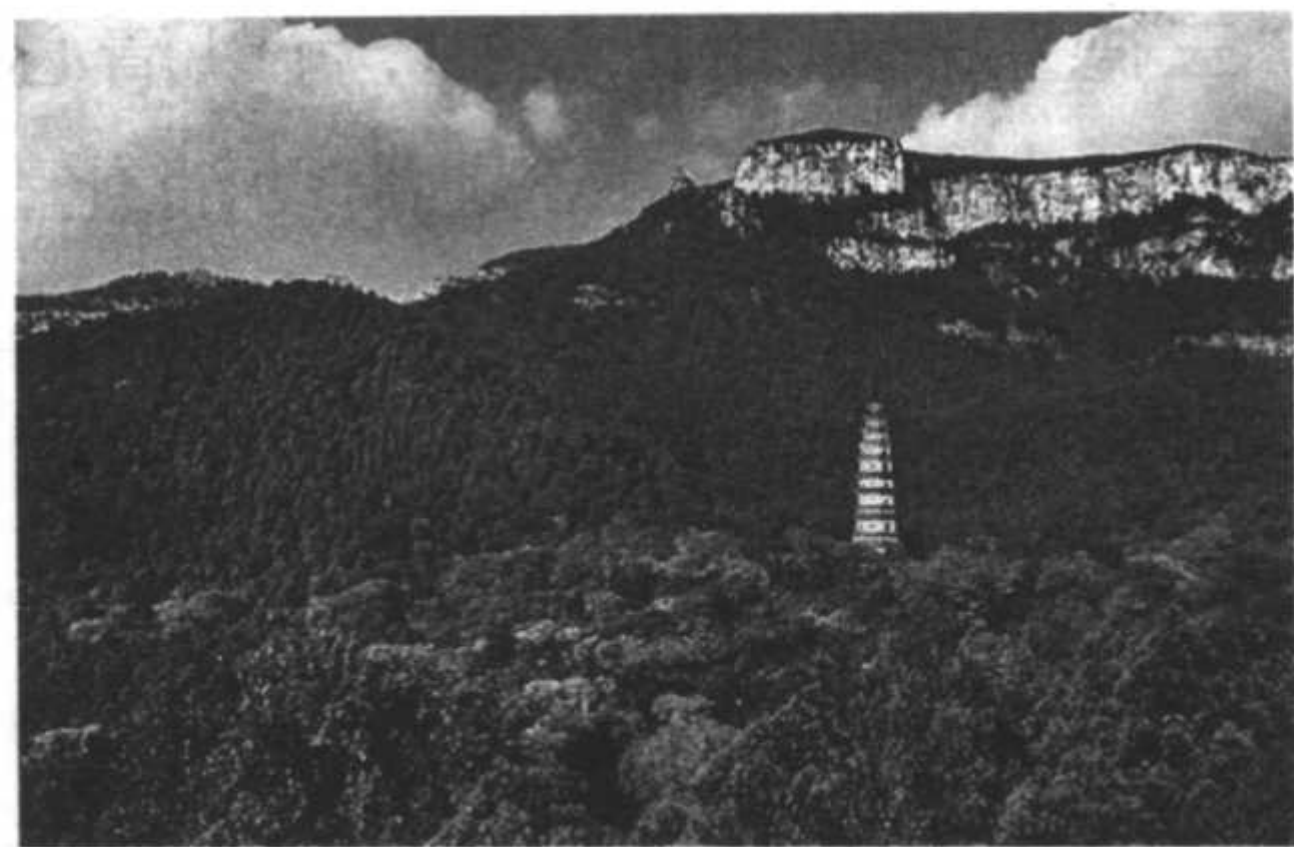
东晋高僧怀信在其《释门自镜录》中自称居不愁寒暑，食不择甘苦，每天只是少不了“要水要茶”。《晋书·艺术传》也记载说，东晋敦煌（今属甘肃）人单道开（姓孟）在后赵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的昭德寺修行时，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饮茶以提神防睡。陆羽《茶经》中还记载了南朝宋时的僧人法瑶用餐不忘饮茶和八公寺昙济道人以茶待客的故事。

南朝梁武帝普通年间，印度禅宗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东渡中国传授禅学，是为中国禅宗初祖。到六祖慧能时，禅宗开始大行天下。禅宗的主要修炼方法是坐禅。“禅”为梵语，意思是坐禅或静虑，所以晚间常要打坐。于是在唐代随着禅宗的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烈。在此，降魔大师的以茶坐禅之法标志着佛门一代风尚的形成。

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位高僧称“降魔师”，在此大兴禅教。他对门下僧人学禅提



出了晚上务必打坐不寐，并且不吃晚饭的戒律。不睡觉，不吃，饥困交加怎么办？他提出可以饮茶相伴。于是僧侣们各备茶叶，以至于出现了寺院内到处见人烹茶喝茶的情形。后来其他寺院也闻风



灵岩寺

仿效，以茶坐禅便渐渐成为许多寺院的一种风习。

此风一开，那些文化修养高的僧人便从饮茶过程中总结出一套选茶、鉴水、煮茶的技艺，又讲究饮茶的方法和环境，逐步形成茶艺或茶道。于是茶从物质转变为精神，成为一种文化艺术和一种思想修养。

惟俨『点茶与这僧』

南宋有位高僧叫普济(1179—1253),俗姓张,字大川,浙江奉化人。他编撰了一部以记述禅师法语为主的重要典籍《五灯会元》,中国禅语精华大半载于其中。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茶的禅机禅趣。

据《五灯会元》卷五记载,唐朝有位和尚从江西赶到湖南澧州(今湖南澧县)拜谒惟俨禅师。惟俨打量了他一番后问道:“从哪里来?”

和尚答道:“从江西来。”

惟俨闻声用拄杖敲了三下禅座。

和尚见状仿佛明白什么似的说:“我大概知道了去向。”

惟俨抛下拄杖,看这和尚怎么说。

和尚无言以对,傻在那里。

惟俨回头召唤侍从说:“点茶与这僧,他赶了很多路累了。”

禅师对话讲究禅机,“从哪里来”即是富有深刻禅意的问语。这位和尚不明禅语机锋,木讷地直问直答,惟俨以拄杖敲禅座提示,他仍答非所问,惟俨只好让他在茶中自己去领悟了。这和尚如果真的以茶解乏,那就辜负了惟俨最后的“挽救”了。



惟俨禅师(751—834),俗姓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他十七岁出家,先后参礼石头希迁禅师和马祖道一禅师,悟法之后住澧州药山,法席很盛。当时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文学家、哲学家李翱非常仰慕他,入山拜谒请教后,作《复性书》,把禅教义理融入儒学之中,开宋明理学的先声。惟俨圆寂后,唐文宗谥号“弘道大师”。



三十六世藥山惟儼禪師

惟俨回头召唤侍从说:“点茶与这僧,他赶了很多路走累了。”

智常不让南泉吃茶

北宋禅僧道源编撰的《景德传灯录》记载了不少有关僧人饮茶的故事。其中卷七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禅师智常与南泉一同行脚。有一天，两人要分手了。临别时，他俩煎茶品茗，作最后一会。南泉问智常道：“从前与师兄研讨的一些禅语，彼此都已明白了。今后如果有人问起悟道大事，我该怎么回答？”

智常看着眼前一片地说：“这块地方太适宜建一座庵堂！”

南泉说：“筑庵的事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悟道大事该怎么办？”

智常一听，猛然将正在煎茶的茶铫打翻，顾自站了起来。

南泉不解地说：“师兄这是干吗？你已经喝了茶，我还没有喝哩！”

智常却说：“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滴茶水也不能享用！”

禅宗讲悟，既然是悟道之事，就该自己去悟，而不应该去问，比如一块旷地，为什么适宜建庵，也要自己悟，问旁人是不问出来的。智常见南泉相问悟道之事，便知平时两人所商讨的



禅旨机语他根本没理会，白跟他费了许多口舌，于是一怒之下打翻茶铫，说是不让他享用茶水，实际意思却是不值得与他讲禅。

智常禅师，生卒年未详，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在世，俗姓陈，江陵（今属湖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元和年间住庐山归宗寺。他目有重瞳，曾用药去除，致双目皆赤，故人称“赤眼归宗”。智常圆寂后，唐文宗谥号“至真禅师”。

南泉禅师（748—834），法号普愿，俗姓王，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后住池阳（今属安徽）南泉院，故称“南泉禅师”。南泉后成禅学大师，善于启发后学，他的示众之语曾在各地禅院中广为流传。



南泉不解地说：“师兄这是干吗？你已经喝了茶，我还没有喝哩！”

松山请茶『何必再招呼』

僧侣之间以茶说禅，僧俗之间也有以此相对禅机的事。据《景德传灯录》卷八记载：有一天，松山禅师请居士庞蕴喝茶。庞蕴忽然举起茶托子问道：“这茶人人都能喝上，人人都有份，为什么其中的禅旨不能说？”

松山答道：“正因为人人都有，所以不能说。”

庞蕴话锋一转，问道：“那么老兄你为什么却能说？”

松山随机应变说：“总不能不说话吧！”

庞蕴找不出松山话中的破绽，只好说：“那当然，那当然。”

松山回过头顾自己喝茶，庞蕴见状忽又发难，问道：“老兄喝茶为什么不招呼客人呢？”

松山反问道：“谁是客人？”

庞蕴脱口而出：“就是我老庞。”

松山淡淡一语道：“何必再招呼呢？”

松山也是马祖道一的弟子，生平未详，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在世。庞蕴，字道玄，衡阳（今属湖南）人，在世之时与松山相近。他曾参见马祖道一领悟禅旨。后游历至襄阳（今属湖北），爱其风土，与妻子儿女躬耕鹿门



山下,后世称之为“襄阳庞大士”。

庞蕴仗着学过一点禅学,想以对应禅机难倒松山。佛家讲普渡众生,庞蕴即以茶为人人皆有之物,逼使松山点出茶中禅意。松山针锋相对,指出既然人人皆有,人人就能悟道得佛,所以不必多说。庞蕴无理取闹,继续发难,你说不必多说,这分明已经开口说了。松山却认为,就你庞蕴不知“茶禅一味”,所以我不能不说。

第一回合败下阵来,庞蕴并未善罢甘休,还想反扑扳回,见松山自顾自喝茶,便挤兑他只知喝茶,不知对客人的礼数,这茶不喝也罢。谁知松山机智地反问道:“谁是客人?”大家喝茶都想了悟禅旨,又何来主人客人?面对庞蕴毫无禅机地直言“就是我老庞”,松山只能说,对你这种不知禅机的人,我何必再费劲和你打招呼!

松山以其学识和机敏,阻止了庞蕴的捣乱。

马祖『吸尽西江水』

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茶被比作“西江水”。茶人以为，一碗茶如西江水，包孕着天地乾坤，如果将其一口吸尽（即“吸尽西江水”），便会领悟到一些禅意。

这里“吸尽西江水”的禅语便是出自马祖道一和庞蕴的禅机对话中。

马祖禅师（709—788），法号道一，俗姓马，故世称“马祖”，什邡（今属四川）人。他从南岳怀让禅师处得法后，往江西聚徒说法，创建禅寺，法席隆盛。禅宗六祖慧能的后世，以马祖道一的门叶最为繁荣，禅宗至此而大盛。马祖圆寂后，唐宪宗追加谥号“大寂”。

据《五灯会元》记载，唐贞元初年，庞蕴谒见石头禅师，问他道：“不与万事万物为伴侣的是什么人？”

石头见问，赶忙用手遮住庞蕴的嘴巴。

庞蕴见状仿佛豁然省悟。但他是个



三十五世江西道一禪師

马祖说道：“等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就回答你。”



滑头，并不尽信石头的回答。后来参见马祖禅师时，又问道：“不与万事万物为伴侣的是什么人？”

马祖说道：“等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就回答你。”

庞蕴听罢，顿时领会了其中禅旨。

人世间是一个相对的世界，天地、阴阳、是非、善恶、利害、得失、大小、长短，等等，都是相对的事物。禅宗认为，如果只知道相对的世界，就会为一点小事而喜而忧，就会烦恼不断。庞蕴的问题意思是说：唯一绝对的境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马祖的回答意思是说：将西江水这个包孕了人世间一切相对之物一口吞掉，超越利害、得失、大小、是非这一相对世界，就会领悟那绝对的世界，也即禅宗所讲的驾驭在一切相对事物之上的“无”的境界。

马祖说的“一口吸尽西江水”在现实意义上是不能解释的，但禅宗却有其表现形式，即喝尽一碗茶。

另外，佛典《维摩经》中说：“一毛吞巨海，芥子容须弥。”其意思与“一口吸尽西江水”在禅意上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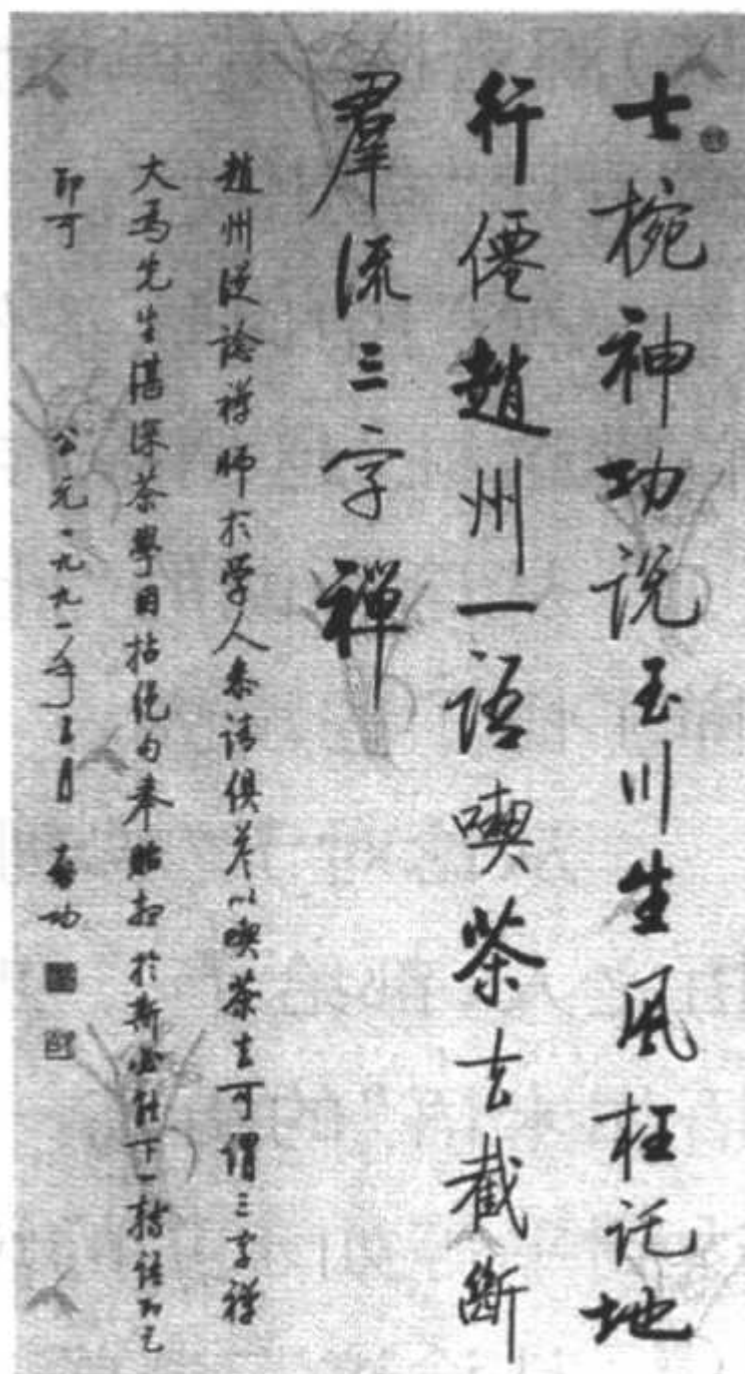
庞蕴谒见石头禅师，问道：“不与万事万物为伴侣的是什么人？”石头见问，赶忙用手遮住庞蕴的嘴巴。

『且吃了赵州茶去』

在杭州的“九溪十八涧”附近，有一副刻在林海亭石柱上的对联：“小住为佳，且吃了赵州茶去；曰归可缓，试同歌陌上花来。”

在杭州西湖风景区众多楹联中，这是写得最为轻松、明快、潇洒的一副，至今仍广为传诵。

那么，这“赵州茶”究竟为何物？



启功“赵州和尚茶诗”

翻开《五灯会元》卷四，即可看到这样一则故事：

从谏禅师问一位新来的僧人：“你以前曾到过此间吗？”

僧人回答说：“到过。”

从谏说：“吃茶去。”

从谏又问另一位僧人：“到过此间吗？”

回答是：“不曾到过。”

从谏说：“吃茶去。”

事后，一旁的院主问从谏：“为什么到过也



说吃茶去,不曾到过也说吃茶去?”

从谔听罢叫道:“院主!”

院主应了一声,从谔说:“吃茶去。”

从谔(778—897),俗姓郝,曹州(今山东曹县一带)郝乡人。幼年出家,参南泉普愿禅师而得法。后住赵州(今河北赵县)观音院,其禅语法言传遍天下,时称“赵州门风”,并自立禅关称“赵州关”。

禅门中以饮茶作为机锋、禅案而广泛流传、颇具影响的,首推这桩“赵州茶”或称“吃茶去”的公案。

从谔所说的“此间”并非指他自己所在的禅寺,而是指参禅了悟了的境界。

从谔对于“曾到”和“未曾到”的僧人,对了悟了的人和未悟之人,都给予了“吃茶去”这样一个相同的回答,表现了“了悟如未悟”的更高一层的禅学境界,即抛却了一切分别执著,达到平等如水平的境界。

从谔这三声颇有回味的“吃茶去”,后来被禅门看成是“赵州禅关”,并成了禅林中的一大著名典故,经常在禅家的公案中为僧侣所喜闻乐道。据《五灯会元》记载,盛产茶叶的江西、福建和浙江的僧侣说法回答中,其机锋用语常常就用“吃茶去”。

在禅门中,许多禅师喜欢用“瞌睡汉”来责备未能顿悟的僧徒。尚未醒悟的是“瞌睡汉”,能使“瞌睡汉”醒悟的是“吃茶去”。“瞌睡汉”与“吃茶去”是对待同一类



三十七世趙州從諫禪師

从谔这三声颇有回味的“吃茶去”,后来被禅门看成是“赵州禅关”,并成了禅林中的一大著名典故。

人事的两种说法,而相比之下,“吃茶去”显得更意味深长,而且对照禅门公案中许多非常粗鲁、粗俗,甚至呵祖骂佛的用语,则显得典雅、亲切、自然、有品位。这也是“吃茶去”之所以能成为禅门一大典故且广泛流播、历久不衰的原因。

禅宗传至六祖慧能时，即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流派之一。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它告谕人们，佛在自身中，此心就是佛，如能识自心，人人都成佛。慧能更视日常念经、功课为无事忙，在其《坛经》中一再强调“一念如悟，众生是佛”，以及不出家同样可以修行悟道。于是，许多禅师不求于佛典悟道，而更重于生活中悟道。

《五灯会元》记有这样一则故事：居士陆希声有一天前去拜谒仰山慧寂禅师，慧寂出门相迎。两人刚走进殿门，陆希声便问道：“您这佛殿三门都开着，我不知该从何门而入？”

对这含有禅机的问话，慧寂明白相告：“从信门入。”

陆希声又问道：“大和尚现在还持戒吗？”

慧寂说：“不持戒。”



三十八世仰山慧寂禅师

慧寂说道：“老僧有一偈，你仔细听好了：‘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馒头边。’”

“那么，还坐禅吗？”

“不坐禅。”

不持戒，不坐禅，这算什么禅师？陆希声难以悟解。慧寂说道：“老僧有一偈，你仔细听好了：‘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酤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倨慢随意不持戒，可以高高而立不坐禅。但你每天别忘了喝几碗酤茶，别忘了田园稼耕之事（“镢头”即锄头）。

在这里，慧寂以“酤茶三两碗，意在镢头边”来代替“持戒”和“坐禅”，意在向陆希声指明，你虽然没有出家，但日常生活即道，这是参悟禅机的奥妙所在。这也就是对“佛在自身中，此心就是佛。如能识自心，人人都成佛”的一种理解、诠释。

慧寂禅师（814—890），俗姓叶，韶州怀化（今广东怀集）人。少年即出家，后参谒耽源禅师，省悟禅旨。又拜泐山灵祐禅师为师，与其共创“泐仰宗”。后住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带）仰山，法席隆盛，故称“仰山慧寂”。慧寂圆寂后，谥号“智通禅师”。

《景德传灯录》中讲述的温州瑞鹿寺的僧侣生活，是一个让人能感觉出“茶禅一味”的事例，很有意思。

瑞鹿寺有位本先禅师称寺内众僧的生活是：清晨起床，洗手、漱口，然后吃茶。吃茶完了，佛前参拜做佛事。午饭后归住处小睡片刻，起来后，洗手、漱口，然后吃茶。吃完茶做些杂事。晚饭吃罢，洗手、漱口，然后吃茶。吃完茶做些杂事。

本先禅师的“吃茶”貌似闲适，其实非常讲究，吃茶前必定是洗手、漱口，洗手、漱口与吃茶完全融为一体，这已不是单纯日常意义上的生活行为，而是借此参禅与了悟的精神意会形式。

《五灯会元》中记载：有位和尚问如宝禅师（五代时住江西吉州资福禅院）说：“何为‘和尚家风’？”如宝回答说：“饭后三碗茶。”《景德传灯录》中说：有人问子仪禅师（北宋初住杭州天竺山）：“怎样修行才能符合于道？”子仪说：“诵经时把帘子卷得高高的，睡醒后把茶水煎得浓浓的。”对照这两位禅师的语录，本先禅师的说法可谓与之一脉相承。

本先禅师(942—1008),俗姓郑,浙江永嘉人。童年出家,后得法于天台德韶禅师,住温州瑞鹿寺。本先工于文辞,讲求“唯心所现(只因心中所见)”,认为眼见一切色,耳闻一切声,鼻嗅一切香,舌尝一切味,身体感触一切软滑,意念分别一切事物,都是心中所见,并认为这是很好的悟入门径(见《五灯会元》卷十)。有《竹林集》等著作传世。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数典 (修订版)

作者=姜青青著

页数= 1 8 3

SS号= 1 1 6 4 2 5 2 2

出版日期=

地址= h t t p : / / b o o k 9 . 5 r e a d . c o m / 3 0 0 - 0 1 / d i s
k r d h / R D H 9 9 / 1 2 /

J P G地址= h t t p : / / i m a g e 1 . 5 r e a d . c o m / i m a g e /
s s 2 j p g . d l l ? d i d = b 8 & p i d = 6 4 6 8 6 5 6 5 6 2 6 5 6 6
6 4 9 9 9 E A 8 A 0 A 7 9 9 9 D 6 4 8 7 7 9 7 D 6 E 6 E 6 4 6 6 6 7 6 4
6 8 6 2 6 6 6 8 6 4 7 8 6 C 6 C 7 7 7 6 6 9 6 9 7 B 6 E 6 E 6 A 7 A 6 8
7 8 7 6 6 B 7 9 7 B 6 6 7 8 7 A 7 7 7 9 7 8 6 7 6 A 6 B 7 8 6 7 6 A 6 D
6 B 6 4 A F A 9 9 C 6 4 6 4 3 1 3 1 3 7 3 4 3 6 3 8 3 4 3 5 & j i d =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